

3886

民族問題叢



9520M

16 JUN 58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OF ORIENTAL STUDIES

11

1957



民族問題譯叢

1957年11月号目錄

慶祝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

列宁和东方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东方学”杂志社論 [1]
十月革命和殖民制度的崩潰.....K·普魯金茲 [7]

論 文

资产阶級民族学的危机.....C.П·托尔斯托夫 [10]
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常会与集体农庄畜牧业发展的問題A·B·吉 娜 [20]
——哈薩克共和国若干省的村和阿烏尔苏維埃的工作經驗
印度各个政党及英帝国主义的民族政策.....A·M·基雅柯夫 [30]

資料与研究

列宁的民族政策(列宁有關民族問題著作的介紹提要).....C·B·喀札科夫 [36]
中亚古代游牧民族史的爭論問題.....C·H·伯恩施坦 [45]

蘇聯各族介紹

苏联各民族.....	H·H·切博克沙罗夫	[47]
俄罗斯人.....	“苏联大百科全书”	[49]
白俄罗斯人.....	”	[53]
哈薩克人.....	”	[54]
格魯吉亞人.....	”	[56]
阿捷尔拜疆人.....	”	[57]
立陶宛人.....	”	[58]
摩爾达維亞人.....	”	[59]
拉脫維亞人.....	”	[60]
柯尔克茲人.....	”	[61]
塔吉克人.....	”	[62]
阿尔明尼亞人.....	”	[63]
土尔克明人.....	”	[64]



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列宁和东方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苏联东方学”雜誌1957年第2期社論

資本主义辯护人制造了各种各样关于东西方之間好象自古就存在有某种鴻沟、关于亚洲各族人民天生落后的“理論”，傳播什么西方列强在亚洲各国負有“文明使命”的神話。

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了殖民掠夺及其維護者。馬克思主义創始人深刻地研究了东方的历史过程之后，确定了东方国家具有和西方国家同样的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的規律性。因而揭露了所謂东方天生落后的“理論”，証明这种“理論”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乃是一种历史的捏造。

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結的偉大原則，并且从“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能自由”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了关于民族問題的根思想。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各族人民反对殖民奴役的自发斗争，是他們将来解放的前提；并宣称，只有在东方各国的社会状况发生根本革命的时候，人类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①。

列宁则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即在帝国主义时代展开了自己的革命活动。

20世紀初期，全球的土地已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了。資本輸出和对于处在无权地位的殖民地人民的殘酷剝削，保証了帝国主义壟断者們的巨額利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每年为20亿美元，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夜每年为40亿美元。一小撮寄生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剝削着东方各族人民，阻碍着全人类的进步。

列宁在其揭露帝国主义、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的天才著作中指出，外国資本的侵入亚洲和把亚洲变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引起了亿万人与日俱增的憤怒和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

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揭露了1899—1900年在中国鎮压人民起义的八国联軍，痛斥了参加橫暴瓜分中国的沙皇政府和一小撮俄国資本家的无耻。

列宁写道：“中国人民自身遭受着俄国人民所受尽的不幸，遭受着从飢餓农民身上敲詐貢稅并以武力压制任何争取自由的傾向的亚洲式政府所給予的痛苦，遭受着已經侵入了中国的資本的压迫”^②。列宁在这篇文章里用俄国无产阶级的名义声明贊助中国人民的斗争。

列宁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总結了东方各族人民解放运动的經驗，这种解放运动是由于資本主义在东方各国的发展以及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影响之下逐漸展开的。列宁指出，俄国1905—1907年的革命是促进亚洲人民在政治生活上覺醒的推动力。在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革命，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9卷，第352頁。

② “列宁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編，第9頁。

波斯革命，中国革命，印度和爪哇也掀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列宁看到东方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强调指出，促使亚洲觉醒的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开端，标志着在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①

列宁的预见完全应验了，20世纪已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世纪。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亦即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是开辟了社会革命改造新纪元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继1905年俄国革命而起的亚洲革命的经，对亚洲各国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列宁对于亚洲革命第一阶段阶级力量的配置作了全面的分析。列宁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城乡劳动人民。十月革命以后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列宁所提出的人民群众在东方各国革命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原理。

列宁特别注意殖民地无产阶级的主观性和独立性的一切表现，特别注意加强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列宁关于1908年孟买的大罢工曾经写道：“在印度无产阶级也已发育到有觉悟的群众政治斗争了。”^②

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不可以把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作用和殖民地与附属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混为一谈，前者是反动的壟断的资产阶级，后者还未丧失其革命的可能性。

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有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列宁关于争取一般民主要求具有重大意义思想，已成为民族解放革命民主阶段原理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已经由中国的人民革命和东方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反帝斗争的所有经验证明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迫近，以及帝国主义者因重新分割世界而发生冲突的危

险，要求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加强国际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去反对帝国主义政府的殖民意图，反对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各种机会主义者的修正主义观点。

在宗主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条件下，列宁总结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新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并且指出，民族问题已从国内问题转变成为解放一切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问题。列宁创造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之理论、战略和策略组成部分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論、战略和策略，因而确立了关于东方各族人民走向自由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最重要的原理。

列宁发现和论证了帝国主义时代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并且指出，帝国主义国家间深刻的矛盾，蕴含着削弱每一个交战国国家的尖锐冲突和世界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存在有帝国主义鎖鏈在其較弱一环被打断的可能性，以及社会主义首先在若干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的可能性。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有两种历史趋向。一种趋向表现为民族生活的觉醒，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进行战斗，建立民族国家；另一种趋向表现为民族界限的破坏和在资本的國際統一的基础上建立各种各样的国际联系（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其他等等）。在资本主义时代，这两种趋向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民族綱領中考虑到这两种趋向，并且坚持民族的平等权利，亦即民族自决直到分立的权利“……坚持国际主义原则而毫不调和地反对用资产阶级的——那怕是最精巧的——民族主义思想毒害无产阶级。”^③列宁揭露了民族机会主义者們以“民族統一”、“民族共同文化”、“民族文化自治”等等空话来麻醉劳动人民警觉性的意图。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理論”都是指望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識下屈服。因此，正如列宁所指示的，宗主国的社会主义者們最重要的任务是坚

① 列宁：“亚洲的觉醒”，载“列宁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編，第38頁。

② “列宁文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册，第97頁。

③ “列宁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編，第93頁。

决捍卫民族自决直到分立的权利，而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与无产阶级任务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趋向，为各民族工人与劳动人民的友谊、团结而进行斗争。

列宁指出必须全力支持被压迫国家各族人民群众的爱国愿望，同时对于有害国际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不要作任何思想上的让步。列宁写道：“祖国，也就是说，一定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环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最有力的因素……无产阶级对待自己斗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不会是无关痛痒和漠不关心的，因而也就不会对自己的国家的命运采取冷漠的态度。但是，无产阶级之关心国家命运，只是因为这关系到阶级斗争，而不是因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完全为社会主义人不齿的所谓‘爱国主义’。”①

共产党始终站在列宁的这个立场上，并且对于大国沙文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偷偷贯彻无产阶级不关心民族命运，不关心民族国家命运的反动思想的世界主义分子，进行彻底的斗争。目前，当帝国主义者們宣傳世界主义思想，企图削弱东方各族人民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意志，以便更顺利地奴役他们的时候，列宁的这几句话，听起来显得特别有力。

*

*

*

列宁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制定了把经济落后的俄国转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科学纲领。

列宁认为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组织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列宁曾经警告过，不根据生动的现实而为苏维埃东方的社会主义建设编一套现成的“方案”，是非常危险的。不能把特别先进地区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机械搬用于落后地区，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看到渐进性，全面考虑地方的条件，实行一系列的过渡办法，不冒进，不脱离群众，带领着群众前进，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培养民族干部，对于各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文化事业的高涨来说，具有决

定的意义。共产党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派遣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到民族地区去的无产阶级中心地区，对于东方各共和国民族干部的训练，给了莫大的帮助。

列宁经常强调地说，必须在各苏维埃共和国间彻底实现充分的政治上的平等，彻底消灭各苏维埃共和国间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和国能有比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更为迅速的经济发展。列宁给土耳其斯坦、南高加索和达格斯坦共产党员的信件，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和指示，都成了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上多方面实际活动的根据。

列宁为了巩固年青的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坚决主张制止大国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曾表现为力图限制各共和国的权利。列宁主张各民族共和国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一切方面完全平等，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权利一律平等。

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始终抓住“分而治之”这条规则，而作为各平权民族自愿的国家联盟的苏联的成立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一个没有民族纠纷，保证各民族平等、友爱、互助的多民族国家的范例。

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年12月）的信中指出，保持苏联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具有国际的意义。“如果在东方人民起来的前夜和在他們开始觉醒时，我們对我们本国的异族人即使稍为采取粗暴态度和不公正的态度，因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②

列宁指出俄国东部边区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的经验有很大的国际意义。正因为这一斗争不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而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之下进行的，所以有着重大的意义；也正因为共产党领导了这一斗争，才保证做到了这一点。

列宁制定了一条马克思恩格斯见到的最重要的原理，即落后国家在胜利的无产阶级帮助之下，可以通过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到社会主义。党遵照列

① 参阅“列宁文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册，第110—111页。

② “民族问题译丛”，1957年第3期，第5页。

宁的指示，已經領導苏联“边区”过去具有严重宗法封建关系残余的落后的各族人民胜利的走向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以前，在今日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領土上几乎是没有任何工业的，沙俄时代东方各边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土耳其、伊朗、阿富汗是沒有多大差别的。但在苏维埃政权下，各东方苏维埃共和国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了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中亚的五个苏维埃共和国：烏茲別克、哈薩克、柯尔克茲、塔吉克和土庫曼，在工业方面远远超过了邻近的外国。例如，这几个共和国的人口总数約为1,700万，其拥有的电力較之人口共达16,600万的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国相加起来，还要多两倍。各民族共和国工业建設的速度也大大高于全苏联的平均速度。

过去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在已达到的經濟繁荣的基础上，克服了文化上的落后性，发揚了苏维埃东方社会主义民族的文化。

* * *

1957年，全人类都将庆祝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因为十月革命開闢了帝国主义开始崩溃和殖民制度发生危机的时代，開闢了社会主义革命不断胜利和民族解放革命蓬勃高漲的时代。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苏维埃国家的确立，对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給予了决定性的影响。歐洲和亚洲展开了强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法西斯势力的粉粹（在这件事情上苏联有絕大的功劳），更进一步地推动了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許多世紀以来在殖民奴役的羈轡之下受尽苦难的亚非各国千百万人民已經覺醒起来，过着积极的政治生活。胜利的民族解放运动結果給东方几个最大的国家带来了独立，使它今天在國際方面，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国以及歐亞許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繼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事件。”●

列宁思想鼓舞着殖民地国家各族人民争取自身

解放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正在崩溃之中。最近十年来最大的結果是东方各国13亿人民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桎梏，而这—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过程再一次証明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斗争学說的正确性。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中华民族正在建設社会主义。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都已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決定性的胜利，并且在國內創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人民中国依靠着这种制度的偉大的优越性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帮助，成功地克服了本身技术、經济上的落后性；并且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經驗順利地解决了民族問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消灭各民族間事实上不平等的巨大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開国以来，在差不多有3,5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建設了400个以上的工业企业，順利地发展了农业經济。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得到了发展。

、 人民中国繼承着列宁的偉大事业——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人民中国的不可战胜及其力量，就在这个地方。

亚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也都在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他們在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形式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有着4亿人口的印度共和国，緬甸联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叙利亚及亚洲其他国家已获得了民族独立。

非洲各族人民正在为争取民族解放成功地展开斗争。埃及、苏丹、摩洛哥、突尼斯、加納及其他国家已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到1957年，亚洲只留下个别的殖民地，人口总数不过1,600万人，而这些最后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依靠着全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情与支持，正为本身的解放进行着积极的斗争。列宁的“自由亚洲万岁！”这个热情的口号已快要完全实现了。

东方非社会主义国家独立的政治和經济发展的順利条件已經創造出来了。这些国家現在可以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无私的帮助。誰都知道，苏联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准备庆祝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決議，載1957年3月17日“真理报”。

和人民民主国家对东方各国给予经济援助是不要求任何政治特权的。

列宁说过：“……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帮助落后的劳动群众，当苏维埃共和国胜利的无产阶级跟这些群众握起手来而能给予他们以援助的时候，落后国家的发展是能够超越它们目前的阶段的。”^①

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立者列宁，给苏维埃国家崭新的外交政策，亦即国际和平与合作，不同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奠定了基础。

列宁签署了有历史意义的和平法令，并且在他的领导下废除了沙皇和临时政府瓜分与奴役东方各国的条约，废除了革命前沙皇政府和东方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俄国在这些国家内享有的各种特权，并给予经济援助以恢复和发展他们的国民经济。就是在这一政策基础上与土耳其、阿富汗、伊朗签订了条约。

中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逸仙，对于列宁在争取东方各族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作用评价很高，他很好地表达了东方优秀人士对于列宁的态度，他说：“列宁乃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是为被压迫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战士，是给全人类指出新的解放道路的伟人”。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各个国家，都坚决地奉行着各国、各民族间平等的列宁政策，这一政策得到了东方爱好自由的各族人民的一致赞同和承认。但是，正是列宁的这一政策以及东方各族人民运用苏联经验以建立合理的和公正的制度的愿望，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刻骨仇恨。帝国主义者们竭尽一切力量以维护殖民主义制度。美国帝国主义这个国际反动派的主要力量，竟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企图以新的方法来奴役东方国家。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用尽一切办法在亚非各国排挤英法，以加强自己在那里的垄断统治。而向东方各国提出经济“援助”作为诱饵。他们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军事同盟，缔结了各式各样的军事条约，企图将东方的一些国家与另一些国家对立起来。“艾森豪威尔主义”，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军事委员会，——这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最新货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方各族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特点，就在于这一斗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消灭了法西斯势力（苏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和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这种新的国际条件下进行的。

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而引起的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帝国主义在东方各国的殖民垄断的崩溃，都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东方的一些国家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力量是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并实现着社会主义建设。

战后的发展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以外也已深入千百万人们的意识。甚至在民族独立并非工人阶级领导取得的东方国家里，一些著名的政党和政治活动家也声明，他们想建立社会主义式样的国家，尽管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着原则的区别。东方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特点之一，就在于这些国家里一切公开地或隐蔽地充当殖民主义的走狗而反抗民族觉醒和社会改革的政党和活动家，在政治上日益感到孤立，日益失去信任。

无论是国际条件或国内条件，都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东方新兴独立国家的千百万人们渐渐地理解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际优越性。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国家，还面临着争取经济独立的巨大困难。但是，这些国家基本劳动群众民族觉醒和阶级觉悟的发展，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影响的增长，大大地破坏了殖民主义的威信，孤立了国内支持殖民主义的人，而为实现巨大的社会改造创造了前提。如果有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这些改革可以成为通过和平议会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出发点。

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是对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伟大力量。殖民主义者即使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但在尖锐的冲突进程中也不得不节节败退，而让出自己的阵地。不久前的埃及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摩勒“社会主义”政府积极参加下所发动的帝国主义侵埃战争的失败，以及进步势力对反动派

① “列宁论民族问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第487页。

顛覆匈牙利計劃的毀滅性打击，都使得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現代反動派的主要勢力）咆哮如雷。按照財政寡頭的授意，對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國家加強了思想進攻和顛覆活動，同時，美國殖民主義者——殖民主義的主要支柱——也開始了對東方各民族人民的進攻。帝國主義的維護者用盡一切力量來破壞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日益增長的影響，分裂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團結。但是，與帝國主義反動派對立的，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統一。加強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之間的統一，以及他們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思想基礎上的團結，完全打垮了帝國主義者的陰謀。在現代環境下要堅決保卫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駁斥任何些許脫離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而宣傳所謂民族共產主義的傾向。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根本敵視的“民族共產主義”的鼓吹者，他們之所以宣傳無政府工團主義理論，就在於加強民族閉塞和各國工人之間的隔閡，就在於將一些民族與另一些民族對立起來，將一些共產黨與另一些共產黨對立起來。

各國的共產黨人和工人都給予了而且將繼續給予那些硬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過時的人以堅決的回擊。為國際主義團結着的各國勞動人民，都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看做是自己的戰無不勝的旗幟，它將引導到世界社會主義的勝利。蘇聯政府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證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誼與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和加強。

並非各民族人民警惕地注視着美英帝國主義者的一切陰謀，準備隨時給以回擊，他們以東方各國有助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和乎合作來對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計劃。

並非的年輕國家極力地巩固自己的獨立，着手實現廣泛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計劃。

亞非的各个新國家是渴求和平與進步的，這一點已明顯地反映在具有歷史意義的萬隆會議的文獻中。他們與社會主義國家一起，組成了一條廣闊的可以阻撓帝國主義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和平地

帶。

在這裡，也應驗了列寧關於亞洲之歷史作用的預見，今日的亞洲已與蘇聯一起作出了為和平、自由、民主、和平共處和國際合作而鬥爭的范例。列寧的這樣一句話也應驗了：“……地球上絕大多數的居民都贊同我們的和平政策。”^①

列寧這位國際無產階級和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領袖，已有先見之明地談到：“鬥爭的結局，歸根到底是取決於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這種情形。正是這世界人口的大多數，最近幾年來也非常迅速地捲入謀求自身解放的鬥爭，所以在这个意義上講來，關於世界鬥爭問題的最終解決，不能有絲毫的懷疑。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來，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了保證的。”^②

恩格斯在自己生活的晚年，探討了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問題，預言到了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慘重後果——推翻被打的專制王朝和發生社會變革。因此，列寧寫道：“謝謝地，現在大家都不相信神奇事情了。神奇的預言是童話。但科學的預言却是事實。”^③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事件証實了恩格斯的“科學預言”一樣，列寧逝世以來三十多年的全部歷史經驗也鮮明地証實了他偉大的科學預見和功績，這表現在他非常確切地預言到了“世界鬥爭的結局”，預言到了東方各民族人民在這一鬥爭中的作用。

列寧關於東方各民族人民解放的學說，具有偉大而不可戰勝的力量。現在，帝國主義殖民體系正在崩潰。關於徹底消滅殖民主義制度的問題已經提上日程。東方各民族人民正經歷着解放鬥爭的長期歷史過程，偉大的列寧早就發現了和總結了這一過程的客觀規律，並提出作為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科學理論。東方民族解放鬥爭的空前高漲，鮮明地証實了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學說的國際意義。

（劉榮峻、李毅夫譯，原載“蘇聯東方學”雜誌，1957年第2期）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0卷第365頁。

② “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1032頁。

③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莫斯科中文版，第359頁。

十月革命和殖民制度的崩潰

K·魯金茲

東方在過去不僅始終招引着帝國主義的政客和貪圖暴利的商人，而且也招引着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東方，對於“殖民成功的紳士”說來，這是神話一般的寶山；對於貪婪的冒險家和游山玩水的貴族說來，這是神秘的和奇異的綠洲；這是一片永遠溫順而平靜的人口众多的地方——50年前的東方，在他們的筆下就是這樣。

過去，有一個時期，英國的反動派經常吹噓不列顛帝國是日不落國。過去，孟買的紡織工人和孟加拉的農民、緬甸的稻農和馬來亞的工人、埃及的農夫和阿巴丹的采油工以自己辛勤勞動所創造的財富，都落入了倫敦西蒂巨頭的金庫。凱勒桑竟厚顏无耻地夸耀：英國每消費五英鎊就有一英鎊是從印度敲榨而來。美國壟斷資本家也肆无忌憚地掠奪菲律賓、古巴、波多黎各，并靠“大棒子”支配了整個拉丁美洲。

這種搶劫倒被蒙上了虛偽的榮光。帝國主義的鼓吹者讚美以武力統治東方各族人民，假仁假義地頌揚白種人“傳播文明的使命”和宣傳亞非人民種族“劣等”論。

西方就是西方，

東方就是東方；

不到世界末日審判，

調換不了它們的地方。

列吉亞德·吉卜林就是這樣寫的，他給東方分派了一個永遠處於被西方奴役的地位。甚至第二國際的許多社會黨人也認為東方各民族人民處在從屬於歐美列強的地位是很自然的……

就是在今天，東方也吸引着資產階級作家和政論家的注意。但是，一切都變了！反動报刊万分慌慌地寫道：“亞洲的震蕩”，“亞洲已擺脫控制”，“我們在亞洲的嚴重危機”。美國社會學者孔恩把

我們時代描寫為“帝國以後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非西方各民族人民在世界事務中出乎意料地，迅速地起着越來越大的作用。”真是新的時代，唱新的歌。

是的，從前用自己的昏睡和財富來加強帝國主義的東方已不存在了，代替它的是新的、覺醒的、奔騰澎湃的東方。亞非兩洲解放鬥爭的火焰日益劇烈地燃燒起來。它正燒燬殖民體系的殘余。偉大列寧所預見到的東方各民族人民積極參加決定世界命運的世界史的新時期已經到來。

十月革命結束了過去的、殖民地的東方。蘇維埃國家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始終不渝地以其威力和威信捍衛着被壓迫民族。十月革命賦予民族平等和自由的思想以巨大的、不可克服的力量。上面提到的美國社會學家孔恩不得不承認民族平等和自由的思想已成為東方各民族人民的“新福音書”。十月革命粉碎了種族主義的“白種优越論”的無稽之談。在武裝干涉者幻想把年青蘇維埃共和國變成殖民地的失敗例子上，歷史證明了可以勝利地反擊殖民者。

1956年10月，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在蘇聯報刊上發表的文章里寫道：“這一在亞洲大陸以外有影響的最偉大歷史事件鼓舞了為民族獨立而鬥爭的亞洲各民族人民，加強了他們的信心，他們相信：在維護正義的鬥爭中，只要他們是有組織的、不屈不撓的，他們必將獲得最後勝利。”

十月革命給民族解放運動以巨大的推動力。十月革命的勝利在中國、印度、土耳其、阿富汗、蒙古、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伊拉克等國家引起了反殖民主義鬥爭的高漲。

往後幾年事件的發展更增加了解放運動的新力量。在由於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而動盪不定的資本主義背景之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以及一個大國

从半封建的落后状态向经济和文化繁荣的飞跃发展，则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他所著的“印度的发现”这本书上指出：“社会主义思想和苏联革命的影响引导了我们在经济方面的思维，因而就给我们思维以巨大的推动力。”

殖民制度的“革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巨大高潮。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高表现。法西斯主义的失败也就是殖民主义的失败。战争给帝国主义带来了不可挽救的损失，而给社会主义增加了百倍力量。产生了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有利条件。

殖民制度危机的尖锐化已达到极点，并开始土崩瓦解。帝国主义被迫在亚洲和非洲节节退却。已经有13亿人口从帝国主义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这些人占殖民地和附属国人口的80%。1945年，亚洲殖民地尚有6亿人口，可是，现在生活在殖民制度压迫下的居民只剩下1,600万人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外，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埃及、叙利亚、锡兰和其他国家也争得了民族自由。

旧的，“古典的”殖民制度显然已遭破产。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尼西亚、朝鲜、印度支那、埃及发动侵略战争所遭到的可耻失败是最清楚的说明。

自然，帝国主义者不甘心殖民地的完全丧失的，因为殖民地是他们利润的泉源。

然而，目前从经济上看待殖民地远不是唯一的出发点。在解决殖民地问题方面愈益起着巨大作用的，是想把过去的殖民地国家尽量保留在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使其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的愿望。为此，帝国主义者竭尽一切力量来阻碍这些国家实现其导向独立发展道路的进步措施。

帝国主义者就是承认了某些殖民地的独立，也是竭力保持对这些殖民地的实际的（虽然是隐蔽的）监督。英国和马来亚的关系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英国殖民主义者由于无法用武力镇压马来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而只好决定让马来亚独立。从外表看来，这种行为是值得尊敬的。在马来亚成立了政府。马来亚政府代表不止一次和英国政府谈判。最后订立协定。依据协定宣布马来亚为独立联邦并授予宪法。

骤然看来，宪法好象是真实的。无论如何，在宪法上规定有选举权。可是，正如英国一家杂志中肯的评语所说“毒刺是在尾巴上”。締結軍事協定是賦予憲法的條件。依據軍事協定，英國可以繼續在馬來亞無限期地駐紮軍隊。同時，它有权保留過去在馬來亞建立的軍事基地。

馬來亞工會理事會機關報——“工人之音”在7月16日寫道：以英國和馬來亞經濟條約為基礎的英國馬來亞關係將是主人和附庸的關係。報紙接著寫道：英國殖民主義者依然把馬來亞的工業、商業、財政、橡膠園、煉錫廠以及對外貿易等都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帝國主義的理論家也來幫助殖民主義者。現在他們已不再高唱什麼白種人的“使命”了。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四十年的今天，甚至最反動的殖民主義鼓吹者也不敢再露骨地宣傳東方各民族人民是“劣等”種族的思想了。“新”殖民主義的理論家裝作是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權的保護者。他們反對的只是殖民地的真正獨立。

“新”殖民主義的理論家創造了這樣一種思想：好象“自由世界的利益”高於各个民族的自決權。他們以虛構的“共產主義侵略”的威脅，号召亞非各國人民鑑於自己國家的戰略地位而給西方列強提供建立軍事基地和駐紮軍隊的權利。帝國主義者也用同樣的藉口，勾引亞洲國家參加軍事集團。

現代殖民主義理論家的另一個創作是“互相依賴”理論。為挽救日益瓦解的法兰西殖民帝國，這種理論的捍衛者呼籲北非各族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巩固和法國的聯繫，好象這是為了他們的共同利益。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這種互相依賴的表現是法國利用各种藉口拖延从突尼斯和摩洛哥撤退軍隊，而這些國家的自然財富仍然被法國壟斷組織所掌握。

“互相依賴”理論的邏輯結論就是在“互相依賴”的範圍內不發達國家起着“工業國經濟補充”的作用，也就是起着殖民地所起的作用。美國資產階級科學的代表者，列沙威爾教授在“必須用這樣的政策對待亞洲”這本書里宣稱，亞洲的許多地區不但不應該發展重工業，甚至連輕工業也不應該發展。

這類書籍充當美國國務院的宣傳工具，美國國務院就是堅決拒絕幫助亞非國家建設重工業企

的。例如，刚刚訪問美国的巴基斯坦财政部长阿姆德·阿里想获得美国帮助建設政府設計的木尔坦冶金工厂的試图就遭到了完全失敗。

正当巴基斯坦财政部长訪美期間，美国国际合作管理署駐巴基斯坦代表罗伯特·克里福尔特在游覽巴基斯坦城市后发表声明，反对建設冶金工厂的想法。而且，他竭力使听众相信：“巴基斯坦的发展情况要求在巴基斯坦建立的是工业和农业的輔助部門。”

果阿、西伊里安以及非洲許多国家里殖民制度的保存，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肮脏战争”，对于塞浦路斯島爱国人士的迫害以及对埃及的武装进攻——所有这一切以及其它事实都說明了帝国主义还使用着傳統的殖民搶劫方法。此外，帝国主义还采用新的、更巧妙的殖民政策。

現代殖民制度的頭目

目前国际情况的特点之一，就是美国在广大范圍内进行經濟和政治扩张。美国已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以西歐旧殖民强國繼承者的角色自居；同时在非洲和亚洲又扮演着宪兵的角色。

美国在采用隱蔽的殖民政策方面具有丰富的經驗，对它說来，“新的”殖民制度已不是那样新穎。美国对那些在形式上具有政治独立的国家广泛采用了隱蔽的殖民掠夺手段。华盛顿企图把这种在拉丁美洲試驗过的政策推行到亚非許多地区。

英国著名的政論家T·明捷在“东南亚处在两个世界之間”（1955年在倫敦出版）这本书里，把华盛顿对东方的政策叫做东南亚拉丁美洲化。明捷写道：这种政策“打算支持独立形式，但同时又保証最大限度的战略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特权。”

这种政策将导致什么結果呢？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委内瑞拉的例子中看到。按照美国幸福周刊的說法，这是美国石油资本家“改造过的国家”。

美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超过14亿美元，占全部外資的60%。仅在最近四年，美国壟断资本家获得了14亿6,100万美元的利潤，即利潤超过了基本投資金額。极大部份美国投資投在石油工业。然而，委内瑞拉的其它工业部門并不发展，农业却处在危机中。工业品几乎只从美国进口。

菲律宾的例子也很清楚。菲律宾宣布独立已經十年了，但是仍然保留着五角大楼的軍事基地。而

美国壟断资本家利用特权依然控制着菲律宾的經濟。菲律宾还是落后的农业国。不久以前，美国政府拒絕了菲律宾政府关于对菲律宾領土上的美国軍事基地……行使主权的“过分”請求。

菲律宾众議院議長阿塞·劳雷尔在1956年以充分根据說明：“菲律宾实际上还不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因为菲律宾現在处在新的更狡猾的因而也是更可恶的压迫之下。”

毫無前途

“新”殖民制度的历史前途不会比其前者来得好。导致“古典”殖民制度瓦解的因素，正以更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并决定了“新”殖民制度必遭失敗。

亚非各族人民的忠实朋友——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正在增强。上面提到的明捷已得出这样的結論：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亚洲的拉丁美洲化”注定要破产。

亚非国家的爱国力量把对苏联的友誼当作巩固自己民族独立的决定性因素。伊朗“世界报”在1955年12月28日写道：“我們不止一次地声明并再一次声明：偉大俄国革命于我們不是危害，而是有利。在这次革命之前，我們带着枷鎖，依我們看来，当时我們是无法解放的。如果没有偉大的俄国革命，世界政策不改变，那么这确是不可能的。事情。依靠苏联，我們就能够毁灭其它的桎梏——廢除了用强力加在我們头上的特权。”

东方各国可以毫无顾虑地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在自己的条件下获得經濟进步和独立。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是不附任何政治条件的。这是在各民族互相帮助和友好的伟大思想鼓舞下的大公无私的的支持。

1956年8月，印度駐苏大使克·普·斯·梅农对“真理报”記者发表談話，他說：“苏联在普希拉依帮助建設冶金工厂是工业发达国家真正帮助不发达国家的光辉榜样。”

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各族人民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战綫日益巩固和加强。历史的进程是不能改变的。殖民制度注定要灭亡，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开辟了殖民制度灭亡的紀元。

（元西湖譯，原載“新时代”杂志1957年第31期）

論文

資產階級民族學的危機

С. П. 托尔斯托夫

(一)

近年來，在國外民族學著作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引人注意的特點，這些特點表明現代資產階級民族學特別是在戰後時期已處於嚴重的衰退過程之中。

這首先表現在民族學論壇的中心發生了大轉移。歐洲大陸資產階級民族學的巨大領導中心，差不多已退出了舞台，最低限度也是完全喪失了自己的領導地位。

各種各樣的美國民族學著作，大量充斥於整個歐洲和亞洲。其中有為數眾多的民族學雜誌，有的是固有的，有的是新出的（現在在美國差不多每一個大學都在出版這樣的雜誌）；也有許多研究世界各種的大本專著；有許多理論性綜合性的“解決”一切民族學問題、順便也“解決”一般歷史問題的大部頭“著述”。大批的民族學家的論文，也開始在美國近來迅速滋生的心理學、精神病學、社會學和一般性雜誌的篇幅上出現。此外，在這方面還有形形色色的教科書和教材。

而且，有許多西歐的民族學家也慢慢地變成了“美國人”。美國耶魯大學出版了英國功能學派首腦馬凌諾斯基的遺著“文化變遷之動力”（1945年）；美國還出版了施米特神甫的美國學生季伯爾和穆勒合寫的“原始人的社會生活”（1941年）。

美國的民族學書刊充斥於歐洲馬歇爾化各國的圖書館和書店，正象以“綁架”和凶殺為題材的美國

偵探小說、以及不遜於這些小說的好萊塢電影、爛肉罐頭、旧衣服和蛋粉充斥於這些國家一樣。

美國的民族學著作，不僅數量增多了，而且在質量上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應當說，這些“質的變化”早在戰前時期就已清楚地顯示出來了。

過去，美國民族學主要是記述和研究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帶有十分明顯的地方志的性質；現在，代之而起的民族學，則很少注意印第安人（只限於南美），而加強了對非洲、印度尼西亞、中國和歐亞各國的興趣，多半都帶有理論化的性質，追求“廣泛的概括”，追求“全世界歷史性的綜合”。①

研究加利福尼亞印第安人的“可敬的”學者克萊伯，他用“文化生長的全貌”這個含糊不清的標題出版了一大本書，在書中，他引用了從古到今各種科學、文學和藝術歷史的材料，企圖確立文化上興衰的“神秘旋律”。②研究“蒲埃布洛”印第安人的女學者路絲·別涅迪克特，也寫出了一本大著，標題是“文化模式”。③不大著名的庫普爾和孔恩，則合寫了一本“人類學原理”。④研究非洲的學者格爾什科維茨寫了一篇論文“人類及其勞動”。此外，寫過類似作品的，還有克留克霍恩、米德、林頓、卡爾迪涅爾⑤以及其他等人。

這是象雨後春筍一樣滋生起來的“理論化類型”的美國民族學產品的空前大丰收，這些著作中不負責任和毫無根據的現象，甚至對資產階級著作來說，也達到了特別令人驚訝的程度。不由人不產生一種印象：好象作者們是接受了這樣一項任務

① 參看H. A. 布齊諾夫：“現代美國理論民族學”，載“蘇聯民族學”雜誌，1949年第1期，第213頁。

② 參看H. A. 布齊諾夫的書評，載“蘇聯民族學”雜誌，1948年第2期，第251頁。

③ 參看“蘇聯民族學”雜誌的書評，1949年第1期，第214頁。參看“蘇聯民族學”雜誌，1947年第4期中的拙著。

④ 參看“蘇聯民族學”雜誌的書評，1948年第2期，第248頁。參看“蘇聯民族學”雜誌1947年第4期中的拙著。

⑤ 參看“蘇聯民族學”雜誌的書評，1948年第3期，第186頁。

——儘量多写，不拘题目，不求质量，不要考虑写出来的东西是否有人相信，只要让新世界霸权追逐者的宣傳讀物能充斥于美国和世界书市就行，就象好莱坞老板和偵探小說出版商所做的那样。因为，这些影片小說无疑地也跟剛才我們所列举的美国“文化”宣傳的杰作一样，全都是华尔街走狗們的宣傳臆造。

在这里，我們看到了广泛展开思想进攻的一切征兆。民族学本身也跟德国种族主义作品中的民族学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烟幕，一种伪装，除了广告式的宣傳外，还要使讀者相信它不是普通的东西，而是“高度科学”的作品。

至于这些“著作”中所附的图表是根据哪些材料以及如何編成的，——这是不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图表需要多，因为在学者的著作中是应当这样的。至于这些著作中所引用的是些什么文献以及它們与其宣傳的思想有些什么关系，——这是不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在每本书末要附上长长的参考书目，因为在学者的著作中是应当这样的。至于科学批評很容易剥去这一层外壳而暴露出这些“学者著作”的醜恶实质，那也不是什么太要紧的。只要遵循一些老原则：“数量多些，价錢賤些”，“胡扯胡扯，总会留下些东西”，也就可以不去理会批評。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批評都能批評到的；而且在已被揭穿的“著作”的地方，又已出现了按宣傳軌道运行的新“著作”。即或是它被揭穿了，它也能在无耻的勾当中起一点点作用，成为今日帝国主义侵略思想——种族主义——麻痺讀者意識的可怕毒素。因为，华尔街的走狗們，也正象希特勒的文墨强盜一样，是打着这种仇視人类的思想旗幟出現的，这种思想有时被飾之以新的“心理种族主义”的色彩，有时则赤裸裸的一点也不加掩飾。

“希特勒开始其发动战争的事业，是从宣布种族理論，宣布只有操德語的人才算是优秀民族开始的。邱吉尔先生开始其发动战争的事业，也是从种族理論开始，断言只有操英語的民族才是优秀的而应主宰世界命运的民族”（斯大林語）。①

(二)

在20世紀20—30年代，资产階級民族学发展中的主要傾向，还是伪历史主义，黎克特的所謂“历史主义”，尖锐地反对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規律；到了40—50年代，则一眼就可以看出完全对立的傾向——强烈的反历史主义。現代资产階級民族学中两个势力最大的学派：英国的“功能学派”（現在在美国也得到了广泛的傳播）和美国的所謂“心理学派”，正是在自己的身上打上了这样的烙印。这两个学派都是忠心不二地服务于帝国主义的。英国功能学派的美国追隨者和繼承者車普尔和孔恩，他們这样地肯定了功能学派之父馬凌諾斯基及其同道者的“成就”：“……約在20年以前，（民族学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这时，許多权威人士开始認識到：民族学可以被殖民行政当局局用之于調整白人和“原始”民族之关系的特別領域。不列顛政府首先作了这个发现，并在实践上加以运用，而且定了一个規章：凡是在土著民族中間工作的殖民官吏都应当成为熟练的民族学家。按这一規定，有許多人能够受到布朗尼斯罗·馬凌諾斯基教授的培养，这无论对政府或对土人（！），都是极其幸福的事情。”②

“极其幸福的事情”还在于：馬凌諾斯基（奥属波兰人，服务于英国，他由1914年被拘留于特罗布里安群島的“文職战俘”一跃而变成了英国殖民官吏和民族学家的教师）善于将民族学用来适应于殖民当局的需要，而提出了四个基本的、实质上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也不是怎么太新鮮的、可是对殖民地的“主人”却是非常有益的“理論”原理：

一、不要去研究殖民地各族人民的历史，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历史，即使是有的話，反正也是不可理解的；

二、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文化”，这是由社会上各个个体的生理（通过心理）所决定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之功能的总合；

三、因此每个殖民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都是某种平衡的体系，这种体系是不能加以破坏，也

① 1940年3月14日“真理報”。

② E.D.Chapelle and O.S.Coon, Principles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1944, p. 4. 为了避免混乱，我們在所有的地方（除了書名和文章的标题而外）都将把英文中的“Anthropology”一詞改譯为“民族学”。

不需要加以破坏的，因为通过当地的首領与傳統的社会制度和习俗来管理“土人”要比較容易得多；需要的只是弄清楚这些习俗和制度的功能，然后将它們用来为自己服务；

四、因为灌輸歐洲文明（例如：学校教育超过了便于“白人”利用“黑人”劳动力所需要的最低限度）就会破坏这种平衡，所以应当使落后民族永远处于落后状况——这样的管理就可以便宜得多，而且也放心得多！

上面所提到的馬凌諾斯基的美国追隨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正緊張的时候，则提出了进一步利用自己英国老师“应用人类学”的“肯定經驗”——不仅把功能学派的“理論”和实践用之于殖民地民族，而且也用来对付歐洲人和美国人：“进一步扩大活动的范围，就要确定这样一个事实：凡是适用于野人的，也将同样适用于我們自己的社会”。

●两位作者一致認為在这方面作出了特別功績的要算華涅尔教授，因为他曾將自己在北部澳大利亞人中間工作的經驗“同样成功地，而且是更加有益地”运用于研究歐美社会。正是他在把民族学方法应用于西方电气公司的研究方面給予了主要的影響，哈尔瓦德行政事务学校的教授列斯利士柏格爾和西方电气公司的狄克逊在他們合写的“管理与工人”一书中对此方法作了很好的敘述。

这样一来，殖民行政管理的“科学方法”，則被“更加有益地”搬到对資本主义企业工人的管理上来了。

(三)

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展开了一个思想“运动”，其特点就是一方面要大量出书，一方面思想和創造性又日益貧乏。甚至連仇恨人类的謾言，希特勒分子自己也无能制造，而要跑到19世紀前期和中叶最反动的民族主义著作的垃圾堆里去寻找自己的主要“思想”。●

德国种族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从18世紀末—19

世紀中叶美国奴隶主思想家那里借来的，是从19世紀前半紀德国民族主义哲学家那里和法国封建地主反动思想家戈比諾伯爵那里借来的。

最新的美国反动派在自己的种族主义理論方面也很少有什么独创的东西。如果談到民族学这一領域中的种族主义表現，可以認為現代美国种族主义民族学家的主要老师，首先是納粹主义的解罪神甫之一、德国反动哲学家、“西方之沒落”这本轰动一时的著作的作者奧斯渥特·施本格勒和反动的奧地利心理学家齐格蒙德·弗洛伊德；其次，还有同样反动的英国殖民主义民族学的代表人物、英奧波三重国籍的民族学家布朗尼斯罗·馬凌諾斯基●；还有納粹主义的直接思想战友、“消除生殖机能”思想的倡領者、反动伪科学“优生学”的創始人、英国的黑帮分子高尔頓和皮尔逊；至于他們直接从德国种族主义的武庫中、而后从美国自己的“民族”遺產（19世紀前半紀黑人奴役者的創造）中大肆搬用的东西，就更不用去談了。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美国哲学实用主义和心理學“行为主义”的“民族”調味料，便做出了一鍋臭气熏天的大杂燴，就象莎士比亚在描写女巫做菜时所說的那种情形一样：

圍着煮鍋急急忙忙地走！

快把毒心乱肺往里投。

.....

沼澤里的火蛇一条肉，

在鍋里連煮帶燒烤个透；

蜥蜴的眼珠，青蛙的脚趾，

蝙蝠的黑毛，惡狗的舌头，

毒蛇嘴里的細叉，毛虫的刺，

貓头鷹的翅膀，壁虎的腿，

煮啊，煮一鍋灾禍叫人人都遭殃，

煮啊，煮成地獄里的一鍋湯。

.....

使勁地煮啊，使勁地攪！

火头冒啊，冒它滿滿一鍋子泡。

● 同上，第5頁。

● 關於這個問題，請參看拙著“种族主义和文化圈理論”。載“种族科学和种族主义”文集。“国立莫斯科大学人類学研究所著作集”第4集，1938年版，第137—170頁。

● 參看H. A. 奧利选罗格和M. H. 波切兴：“为英帝国主义服务的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譯文載“民族問題譯丛——民族学專輯”第164—184頁），以及拙著“民族学中的苏維埃学派”（譯文載“苏維埃民族学的发展”，科学出版社版，第1—30頁）。

(“馬克白斯”，第4幕第1場) ●

在反击德国法西斯主义（它的思想基础——生物种族主义，已在广大居民阶层的心目中遭到破产）的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的今天，要想毫无掩饰地重新运用种族理论来作思想武器，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诚然，为了“用于内部”，考虑到美国当地“盛行的”种族主义传统，至少在一部分美国“白人”中间，生物种族主义还是可以受到欢迎的。②

但是，作为“出口”，这种货色就显然不大合适了；而且，就是在美国本土，广大的人民群众和进步的知識分子也不是什么太好的傾銷市場。所以，美国种族主义的基本趋向便是与“美国生活方式”的思想、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优越”的思想、与西方文明”的思想联系起来了。施本格勒关于“文化模式”的观念，以及弗洛伊德关于每种“模式”有其“行为”类型的行为主义論断，乃是这些思想的“理論基础”。在这些东西的掩飾之下，同时还动用了馬尔薩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的露骨的种族主义思想。

(四)

大家知道，奥斯特·施本格勒是德国反动民族学家列奥·弗罗伯尼烏斯的学生和同僚，但他比起自己的老师倒要“聞名”得多，他在自己所著“西方之没落”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好象是一种活的有机体的思想。它們好象也經歷着“胚胎时期”、“幼年时期”、“成年时期”和“老年时期”（逐漸成长为“文明”），它們也在“生长”和“死亡”，它們也象唯心主义者对生物有机体的看法一样而具有决定文化个性的“灵魂”（弗罗伯尼烏斯用希腊字給这种灵魂起了一个学术名称——叫做“派德烏瑪”）。③

施本格勒探索了三种“文化”的历史，这三种“文化”——即东方文化，他們称之为“阿拉伯文化”，附着的是“巫术灵魂”；古典文化，附着的是“阿波罗灵魂”；西方文化，附着的是“浮士德灵魂”。

其中，每一种文化都是独自存在的和不可重复的。如果說“阿拉伯文化”和“古典文化”很早就已没落，就已不在人世間了的話，那么，照施本格勒看来，“西方文化”、“浮士德文化”在19世紀还只是进入“文明”的第一阶段，在它的面前尚有“两个文明阶段”，历时将不止一百年。不过，为此却需要……德国人的世界統治。法国人和英国人，这些“浮士德灵魂”的低能体现者，已被施本格勒宣判死刑。他們的創造力已經枯竭，他們的文化已經完成了自己发展的一个輪迴。至于德国人，則是另一回事：他們的毁灭还“在遙远未来的迷霧之中”。同时，施本格勒恶毒地詆毀馬克思主义，好象馬克思主义与“德意志精神”是絕對不能相容的，妨碍了“浮士德灵魂”之偉大远景的实现。他大力宣传“普魯士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被理解為一种特殊的国家資本主义的，其中已經显露出了后来已遭可耻失败的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极权国家”的雛形。

虽然施本格勒有时也十分尖锐地批評黑格尔，但是，就是在这些伪科学的神密的謊言背后也不难看出他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基本环节相联系的蛛絲馬迹，照这种“历史哲学”的观点看来，“宇宙精神”是在自东而西的道路上“漫游”于“东方世界”、“希腊羅馬世界”和“德意志世界”的。而在后一个世界，世界历史則达到了“普遍性和主观自由”，这只是在……普魯士王朝才可以实现的。但是，在施本格勒那里，黑格尔显得比他本来更加反动，因为施本格勒的观点完全摒弃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有力的方面——即普遍联系的思想，世界历史发展統一过程的思想。施本格勒的“文化”和“灵魂”都是孤立自在的。施本格勒的“文化灵魂”乃是德国种族主义者所謂“种族灵魂”的直接雛形，正象施本格勒的“普魯士社会主义”就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雛形一样。

美国民族学中施本格勒学派的奠基者，就是上面我們所提到的研究“蒲埃布洛”印第安人的女学者、鮑亚士的学生——路絲·別涅迪克特，她在

① 参看：莎士比亚：“馬克白斯”，新文艺出版社版，第59—60頁。

② 参看：M·T·列文、R·R·罗金斯基、H·H·切波克薩罗夫合写“英美种族主义”（譯文載“民族問題譯丛——民族学專輯”）和H·H·莫查林“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种族理論”（原文載“哲学問題”1948年第2期）。

③ 参看拙著“种族主义和文化圖理論”一文。

1934年就发表了她那轰动一时的大著“文化模式”，书中她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根据民族学的材料审查和论证施本格勒的“理论”。她写道：“从民族学方面来说，施本格勒的世界文明图景就是苦于需要……解释最新的社会分裂的社会好象具有同一的民族文化。要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下进行必要的分析，西欧文化的历史材料就嫌过于复杂，社会分化也过于荒远……我们之所以要对原始民族进行研究的哲学根据之一，就是比较简单的文化事实可以使得那些已变得纷乱而难以说明的社会事实显得比较清楚……至于个体行为模式在傳統习俗影响下如何形成的问题，现在最好也能通过比较简单的民族的研究提了出来”。①

这种错误的反历史的为资产阶级民族学和社会学普遍持有的观点，这种认为在原始社会就以“比较简单的”形式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切现象而其间只有量的差异的观点，这种早已为列宁在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中所及时驳斥了的观点②，近来，倒象一根红线一样地贯穿着美国时髦民族学的著作，差不多已成为他们的基本准则。果然就是如此，别涅迪克特马上就开始了“寻找”好象符合于施本格勒“分类”的“阿波罗灵魂”和“道尼苏斯灵魂”的类型（或用她的话来说，即“文化模式”），其实，发明这种名辞的“荣誉”应当属于种族主义的“经典作家”，19世纪最反动的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尼采（“阿波罗灵魂”一语他早已造出，施本格勒只是加以传播而已）。

楚尼人（“蒲埃布洛”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好象就是“阿波罗文化”的例子③；不过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主要的还是“道尼苏斯类型”，这种类型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④，以及别涅迪克特所特别描述过的西北海岸的瓜基乌特人

⑤。除了这两种类型而外，她在安特卡斯托群岛的多布岛和新几内亚东南的巴布亚人中间又“发现了一种类型。别涅迪克特对于多布人的描述，主要是根据“多布人的巫师”⑥一书的虚浮作者福尔秋的材料；她所作的描述，乃是一个弱小的，在殖民压迫之下过着贫苦生活的、遭受着“黑鸟猎捕者”⑦残酷制削的、从事剥削农业的勤劳民族进行恶毒诬蔑的典型例子。多布人的民族性格，竟然被描写成这个样子：好象他们“极端仇视（全世界的人民）和十分凶恶；大多数社会都是用自己的社会机关使其局限于最小限度，可是，多布人的机关恰相反，倒是使其达到最高的程度。多布人生活在宇宙恶意安排的人类梦魇的压力之下，照他们对于生活的观点看来，人们的善行就在于挑选牺牲，因为在牺牲的身上可以宣洩出他们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势力的怨恨……多疑和残忍——这是他们在斗争中久经锻炼的武器，他们从不怜悯别人，也从不求怜悯”。⑧

这种可恶的诽谤距离实际情况是那样之远，我们哪怕就是根据伟大的俄国学者、19世纪的民族学家米克路霍一马克莱这位真正客观的观察者对于马克莱海岸巴布亚人所作的完全相反的描述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人种方面、文化方面或经济结构方面，这些巴布亚人都没有什么与多布人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仅仅认识一个欧洲人——这个人米克路霍一马克莱，而不是海盗，也不是传教士。这种对于整个民族的恶毒歪曲，乃是对于施本格勒所谓“巫术的”“东方灵魂”的翻言的一种特别的折射反映，它成为无休止地谈论什么种族主义心理性格的材料（例如，多布人以及“道尼苏斯”瓜基乌特人被宣布成为“侵略病狂者”⑨）。路丝·别涅迪克特在麦克阿瑟总部工作，她根据战略服务处的任

① R.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Boston a. New York, 1934, p. 55.

② 参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34页。

③ 参看别涅迪克特上述著作第80、234页。

④ 同上，第80页。

⑤ 同上，第175、177等页。

⑥ R. F. Fortune. The Sorcerers of Dobu. New York, 1932.

⑦ 在大洋洲殖民主义者那里，“Blackbirding”（“猎捕黑鸟”——是一句黑话，意即“诱拐黑奴”）这个“美妙”的名词，是用来表示“征募”美拉尼西亚人到昆士兰种植园去从事半奴隶劳动。参看：卡托列夫：“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民族人民现代状况的研究”，载“苏联民族学研究所简报”1949年第7期第19页。

⑧ 参看别涅迪克特上述著作，第172页。

⑨ 同上，第238页。

务对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于1946年发表了一本著作，并给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书名——“猪与剑”^①。她在这本题材性的著作里断言：日本人的内部世界完全不是由意识调节的。

这样，在美国民族学的发展上便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即开始形成施本格勒—弗洛伊德理论体系，它们将世界各族变成神经病患者的集合，变成某种规模巨大的疯人院，这自然需要“精神病学家”来照看了。这个角色已经派定，当然是属于“优秀文化模式”的代表者，属于美国帝国主义者；路丝·别涅迪克特及其追随者正殷勤地用“民族精神病学”的教科书给他们以武装——象科拉·杜布哇、拉里夫·林顿、阿布兰·卡尔迪涅尔、格列哥里·巴蒂逊等作者的一套“著作”，真是难以名之，姑且叫它“民族精神病学”。

凡是在路丝·别涅迪克特“文化模式”一书中所出现的东西，在这里都获得了种族主义恶毒谰言的完备特征，不仅对多布人，而且对其他数十个被宣布为心理不完善的民族进行可耻的谰言。路丝·别涅迪克特完全同意施本格勒的观点，也认为一种“文化模式”的代表不能了解另一种“模式”的代表。这些模式都是“不能互相了解的”。^②大草原“道尼苏斯”印第安人认为很自然的东西，在“阿波罗”楚尼人看来则是失常的表现，反之亦然。一个多布人如果按照美国人的所谓“好小伙子”的观念来做，那末，从自己“巫木的”同族人的观点看来，则是一个危险的疯子。^③在路丝·别涅迪克特书中还是非常谨慎地运用的弗洛伊德主义观点，现在在她的追随者的著作中已成为了中心思想。弗洛伊德主义的丛体“仇恨母亲”，科拉·杜布哇则将它作为诽谤阿洛尔岛印度尼西亚人的基础，以压缩的形式重复着别涅迪克特对于多布“文化模式”的

描述。^④

1946年，卡尔迪涅尔给科拉·杜布哇关于印度尼西亚人的描述作了补充，认为印度尼西亚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愿意成为侵略的对象和愿意接受提出的和平条件”^⑤（顺便说，别涅迪克特和福尔秋在多布岛老年“巫师”中间也发现了类似的特点^⑥），显然，他是用（美国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东西代替了实际的东西。“龙虾喜欢被別人活着煮”——这是“献给年轻主人的礼物”这本赫赫“名著”的作者当时所写的。可是，在这位作者那里还只是荒诞奇谈的东西，现在已成为杀人犯血腥手段的组成部分。一些学术走狗力图使全世界相信：他们的牺牲者最高兴美国强盗所分派给他们的“活煮龙虾”的角色。这种认为每个民族好象都具有独特的“基本个性”和“文化模式”的观点，乃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干涉他国内政的思想“根据”；好象每种“文化模式”都是一个闭塞的世界，任何民族单靠自己的力量都不能走出这个世界；只有依靠“高级”“文化模式”的代表“帮助”（当然是强迫性的帮助），“低级模式”的代表才能脱离象“多布”或“阿洛尔”这样的梦魔世界，才能掌握“美国生活方式”这种臭名远扬的“西方文化”的“模式”。

这样一来，新施本格勒主义最后也得出了与老牌施本格勒主义同样的结果——即侵略性的种族主义和世界统治的荒谬思想，当然，这一次不是由德国帝国主义而是由美国帝国主义来称霸了。不过，西方占领区的德国反动派，现在仍然不遗余力地企图证明他们与“西方人类”有关，与“西方思想”有关，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侵略性的军事同盟之上——如“北大西洋公约”、“西欧联盟”、“欧洲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⑦

1944年出版的克娄伯的大部厚书“文化生长的

① R.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Cambridge, 1946.

② R.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p. 223.

③ 同上，第258页。

④ C. Du Bois. The people of Alor. New York, 1944.

⑤ A. Kardiner. The psychological frontiers of Society. New York, 1946, p. 170. 当然，作者还应当加上：在我們文明世界，这样一种对待侵略的态度只有在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中间才可以见到。”

⑥ R.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p. 130.

⑦ 参看：П. Ф. 杰尼索夫：“德国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新的伪装”载苏联“哲学问题”1948年第3期。

圣貌”^①（对于这本书迄今在美英民族学杂志上仍有許多“雄辯家”在那里爭論），可能是現代資產階級“理論民族學”在思想上已發生深刻衰退的最鮮明的例証。這種對於施本格勒的可怕的模仿，只是歸結為胡亂列舉各個時代和各個民族的文化活動家，而且連生死年代都不盡確切；在這裡，克萊伯也學習自己老師的榜樣，企圖抓住文化“生長”的某種規律（他也是按照施本格勒的“文化形態學的”圖式來理解文化的），企圖闡明文化的最高峯，闡明文化高漲、繁榮和衰敗的各個時期。

如果說施本格勒在自己的“文化形態學的”圖表中只限於印度、“阿拉伯世界”（包括拜占廷和整個“穆斯林的”東方）、古典世界和整個“西方”的話，那末，克萊伯在這個圖表中又添加進去了中國、日本、印度尼西亞、印度支那，以及差不多所有的歐洲國家。特別是最後這一點，便使得他對於一切詬誶俄羅斯人民和全體斯拉夫人民的捏造（當然不是什麼獨創性的）都可以居功請賞。在這裡，在許多專門談到“邊沿歐洲”民族中間的斯拉夫民族的篇幅里，我們可以找到作者以學者面貌所搜羅的早已被揭穿了成套謊言。

克萊伯不只是對於俄羅斯人和全體斯拉夫人總是這樣不禮貌。例如，他還認為：在哲學史上“西班牙、意大利和東歐根本就沒有取得任何成就，無論如何也沒有達到寫出大量作品的程度”。^②馬克思活潑的時代被說成是德國哲學衰退的時代（^③），而認為康德達到了德國哲學的頂峯；現代哲學思想最偉大的代表者列寧和斯大林的名字，他却一字不提。這位作者也和施本格勒一樣，總要忽視生產力發展史這樣的“細節”；他也和自己的教父一樣，企圖在無休止地議論各個時代“文明”“生長偏差”的背后來掩蓋由生產力發展和階級鬥爭所決定的人類進步發展的一般規律，因為對於這些東西進行分析就會看到資本主義的必遭毀滅。

在這本書的序言中^④，克萊伯極力提醒讀者不要得出“錯誤印象”：好象作者賦予歐洲文化的意

義大於其他文化（順便說說，施本格勒也作過這樣的聲明）。但是，這種“提示”却很少起作用，因為這本書大厚書有四分之三以上是在議論臭名昭彰的“西方文明”。不由得人們要問：克萊伯是怎樣走向“這種生活”道路的呢？究竟是什麼東西迫使一個數十年成功地研究着加利福尼亞印第安人生活的人突然墮落到荒謬而草率地議論他所一無所知的事物呢？“時代的征兆”如此，華爾街的“階級要求”如此。現在，美國主子對印第安人已不大感興趣了。美國的民族學家們應當顯身手，“拿出貨色來”，^⑤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過去一位受人尊敬的、現在却向自己的主子搖尾乞憐的學者如何矯揉造作的一幅悲慘而難堪的圖畫，因為他的主子是不高興他白吃面包的。

在大西洋的彼岸，克萊伯的矯揉造作得到了另一位老頭、過去曾聞名一時的研究古典世界的英國考古學家、八十高齡的約翰·近列茲先生翻翻起舞的支持。

為了回答克萊伯的這本大著以及他在英國的講學，近列茲在英國一家主要的民族學雜誌的篇幅上趕制了一個荒謬的“泛人類文化”的世界主義觀點，好象這種文化可以通過中世紀的“基督教文明”溯源到希臘羅馬的古典時代，好象這種文化就體現為現代的“西方文化”，好象從16世紀起它就已開始變成為“泛人類文化”（世界文化）。與這種文化相對立的，便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古代野蠻世界的直接繼續^⑥。高齡的馬爾布魯克也準備走上反對蘇聯“野蠻世界”保卫“泛人類文明”的征途。這場場面真是壯觀！

路綫·別涅迪克特的追隨者，積極地投入了美國壟斷組織為配合自己建立世界統治而開展的思想“運動”。例如，巴蒂遜在“原子科學公報”（第5—6，7—8期）這家與民族學相去十萬八千里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軍備競賽的模式”；在這篇文章里，一方面企圖確定軍備競賽的“民族心理的”前提（他確定了三種決定各民族人民性格的民族心理

① A.L.Kroeber, 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 Barclay a. Los Angeles, 1944.

② 同上，第62頁。

③ 同上，第60—61頁。

④ 同上，第25頁。

⑤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2, No 3, p. 339; 參看“蘇聯民族學”雜誌，1949年第1期第213頁。

⑥ “Man”, 1948, No 1.

“模式”——即盎格鲁撒克逊类型、德意志类型和俄罗斯类型），另一方面企图在对新几内亚巴布亚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管理形式进行民族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强大的世界政府以“限制民族主义”的方案——大家知道，这个方案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只有一点算是独创的地方：那就是它是以民族学和心理学的两方面的论据作基础的。

施本格勒思想在英美民族学中的发展的结局便是如此。

(五)

大家知道，种族主义都有两副面孔，而且是密切相连的。如果说一副面孔是兽性的好战的沙文主义的面孔，向着外面，为宣傳侵略战争，宣傳世界統治的荒誕思想服务的話；那末，另一副面孔則向着里面，向着本国内部，为宣傳“阶级和平”服务，力图模糊阶级矛盾，（老牌种族主义）用生物学现象的作用或（新牌种族主义）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现象的作用来解釋阶级分化和阶级对抗。●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选择”思想，也服务于美国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被他們用来解釋社会分化（阶级分化）。高尔顿和皮尔逊的“优生学”思想（与魏斯曼摩尔根的反动生物学血肉相連），在美国不仅得到广泛的宣傳，而且在立法的实践中早已有了反映：在美国許多州里都通过了对“不完善者”强迫“消除生殖机能”的法律。●此外，对于社会分化作心理学的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釋，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它把美国社会各个成員在物质状况上的差异說成是由于他們心理上有差异，由于那些在“民主”美国未能获得物质福利的人們心理上的不完善。这样一个不大光彩的任务，却吸引了許多多卷的“专著”（这些“专著”是由“现代公社研究”学派組織起来的）——首先是描述新英格兰和中央各州无名小城的居民的“新英格兰丛书”和“普兰维尔丛书”。积极参加这些“著作”的出版工作的，除了我們已經知道的林頓和卡尔迪涅尔以外，还有华涅尔、多拉德、威斯特以及其他等人；这些“著作”基本上也是运用的科拉·杜布哇在描述阿洛尔人时所运用的方法。他們特別注意到研究性生活的各个方面：許多“研究家們”在对幼

年儿童进行性教育的問題上特別不厌其煩，而給予遺精、手淫等等“民族学”現象以大量的篇幅。他們对于黑人和白人的性交問題也非常注意。

由于这些“著作”而造成了一幅虛妄的图画，它的基础就是关于“基本个性”好象形成于生命的最初几年，而后决定着一个人的整个生活道路的伪科学的議論；在这幅图画里，占着中心地位的是以人們的“恶劣教育”解釋人們的恶劣状况。那末，由于自己的“恶劣教育”而处于最恶劣的状况之下的，自然是黑人和剛来的移民以及他們的后代了，因为他們还没有来得及自幼习惯于“真正美国”行为的“善行”原则。比如，“新英格兰”的居民在物质福利方面好象就是严格按照种族和民族的特征进行分配的，其次序如下（遞降）：新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兰西人、犹太人、意大利人、阿尔明尼亚人、希腊人、波兰人、俄罗斯人。

所有这些半淫秽的作品給予人們的都是美国城市生活的歪曲图画，就象对于美国心理种族主义者已經研究过他們的“基本个性”的那些多布人、阿洛尔人、爱斯基摩人和其他殖民地民族的輕蔑性的描述一样，仿佛如实地記述城市和人民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对于阿洛尔人也没有必要这样“客气”）。而且这些“著作”的发表經常都是“匿名”的，这便为肆无忌惮的捏造开辟了广阔的場所。

种族主义与社会意識是不可分割的，后者乃是前者的一个組成部分。如果說施本格勒宣傳的是“普鲁士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这是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它的主要的“創造者”好象就是普鲁士国王；如果說在希特勒匪徒那里，施本格勒思想得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名称；那末，可以說在美国种族主义者那里，这一思想是在“西方民主”、“自由經營”、“美国生活方式”等等名目之下出現的。車普尔和孔恩，以及数十个其他作者，都口沫飞溅地力图証明：在美国已沒有任何阶级存在。阶级好象是属于150年以前的事情，現在已完全消失了。好象只有南部各州黑人的状况，才算是阶级現象的殘余。

这样一来，阶级压迫最为露骨的梦想世界，华尔街老板、亿万富翁、銀行巨头、下流文人、貪官

● 参看：布齐諾夫：“美国民族学中的心理种族主义”一文第三部分，譯文載“民族問題譯丛”1950年第6期。
● 参看：列文等著“英美种族主义”一文第三部分末，譯文載“民族問題譯丛”民族学專輯。

污吏和流氓地痞的世界，“联邦調查局”、私刑审判、失业、贫困和种族歧视的世界——則被描写成了人世天堂；不过，在这里一个人要是心理上不完美的話，他就不能充分享受天堂幸福。無論是在这种欺騙宣傳方面，無論是在对其他民族的种族主义誹謗方面，这些美国民族学家都是罪恶很大的，他們將自己的科学用于卑下的目的，他們把自己的科学良心和荣誉出賣給“黄色魔鬼”（“黄金”）。

（六）

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危机早已开始，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发展早已开始走下坡路。这个时期开始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初，这时，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論——馬克思主义已在民族学领域中（以及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取得了主要的阵地，迫使资产阶级思想家匆忙地轉向防御，清洗青年时代的“罪恶”，抛弃过去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代表所发表过的一切大胆的思想。从斯塔尔克和惠司特馬克，经过拉采尔和弗罗伯尼烏斯，经过格列布涅尔和施米特，到馬凌諾斯基和里格利夫·布朗，展开了这条资产阶级民族学墮落的道路，——即摒弃“进化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迷誤”和“偏差”的道路，摒弃历史进步思想的道路。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与资产阶级民族学这一衰退过程同时发生的，还有大量新的材料和历史文物繼續积累的过程；这些东西虽然常常是以伪造形式出现在讀者面前，但是，只要加以应有的批判审查，也仍然可以应用于真正的科学研究和概括。里格利夫·布朗（关于安达曼人）和馬凌諾斯基（关于特罗布里安島人）的早期著作，不管作者的傾向如何，畢竟是仔細收集了一些对于研究現在处于殘余状态的原始社会的历史非常重要的民族学材料。美国“鲍亚士学派”的著作，尽管带有边志的色彩，也仍然是民族学文献的重要蒐集，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認真記載下来的为数众多的民間文学材料。但是，这样一个时代已經相去很远了。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学作品中，很难找出一本书其中的材料不是经过苦心泡制的，我們难以将客观調查的民族学材料同施本格勒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行为主义等等学派的“神奇”幻想所捏造的材料区分开来。

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施本格勒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作为現代美国种族主义基础的东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曾在中欧同盟的战败国各国风行一时。不过，这些东西的影响在德奥两国境外并不太大。至于施本格勒的那本书取上一个征兆性的标题——“西方之没落”，不是不为无因的。由于失败而产生的深沉的悲观情绪和复仇心理，由于失败而激起的兽性的民族主义，以及他們不仅想动用武力而且想把群众的革命精力轉入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軌道以鎮压革命群众的愿望，以及他們想在动物学中，在垃圾堆中寻找下意識和性慾的材料以毒害群众思想的試圖——这就是战败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意向。

在今天，驟然看来，情形好象恰恰相反。施本格勒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很快就已組成美英种族主义完整体系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却首先在资本主义战胜国各国掀起了一股秽流。而且在唯一的一个没有遭受战争灾害、用別人的手打仗、反而在战争中大发其财的资本主义“战胜国”——美利坚合众国，这股秽流显得特別汹涌澎湃。

那末，对于这种好像是同样事件产生相反結果的現象应当如何解釋呢？这对“文化生长的全貌”等等图式的編造者确实是一个需要大絞腦汁的难题。然而，这种相反的现象只是一种假象。帝国主义的美国，从它对希特勒德国的帝国主义战争来講，它成为了胜利者；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更加重要的冲突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的斗争中，它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煽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原先是指望他們能够假借希特勒的魔掌来扼杀苏维埃国家、指望苏联在战争中一蹶不起而不得不听任杜魯門和邱吉尔的蛮横指使的，——但是，他們的如意算盘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苏联承担了战争的主要重担，尽管流尽了鮮血，遭受了惨重的損失，但在战后却变得更加强大了。帝国主义战綫的缺口却愈益扩大。在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与苏联并肩而起的还有欧洲和远东各人民民主国家，还有偉大中国的六亿人民。我們这个星球上已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离开了帝国主义的豺狼世界。而且，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战胜国），在帝国主义的

堡垒——担任资本主义世界宪兵角色的美国，劳动大众在结束战争时已不是参加战争时的那样的群众了。掌握了全体进步人类，掌握了世界上一切善良人民的强大和平运动，乃是证明那些无耻的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匪徒之软弱无力的一个鲜明的而令人信服的证据。

正是由这里产生了深沉的悲观情绪，他们只好歇斯底里地叫嚣什么“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也正是由这里产生了想以弗洛伊德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荒谬思想来麻醉美国本土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成千上万奋起斗争的普通人民的愿望，他们竭力煽起沙文主义的本能，唆使西方各国人民仇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好象是我们破坏了“西方文明”的理想。在与歇斯底里的战争叫嚣、原子恐吓和发动细菌战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散布种族主义的毒素。于是美国的民族学家便双手承担了这种

散毒的龌龊勾当。

现在，已不再有家长统治的、研究边志的、发表过许多关于印第安人民间文学的多卷大著的“鲍亚士学派”存在了。有的只是一些戴着“学者”面具从事间谍活动的帝国主义侦探、宣传仇视人类的种族主义思想的政客以及放荡不拘的黄色作家等等的团体，他们只会以弗洛伊德主义的淫秽作品和其他民族的无耻诬蔑来毒害人民。

诚然，有时在这些无耻之徒的大合唱里偶而也可以听到个别回忆过去“美好时代”的声音，回想当时民族学家“虽然很穷，但非常纯洁”，大家都从事于自己正直的事业。毫无疑问，这些懦怯的声音反映着美国民族学界许多正直人士的意见，他们厌恶民族学运用于今天的目的，他们想改变现存的情况。但是，黑帮反动思想和法西斯恐怖却压倒了这些声音。

(李毅夫译，原载“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英美民族学”文集)

列宁的民族政策 (上接44页)

作用，而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不顾历史事实，往往只

重大意义。

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介绍了列宁这些信(1922年9月27日和12月30—31日的日记)的内容和意义；

C·提塔任利：“我们为什么是国际主义者？”——“青年近卫军”出版局1956年版，共47页。

在这封信里批评了斯大林拟定的“自治化”纲领，并指出了各苏维埃共和国在自愿和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道路。

B·B·彼得列夫斯基：“列宁在建成苏联中的作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6年第3期，第13—24页。

这本通俗的小册子说明了什么是国际主义，指出了各民族友好和平等原则的苏联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特点。作者指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中以及在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在苏联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中，都切实体现了国际主义和各民族友好的思想。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广泛地利用了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列宁的著作，说明了列宁在建设苏联中的领导作用。

同时并参阅：
Г·帕加洛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力量”——“党的生活”，1956年第11期，第9—18页。

И·П·查米扬：“苏联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哲学问题”杂志，1956年第3期，第16—31页。

Г·帕加洛夫和И·拉依穆利夫：“不，这不是民族特点”——“党的生活”杂志，1955年第11期，第40—44页。

在这篇论文里阐明了我国过去被压迫各民族发展苏维埃国家制度的道路，说明苏维埃联邦是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得到解决和全面发展的一种形式，强调指出苏联形成(根据列宁倡议成立的)的历史意义。作者指出了苏维埃国家制度对发展各社会主义民族的决定性影响，以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旨在扩大各苏维埃共和国在管理国民经済和文化建设方面权限的措施的

两篇论文的作者，根据具体事实，说明了封建巴依对待妇女的残余思想的危害，批评了那些企图把这种残余说成是东方各民族人民“民族特点”的人。在论文中着重指出，所有进步人士、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必须不懈地对那些过去遗留下来的严重妨碍民族文化发展的有害的残余思想进行斗争。

(未完)

(张锦译、文俊校，原书名“列宁的民族政策”小册子)

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常会与集体农庄 畜牧业发展的問題

(哈薩克共和国若干省的村和阿烏尔苏維埃的工作經驗)

A. B. 吉 姆

(一) 村和阿烏爾蘇維埃常会与集体農莊畜牧业發展的問題

地方苏維埃(包括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在內)的权限,主要由苏联宪法和各盟員共和国宪法的有关条文来确定。哈薩克共和国的宪法第56条規定:

“省、区、市、居民点、村和阿烏尔劳动者代表苏維埃,领导本地区內的文化、政治和經濟建設,制定当地預算,指导其所属管理机关的活动,保障国家制度,加强国防力量,保証遵行法律和保障公民的权利”。

在苏联及各盟員共和国宪法的基础上,地方苏維埃(包括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在內)的職权已由有关該苏維埃的条例十分清楚地規定出来。

法律是一种上层建筑,它归根結底反映一定时期社会的經濟状况。由此可见,在1931年通过的“关于村苏維埃的条例”中,就反映了当时苏維埃社会的經濟条件。通过这个“条例”的时期,正是我国的农业全綫开展偉大的根本改造的时期,当时农业組合的組織与活动的基本原则以及国家对組合领导的基本原则已經确定。有些最重要的原則直到今天还在采用,但是这些原則也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了一定程度的变通,其中有很多原則已經过时。

因此直到今天为止,“关于村苏維埃的条例”在一定程度上也調整着村和阿烏尔苏維埃的活动,特别是在集体农庄生产方面。同时,在今天以前行之有效的一些規范中,还具体增添了新的内容。在这个“条例”通过后几年来,又頒布了一些規范法

令来作为对該“条例”的补充,这些法令也調整着村苏維埃的法人地位。

現在,村和阿烏尔苏維埃正在利用这些規范法令所确定的权限,来实現在人民、党和政府面前的任务。

由此就产生了一連串的需要苏維埃在这个或那个阶段加以解决的問題。苏維埃有权在會議上研究任何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問題,其中也包括集体农庄畜牧业的問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維埃政府关于保証农业大力高漲的措施,大大地改善了村和阿烏尔苏維埃的工作。它們开始更具体、更深入地解决集体农庄畜牧业中的一些問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提高常会工作的水平,扩大常会在解决經濟和文化任务方面的效果具有重大的意义。H. C. 赫魯曉夫在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地方苏維埃的任务时说:“各苏維埃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轉到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具体問題上,并且應該經常把这些問題提交常会討論”。^①如果拿农田劳动的几次循环操作所需的大段时间來說,我們就可肯定一个事实:大多数村和阿烏尔苏維埃通常是可以常在会上研究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的一切基本問題的,其中也包括畜牧业中的問題。但是,由此完全不能得出結論說:集体农庄畜牧业的一切問題,不論在农田劳动的那個时期,都必須在常会上来研究。这样作所以不适当是因为,第一,常会根本不能完全解决应由村和

① 阿烏尔——中亚細亚的山村。

② 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總結報告。

阿烏尔苏維埃解决的有关集体农庄畜牧业的一切問題，第二，也沒有必要把很多問題堆到常会上来解决。执行委员会本身工作的集体协商原則，苏維埃对执行委员会活动的监督以及对于村和阿烏尔处理过的許多問題进行必要的业务审核，——所有这些便会使某些問題，甚至直接来自执行委员会會議上的重大問題得到十分妥善的解决。这絲毫不意味着减小常会在实现领导集体农庄畜牧业中的意义和作用，相反地，即使常会更能集中注意力来研究畜牧业发展中的根本問題，并使这些問題得以更彻底地解决。

根据以上所說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常会有权审查其权限以內的有关集体农庄畜牧业的任何問題，但是这种权限的实现，实际上并不表现在常会一定对集体农庄畜牧业一切問題的討論上，而表现在常会依据实践需要对集体农庄畜牧业中某些具体的、最重要問題的审核上。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建設的实践，始終坚持了这条道路。应提交苏維埃常会討論的問題，首先是需要全体代表交換意見并采用多数代表和积极分子的集体經驗来加以解决的問題。

关于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如何向常会提出集体农庄畜牧业发展的問題，可以举出阿拉木图省图尔盖村苏維埃的經驗。該村苏維埃管区內的集体农庄，都是多部門的經濟，发达的农业与畜牧业配合了起来。为了在战后时期完成进一步提高畜牧业的任务，这个苏維埃在常会上研究并解决了以下的問題：

年	常会次数	解 决 問 題
1948	二届八次	关于完成畜牧业方面的任务以迎接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一周年。
1949	二届九次	給集体农庄牲畜准备过冬处所
1949	二届十五次	完成发展公有畜牧业的三年計劃
1949	二届十八次	給牲畜准备过冬处所
1950	二届二十次	牲畜过冬事宜
1950	二届二十二次	牲畜繁殖期的准备
1950	二届二十三次	剪羊毛事宜
1950	二届二十五次	准备牲畜飼料
1950	二届二十八次	照料牲畜事宜
1951	三届三次	牲畜过冬事宜
1951	三届六次	完成畜牧业发展的三年計劃
1951	三届七次	各集体农庄割乾草和青貯株草
1951	三届十二次	牲畜过冬事宜

1952	三届十九次	各集体农庄的乾草收获运输
1952	三届二十四次	准备牲畜过冬处所
1953	四届二次	准备剪羊毛和向国家交售羊毛
1953	四届四次	村苏維埃向集体农庄採購租劣飼料
1954	四届十三次	(一)向集体农庄採購飼料
1954	四届十五次	(二)採購畜产品
1955	五届二次	(一)向集体农庄採購飼料
1955	五届三次	(二)採購畜产品
1955	五届六次	关于修建生产和經营用房(包括牲畜房在內)
1955	五届六次	关于完成义务供給計劃和購買肉乳品
1955	五届六次	完成供給国家畜产品的計劃

从上面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图尔盖村苏維埃在常会上所討論的問題，都是发展畜牧业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問題，如购置飼料，准备牲畜处所，安排牲畜过冬事宜和牲畜生殖等等。

有时，苏維埃也总結一下一定时期內畜牧业发展的成果，研究一下完成整个畜牧业計劃的問題。

然而不应由此得出結論說：类似图尔盖苏維埃在常会上所討論的那种問題，都必須要拿到常会上来处理。性質上相同的一些措施，也可以在执行委员会會議上解决，因为关于集体农庄畜牧业的同一个問題，在不同的時間可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和不同畜牧业地区的状况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在一种情况下，就需要村苏維埃的代表和积极分子广泛参加迫切任务的討論，在另一种情况下，就需要根据本屆或上屆苏維埃現成的決議而采取有效的办法。例如，照例牲畜过冬的問題，本来是1950年和1951年图尔盖村苏維埃在常会上討論过的問題，而到1953年，这个問題仍然成为执行委员会討論的問題。

常会开的是否成功，在很多方面取决于一些现实問題的提出是否及时。阿拉木图省契穆于村苏維埃在1954年10月初召开的第十次常会上，正确地提出并討論了“关于1954年畜牧业发展总結和准备1954—1955年牲畜过冬事宜迫切办法”的問題。当时，这是苏維埃組織活动上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問題。因为截至十月一日为止，該苏維埃管轄內的各集体农庄所购买的乾草，总共只占需要量的54%，而各个牧场原有的储备乾草只有20%。况且糞桿收拾得不好，飼料迟迟运不到基地，畜棚的建造和修繕工作进行得不能令人满意，劳动纪律很松懈，干部配备也不是所有的畜牧場都已齐全。

为要在短期內消灭在准备牲畜过冬方面所存在

的这些严重缺点,就必須要在苏維埃常会上广泛討論有关問題,在討論問題时,除了积极分子和代表参加外,还要邀請先进的牲畜飼养家参加。

把准备牲畜过冬的問題拿到苏維埃常会上來討論,实现常会的決定,就可在建立飼料基地,建造和修繕畜棚,供应畜牧人員以食品、服装和鞋袜方面取得良好成績。1954年12月間,巴夫洛达尔省額尔齐斯区格拉鮑夫村苏維埃就在常会上討論了列宁“集体农庄准备牲畜过冬的問題。常会在召开之前先对牲畜过冬的狀況进行了深入的檢查,然后在会上指出了若干具体的缺点:如牲畜的喂养不合卫生条件,照顧牲畜不够周到,由于飼料运送不及时而使牲畜的喂养不正常,牲畜棚不够清洁等。常会开得很有成效,通过了一定目的具体的決議。在決議中規定了一些保証及时运送飼料,消除不合卫生狀況,改善对牲畜的照顧等項措施。为了实现苏維埃的決議,苏維埃代表和积极分子加紧組織向牲畜場地运送飼料,建立大量的飼料儲备。为了改善飼管牲畜的工作,又补派了八个人来协助這項工作。完成这个決議的初步总结和由于执行該決議而产生的其他問題,都在1955年1月召开的执行委员会會議上进行了研究。而到1955年5月,及时而十分正确地“在图尔盖村苏維埃常会上提出了“关于完成区苏維埃执行委员会和区委提出的关于修建生产和經营用房,文化生活用建筑物以及关于1955年机械化事宜的決議”的問題。报告人对各个牧区的情况作的审查,特别是补充报告人村苏維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会所作的审查,以及在会上进行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大大有助于加速各个牧区停滞不进的畜棚的建造。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会,二、三月全会,六月全会和一月全会以及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公布以后,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常会的内容大大地丰富和充实起来。这首先表现在村和阿烏尔苏維埃愈来愈更加把注意的中心轉到对劳动群众进行实际的組織工作上。它們更認真,正加有組織地来貫徹准备和举行常会的措施,更好地把代表,积极分

子和全体居民的力量用来实现苏維埃所通过的決議。

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常会内容的丰富,也表现为应由常会討論的問題的范围显著扩大,表现为过去在常会上解決的問題,现在得到了更正确的解决。在集体农庄生产(其中也包括畜牧业)中实行物质兴趣的原则,就可作为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很多村和阿烏尔苏維埃从前对于庄員預支这样一种物质兴趣原则的表现形式注意得很不够。现在,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在常会上已切实研究这些問題。村和阿烏尔苏維埃的代表勇敢地揭露了农业落后的原因,拟定了本苏維埃轄区内提高农业的切实办法,更經常而深刻地提出必須要認真采用物质兴趣原则的問題。在很多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常会上,結合討論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二、三月全会、六月全会和一月全会的決議,制定了提高畜牧业的实际措施。例如,大阿拉木图村苏維埃,在1953年9月18日召开的第六次常会上,就討論了“关于实现1953年9月7日苏共中央全会‘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办法’的決議”的問題,在1954年10月30日所召开的第七次常会上,討論了“关于完成1953年9月18日第六次苏維埃常会关于实现苏共中央九月全会決議的決議”的問題,在1954年3月17日召开的第九次常会上,討論了“关于完成苏共中央二、三月全会‘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決議的办法”的問題。1955年初,在貝里一布拉克村苏維埃五届一次常会上提出的問題是:“討論苏共中央一月全会的总结”和“批准苏維埃发展畜牧业的五年计划”。

經驗表明:在苏維埃常会上討論党和政府的一些重要決議可以取得良好效果。这样作可以利用苏維埃常会把党和政府的決議的内容传达給代表和积极分子。代表和积极分子再把这些内容告訴居民,并根据集体的經驗来制定旨在履行这些決議的重要的具体措施。

(二) 組織常会活動中的某些問題

上面已經談到了常会对于解决集体农庄畜牧业中一些問題的意义。保証常会发生最大效能的重要条件,就是及时在常会上討論集体农庄畜牧业的問

題,在規定期間内实现就該問題所制定的一切措施。苏維埃对于集体农庄和农业机器站的帮助,如果这一帮助是及时的,它将有利益解决畜牧业中的

任何問題。要想在蘇維埃常会上及时討論畜牧业中的問題，那就必須要常会根据宪法規定的期限定期召开。在常会上，可以充分表现出蘇維埃集体領導的原則。常会是否按时召开，常会开得好坏，在很多方面也取决于各个常設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因为蘇維埃通过常会制定措施，来确定这些机关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方向，并通过听取报告和其他問題的討論，来实现自己监督的职能。

所有这一切都說明了常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常会是村和阿烏爾蘇維埃工作的最高組織形式。由此也可看出它們确切遵照宪法規定的期限按时开会的重要性。

К. Е. 伏罗希洛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演說中強調及时召开蘇維埃常会的重要性时說：“这不仅形式上違反宪法。同志們！必須注意到凡是蘇維埃沒有按期举行常会的地方，蘇維埃必然会丧失对它負責的執行机关的領導作用，結果就会导致至而不能不导致蘇維埃民主原則的破坏。只有按期召开常会，蘇維埃才能及时解决經濟和文化建設方面的問題，保証代表們积极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工作中的文牘主义作风能够根深蒂固，同群众的联系日益丧失，官僚主义得到发展，工作越来越坏的地方，也正是那些蘇維埃不按期召开常会的地方”。●

哈薩克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很多村和阿烏爾蘇維埃，都按照宪法的規定每月举行一次常会。例如，在1955年中，在2,097个村和阿烏爾蘇維埃中，有1,052个村和阿烏爾蘇維埃根据宪法規定的期限举行常会。

遵守宪法規定的召开常会的期限的保証是：正确地规划蘇維埃的工作和仔細地准备常会。可是，直到今天还有不少蘇維埃，破坏宪法規定的召开常会的期限。1955年，哈薩克斯坦有1,045个村和阿烏爾蘇維埃举行常会違反了宪法規定的期限。

象阿拉木图省图尔盖村蘇維埃这样的蘇維埃，基本上是根据宪法規定的期限举行常会的。这个村的第三届村蘇維埃从1950年12月起至1952年11月止，每月举行一次常会，共开了二十五次。第四届蘇維埃也是每月一次常会。在上一节我們已經看到这个蘇維埃怎样按期在常会上討論牧畜业的問題。

这些蘇維埃的常会所以开得成功，其“秘密”就在于它們的執行委员会工作有计划，筹备工作仔細，及时通知了代表，关心提高代表們对受托事务的兴趣和責任心。

因此就必须坚决斥責保留在某些村和阿烏爾蘇維埃工作者身上的不正确的观点，他們認為常会可以在农閑的时候举行。这些人根本不够了解常会的召开首先而主要是为了順利地实现当前的經濟和文化措施，其中也包括季节性的农田工作。

同时也必須抛弃以執行委员会的會議来代替常会的錯誤作法。的确有的时候，有些急待解决的重要問題计划在常会上解决，可是由于執行委员会的业务工作搞的不好使常会沒有开成，而为了解决这些問題就不举行常会而召开执行委员会會議。

常会只有当它有权能时，即当出席常会的代表能够法定最少人数或超过这个最少人数时，它才能够解决问题，其中也包括应由常会解决的集体农庄畜牧业問題。如果出席的代表少于最小限度的人数，这次常会視為无权能的常会，因而会上所通过的決議亦属无效。因此，必須要設法保証代表出席人数至少要达到法定人数。根据現行的关于村蘇維埃的条例規定，参加常会的代表达到简单多数便認為法定人数。不論是理論家和实践家都一致認為，目前这个原則已經过时了，关于法定人数的問題，需要根据現阶段蘇維埃建設的实践依法律程序重新研究。由于代表們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其中也明确表现了蘇維埃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劳动者代表蘇維埃（包括村和阿烏爾蘇維埃在內）召开常会，絕大多數情况下都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参加，而不是代表的简单多数。誠然，还有个别的村和阿烏爾蘇維埃，在举行常会时代表的积极性较差，不足必要的法定人数。例如，塞米巴拉丁斯克省的阿薩柯夫村蘇維埃，在1950年至1953年8月間共举行了不够法定人数的七次常会，而在該省的巴雷瑟夫村蘇維埃，在1949年至1953年7月間共举行了十五次不够法定人数的常会。

由此可見，以上所提到的常会，都違背了一項地方蘇維埃活動的基本民主原則。可是，法定人数只是代表出席名額的最低限度，达到这个限度后举行常会的蘇維埃才能根据宪法賦予的权能来处理应

由它解決的問題。這還不僅是在於保證常會的權能。一切代表出席常會，是村和阿烏爾蘇維埃實現集體領導的必要條件。出席常會的代表人數愈多，代表們的經驗和知識發揮得愈充分，常會制定的措施就愈全面，會議的決議就愈深刻，決議的內容向居民貫徹得就愈快愈完備，總之，蘇維埃集體領導原則的實質體現得就愈好。

代表參加常會，也是選出代表的那個選區的居民參加國家管理的一種形式。雖然出席常會的除代表外還有積極分子，但是代表全體選民的首先是自己的代表。這就是說，代表參加蘇維埃常會，乃是公民實現其真正積極參加國家管理的一種重要的方式。

大多數村和阿烏爾蘇維埃的經驗表明：在居民和代表的政治積極性日益高漲的情況下，除了少數的代表因正當理由不能出席常會外，其餘代表一律參加常會是不困難的。

代表們駐在牧區，便是不能出席常會的正當原因之一。甚至在象塔爾迪庫爾干區丘巴爾和努林村蘇維埃這樣先進的蘇維埃中，駐在各個牧區的牧民代表，只有一兩次參加常會。

自然，放牧人及其他畜牧工作者工作的性質和他們的工作地點離蘇維埃遙遠，有時使得他們不能出席常會。可是，必須嚴格遵守村和阿烏爾蘇維埃活動的民主原則，保證駐在遠地的牧民代表能夠作為人民的仆人的實現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並在解決畜牧業問題中切實注意優秀牧人的經驗，所有這些都要求在每一個具體情況下，根據所研究的問題和其他條件，找出吸收這些代表參加蘇維埃工作（包括常會工作）的最適當的方式和方法。

牧民代表積極參加蘇維埃建設，特別是常會工作，是與他們的勞動活動直接相聯系的。一個代表在畜牧業中既是一個先進者，又是蘇維埃工作的積極參加者。一個先進的蘇維埃勞動者，決不願意一個人前進，而極力幫助其他同志，帶動他們一起進步，把自己的經驗傳給他們。他作為群眾的組織者來完成本單位的任務，尋求組織群眾的方式和方法，極力把自己的經驗傳給會上的其他代表。此外，牧民代表積極參加常會工作，也決定於他們與自己選民的經常的聯系。凡是經常在牧民中進行群眾工作的牧民代表，就知道他們的具体要求和需要，並在蘇維埃常會上提出有關的問題。

保證代表們很好的出席常會，在很多方面決定於蘇維埃是否善于安排工作。在舉行常會的日期確定後，除了及時準備好所要研究的問題外，還必須要考慮到代表們充分或最大限度參加本屆常會的可能。開會的事，通常應事先通知代表。塔爾迪庫爾干省努林和列寧斯克兩個村蘇維埃，在開會前三、四日就把開會的事通知了自己的代表。可是也有這樣的情況，個別蘇維埃通知開會的事太遲，例如，塔爾迪庫爾干省塔爾迪庫爾干區斯大林斯克村蘇維埃，在開會那天才把開會的事通知代表，結果在28名代表中，就有12名，即幾乎50%的代表缺席。

作為蘇維埃的重要支柱的積極分子，也出席村和阿烏爾蘇維埃常會。他們可促進蘇維埃與人民群眾（包括牧民在內）更緊密的聯系，幫助蘇維埃更深入地了解居民的需要。牧民積極分子不僅對於在會上全面解決集體農莊畜牧業中的問題，而且對於實現會議的決議都有重大的意義。正確而有效地利用他們這份力量，也是村和阿烏爾蘇維埃的重要任務。

蘇維埃的實踐表明：在解決畜牧業中各項問題的一切常會上，都有牧民積極分子參加。塔爾迪庫爾干省丘巴爾村蘇維埃，在每次常會上平均都邀請10—16名積極分子參加，而同一省的列寧斯克村蘇維埃，在每次常會上平均邀請6—7名積極分子參加。當然，確定牧民積極分子參加常會的統一的數量標準是不可能的。這要取決於若干條件：如所討論問題的性質，積極分子的多少和蘇維埃的大小。無論如何，只要積極分子參加會議有助於正確而全面地解決畜牧業中的問題，而不給代表出席造成巨大困難時，就必須要邀請積極分子參加。應當考慮到，為了順利地解決畜牧業中的問題，不一定要邀請所有的牧民積極分子參加才算適宜。反之，邀請過多的積極分子參加常會，在客觀上會導致減少代表在常會上的作用，減少應在解決某一問題上起主要作用的代表的責任感。這樣的會議事實上就變成了村會或莊員大會。例如，1952年塔爾迪庫爾干省斯大林斯克村蘇維埃舉行了第三次常會，出席該蘇維埃的有26人是代表，114人不是代表。出席該蘇維埃1952年第七次和第十一次常會的，每次都有50名積極分子。出席1953年7月第四次常會的有65名積極分子，而代表的出席名額很低。從以上所舉的四個

例子看来,有两次會議出席的代表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显然,斯大林斯克村苏維埃的这种作法,歪曲了苏維埃常会的基本思想,降低了代表們的作用。

在作牧民积极分子工作方面的严重缺点是:有些苏維埃只邀請集体农庄中搞畜牧工作的领导同志作为积极分子来参加苏維埃工作,特别是常会工作。一般的畜牧人員,如牧人、飼养員和其他一些采购草料、修造畜棚以及担当其他与畜牧业有关的工作的普通庄員,却很少或根本不邀請去参加常会工作。

参加村和阿烏尔常会的还有上級苏維埃的代表。这通常是区苏維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員,区执行委员会各部部长,区执行委员会的指導員或区执行委员会特派的人員。

上級苏維埃机关参加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常会,可使常会开得更好,使代表更积极地参加討論畜牧业中的問題,更广泛地对集体畜牧业方面現存的缺点展开批評和自我批評。同时,这也是上級苏維埃直接和实际领导下級苏維埃的方式之一。可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能够改善地方苏維埃工作、消除区苏維埃执行委员会对下級苏維埃工作实行文牘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的方法,运用得还不够。上級苏維埃机关的代表,通常只参加选举后的头几次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常会,在会上一般只限于解决有关組織上的問題。

为了改善村和阿烏尔苏維埃的工作,在我看来,必須认为区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按期参加苏維埃常会是适宜的。如果区苏維埃执行委员会及其各部門的领导着,除了完成自己的直接職務外,每个人再負責一个村或阿烏尔苏維埃的一项工作并經常給予該苏維埃以实际帮助那就更好了。

保証村和阿烏尔劳动者代表苏維埃领导集体农庄畜牧业的工作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工作的計划性,特别是常会工作的計划性。工作有計划,就能够及时地,熟练地商討有关集体农庄畜牧业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办法,并及时地貫徹这些办法。

在常会工作計划中,除了其他問題外,也应提出有关集体农庄畜牧业的問題,根据所提出的問題去实地檢查各个牧区的工作,提出报告,然后由代表們在苏維埃常会上交換意見。关于这些問題制定的措施,可以指导执行委员会和牧区的各个常設委员会的工作。关于这些問題的決議,可以貫徹到担当畜牧工作的集体农庄員中,而苏維埃的代表和积极分子可組織劳动群众来实现这些決議。因此,在計划中不論提出甚么問題,都是目前苏維埃认为必須努力去解决的高牧业中的一个問題。

为了举例說明,我們可以看看卡斯克弗斯克区契摩干村苏維埃1954年第四季度的有組織的群众工作的部分計划,这个計划是提交常会和执行委员会的(見計划)。

順序	措 施 名 称	执行 期限	負 責 准 备 問 題	备注
1.	召集村苏維埃第十次常会,議事日程如下: 關於契摩干村苏維埃管区内各集体农庄准备性畜过冬事宜——報告人是苏維埃主席 苏維埃执行委员会會議,并提出以下問題: 1)關於各集体农庄順利地挖掘、清理并运送甜菜和馬铃薯的办法——報告人是各集体农庄主席; 2)關於全契摩干村苏維埃进行牲畜登記的總結——報告人是村苏維埃秘書	10月6日	村苏維埃主席,畜牧业常設委员会主席	
2.	苏維埃执行委员会會議,議事日程如下: 關於1954年农业工作的總結和来年的任务——報告人是各集体农庄主席和农业常設委员会主席	10月15日	农业常設委员会主席	
3.	召集第十一次村苏維埃常会,議事日程如下: 關於1954年农业工作的總結和来年的任务——報告人是各集体农庄主席和农业常設委员会主席	11月3日	村苏維埃执行委员会	
4.	村苏維埃执行委员会會議,論討以下問題: 1)關於改善对居民的医药供应的办法——報告人是医疗单位的負責人; 2)關於中小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学工作	11月17日	村苏維埃执行委员会和农业常設委员会 保健委员会和村苏維埃执行委员会 村苏維埃执行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	

<p>的問題——報告人是各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的校長</p> <p>召集第十二次蘇維埃常會，議事日程如下： 關於各集體农庄準備畜性過冬事宜——報告人是各集體农庄主席，補充報告人是畜牧業常設委員會主席。</p> <p>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會議，討論問題如下： 1) 關於實行冬季的農藝措施，各集體农庄清洗種子——告報人是各集體农庄的農藝師； 2) 總結農產品供給和購買計劃完成的程度並提出下一年的任務——報告人是稅務人員和村蘇維埃主席； 3) 關於執行1954年村蘇維埃預算的情況 and 1955年預算草案——報告人是稅務機關人員和村蘇維埃主席</p>	12月4日	畜牧業常設委員會和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
<p>6.</p> <p>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會議，討論問題如下： 1) 關於實行冬季的農藝措施，各集體农庄清洗種子——告報人是各集體农庄的農藝師； 2) 總結農產品供給和購買計劃完成的程度並提出下一年的任務——報告人是稅務人員和村蘇維埃主席； 3) 關於執行1954年村蘇維埃預算的情況 and 1955年預算草案——報告人是稅務機關人員和村蘇維埃主席</p>	12月19日	農業常設委員會 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 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和預算委員會

从以上的計劃中可以看出：在1954年第四季度

所計劃召集的三次常會中，每一次會議都規定討論一個與集體农庄畜牧業有直接聯繫的重要問題。在第十次常會上，規定討論“關於各集體农庄準備性畜過冬”的問題，在第十一次常會上，規定討論“關於總結1954年的農業工作和完成來年任務”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中集體农庄畜牧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第十二次常會中，規定討論了“關於各集體

农庄性畜過冬”的問題。

現行的法律規範並沒有規定地方蘇維埃必須編制多麼長時期的常會工作計劃。可是實際上，村和阿烏爾蘇維埃的工作計劃，大家知道不是一個月，就是一個月再長一些。我們所調查過的大多數蘇維埃，都是每月作每月的工作計劃。阿拉木圖省別里布拉克村蘇維埃的工作計劃，就可作為每月一作的工作計劃的例子（見計劃）。

貝里布拉克村勞動者代表蘇維埃1955年4月分的工作計劃

順序	日期	問題名稱	準備人	执行人	執行結果
1.	1955年 4月6日	執行委員會會議			
	1955年 4月6日	1) 關於完成1955年第一季度農業稅和保險費征收計劃的總結和批准今年第二季度的措施； 2) 關於貝里布拉克村蘇維埃完成1955年第一季度的商品流轉計劃和農產品採購計劃； 3) 處理公文和公民的申請書			
2.	1955年 4月27日	1) 成立1955年推銷公債行動委員會，並選出村全權代表； 2) 關於加里寧集體农庄完成產乳計劃			
1.		村蘇維埃常會 1) 籌備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 2) 討論本年3月26日省執行委員會“關於有關完成全省集體农庄的畜棚和住宅建築計劃的辦法”的決議			

按月和按季計劃工作對於研究畜牧業的問題有好的方面，也有缺點。按月計劃工作的好的方面是：它可更仔細地確定和提交本屆常會上討論的問題。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同時，按月計劃工作也有自己的缺點。這樣的計劃不能反映出蘇維埃在畜牧業方面的較長時期的活動方向，而只能注意到最近一個時期的重要問題。因此，在我看來，除了按月編制計劃外，蘇維埃還可再編制一個較長時期的計劃也是很適宜的。這樣的計劃與按月編制的計劃不同，它只能規定整個計劃時期以內的一些重要問題，而且編制這種計劃必須由各個委員會廣泛參加，並在常會上進行仔細討論。常會有義務批准這

个計劃,并确定报告人和作报告的大約日期。以这个計劃为基础,再加以补充和修改,就可以編制每月的計劃。

然而必須指出:个别苏維埃对于工作的計劃,特别是对于常会工作的計劃,純粹流于形式。編制計劃时很輕率,不請苏維埃代表和各个常設委员会参加,計劃編好后既不交常会批准也不交执行委员会批准。代表們往往只能从常会或执委会的議事日程中,来知道苏維埃的工作計劃中規定有举行常会和执委会以及其他的实践措施。也有这样的苏維埃,它們根本不按月編制工作計劃,而常会和执委会的召集由主席一人任意确定。

对于苏維埃工作計劃中的这种缺点,自然不能采取妥协的态度。有些村和阿烏爾苏維埃的領導者在这一方面犯了严重的錯誤,他們編制計劃只是为了形式,为了应付上级机关的檢查,根本不了解完善的工作計劃对于整个苏維埃活动的巨大的組織意义。

常会开得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准备工作。常会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就是使苏維埃事先掌握現成的报告和补充报告以及其他必要的材料,使代表不仅事先应得知有关开会时间和議事日程,而且还要使他們积极認真地准备参加問題的討論。

当然,开好苏維埃常会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代表在会上提出自己选民有关所討論問題的新的要求和意見。

苏維埃常会筹备工作中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就是組織报告。报告的内容一定要具体和事实求是。編制这样的报告不能采取文牘主义的方法,即把各个主要的报告,报表和表册上的材料綜合一下就算了事,而要报告人必須脚踏实地地去調查研究(如檢查工作,个别談話,訪問一般庄員以及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作者,或其他方法)。

常会准备工作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1954年3月,西哈薩克斯坦省札內別克区薩亨阿烏爾苏維埃,討論了牲畜过冬和准备牲畜产期的問題。在开会以前,指定了两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为报告人,畜牧业常設委员会主席为补充报告人。他們亲自檢查了发生牲畜死亡事故的各个畜場和单位的工作,而在各个沙丘地段,由畜牧业常設委员会的委員进行了檢查。他們檢查工作是在該地段的苏維埃积极分子协同下进行的。所有这些使得常会有可能更深入地

了解牲畜死亡的原因以及消除牲畜死亡的办法。这样一来,就算把1954年10月召开的,討論准备牲畜过冬事宜的契庫干村苏維埃第十次常会准备好了。在开会之前,报告人即苏維埃主席和畜牧业常設委员会主席,直接訪問了各个畜場和牧場。通过訪問集体农庄員和专家,他們了解到了集体农庄管理处、村苏維埃及其代表的許多缺点,同时还收集了牧民所提出的許多宝贵的切实可行的意見。对常会作这样的准备是很好的。报告人可以进一步了解牲畜过冬准备的情况。在村苏維埃主席的报告中指出:准备飼料、建造和修繕畜棚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很多集体农庄員的劳动纪律松懈,有时違背了物質兴趣原则,或是因为准备飼料和修繕畜棚的工作队配备不足和收工过早,或是因为没有供給牧人一切必要的生活用具(如帳幕,暖衣等)使他們能够冬季在牧場中进行正常工作。

到会的代表清楚地知道了牧民的需要,他們的意見有助于苏維埃采取必要的办法。結果在常会上揭露的很多缺点很快地就克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集体农庄畜牧业問題的报告,才是事实求是的,内容丰富的报告。此外,与牧民一起檢查工作这件事本身,也是在居民中进行組織工作、吸收他們参加苏維埃工作的手段之一。在各地檢查工作过程中,可以了解到直接在各該牧区工作的集体农庄員的意見和要求;然后把这些意見和要求加在常会的決議中和苏維埃通过的具体办法中。

可是,事实上也有对村苏維埃常会的准备工作采取不認真态度的情形。有时,报告人举出一些数字材料来說明完成畜牧业計劃的过程,只限于根据一些統計学資料作籠統的推断。也有有的时候,村或阿烏爾苏維埃主席在开会前夕才召見报告人或补充报告人,交給他們关于畜牧业发展問題和目前情况的“現成的报告”,甚至并指示他們在常会上应当怎样講并講些甚么。

到目前为止在常会上作关于畜牧业問題报告的,通常都是村或阿烏爾苏維埃的主席,集体农庄主席,养畜場或地段主任,农业常設委员会主席。塞米巴拉丁斯克省烏尔扎尔区阿克塞科夫村苏維埃,从1950年初开始到1953年8月止,前后共开了20次有关各种問題的常会,在会上作了很多报告,其中村苏維埃主席作了15次,集体农庄主席作了11

次，各个常設委员会主席作了3次。同一省的博罗杜里涅区巴雷瑟夫村苏維埃，从1948年起至1953年7月止，先后共听取了村苏維埃主席的22次报告，集体农庄主席的12次报告，常委会主席的5次报告，农业机器站的代表和养畜场主任的各一两两报告。

在选择关于畜牧业各項問題的报告人时大概也是这种情形。例如，在图尔盖村苏維埃中所听取的关于畜牧业各種問題的17次报告中，有3次报告是村苏維埃主席作的，9次报告是集体农庄主席作的，2次报告是农会主席作的，只有一个报告是分区主任，生产队长和区机关的代表作的。在阿克塞科夫村苏維埃所听取的关于畜牧业問題的4次报告中，苏維埃主席和集体农庄主席每人作了两次。

村和阿烏尔苏維埃主席在自己权限内行使对自己辖区内的畜牧业的领导权。因此村苏維埃主席作报告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可以分析比較許多集体农庄畜牧业的状况。如果說集体农庄主席对于本管区整个畜牧业发展的情况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那末苏維埃主席就具有这种可能。因此，村苏維埃主席在常会上作关于畜牧业問題的报告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然而这并不是說，苏維埃主席就可能而且应当壟断作报告的权利，就象某些村和阿烏尔苏維埃所作的那样。阿拉木图省伊里区塔尔戈尔村苏維埃从1952年3月起至1953年7月止，在历次常会上就一切問題作报告的，几乎只是苏維埃主席一人。

在大多数的村和阿烏尔苏維埃中，就集体农庄生活中（包括畜牧业在内）各項問題作报告的，都是集体农庄主席，这一点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听取管理农庄複杂事务的集体农庄主席的报告，事实上是合理而應該的。当然这并不是說只有集体农庄主席的报告才可以听取。在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常会上，往往也可邀請养畜场主任，生产队长和集体农庄监察委员会主席来作报告人和补充报告人。

各个农业常設委员会的参加，对于全面解决常会上所提出的有关畜牧业的一切問題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关于哈薩克共和国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維埃关于常設委员会的条例規定，农业的常設委员会与地方苏維埃的一切常設委员会享有同样的权利。它們完全与其它地方苏維埃的同一名称的常設委员会处于同等地位。但同时它們也較其他苏維埃的常設委员会有本質的不同。这是因为在村和阿烏尔苏維

埃中没有上級苏維埃所有的那些科和局，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常設委员会的委員都住在同一个地方（如一个村，一个阿烏尔，很少例外），無論如何，他們相处总是很近。

由于这些情况，村和阿烏尔苏維埃执行委员会与各个常設委员会，各个常設委员会与集体农庄和农业机器站的相互联系比之与其他苏維埃的联系更直接，更密切和更經常了。村和阿烏尔苏維埃执行委员会本身在解决畜牧业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时，往往要取得各个常設委员会的帮助。

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各个常設委员会的这种地位，决定了由它們提出在会上作有关集体农庄畜牧业各項問題报告的报告人是适当的和可能的。但是，从上述的某些例子可以看出：个别的村和阿烏尔苏維埃，对于各个农业常設委员会的作用沒有足够的估計，很少或根本没有听取这些常設委员会的报告。对上述苏維埃的議事日程的分析表明：各个常設委员会关于畜牧业問題的报告还可以大大增加。

村和阿烏尔苏維埃不邀請普通庄員和普通畜牧工作者的代表作为报告人。在这样情况下往往会使不担当負責工作的代表，在他作代表的整个期間一次也不能作有关畜牧业問題或苏維埃和集体农庄方針任务的报告。当然，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走形式。問題在于普通的代表要認真地、切实地准备报告，就必须要习惯于检查工作，更深刻地体会苏維埃工作的实質，更具体地理解苏維埃和代表的作用以及他們的权利和义务，更好地認識自己对人民的责任。

总结以上所說，可以指出在确定作关于畜牧业問題报告的报告人时必须遵循的两点原则：第一，报告人必須对闡明这些問題有充分的兴趣，因为常会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地討論这些問題并通过有一定的、具体的決議，要作到这一点在頗大程度上取决于專門研究并檢查該地区工作的报告人；第二，报告人要有最大限度地邀請各个农业常設委员会、普通代表和牧民积极分子更积极地参加苏維埃工作的兴趣。必須坚决反对在历年历次會議上作有关集体农庄畜牧业問題报告的都是苏維埃主席和集体农庄主席两种人这种不合理的情形。这种办法是一种最简单的，“最易容的”准备常会的办法。可是这种办法会降低和削弱各个农业常設委员会，代表和牧民积极分子在解决畜牧业問題方面的积极性。

仔细地作好常会的准备工作，可以保证用广泛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办法認真地討論在会上提出的畜牧业問題。代表們是否热心于常会工作，是否积极参加討論問題，直接取決于苏維埃及其执行委员会是否在決議中和行动中注意代表們的批評和建議，如何帮助代表貫徹自己的決議。

常会制定的措施，都要用法律形式固定在決議中。

村和阿烏爾蘇維埃常会的決議，是国家政权机关在村和阿烏爾內法令，它体现了代表們和积极分子的集体經驗。常会关于畜牧业問題的決議的基本要点是：

1. 确定全盘的具体措施来保证牲畜头数的增长，扩大牲畜的产品率，按时完成上缴国家的义务，提高集体牧民的生活水平。
2. 规定适当的方式、方法和形式，在牧民中进行实现这些措施的群众性組織工作。
3. 決議的合法性。
4. 确定严格的个人負責制。
5. 执行決議的期限等。

规定了一切措施的关于畜牧业問題的決議，只有当它反映了代表們，特别是牧民代表和农业常設委员会的意見时，才能在會議上通过。当然，为了便于常会工作，決議草案通常都是由执行委员会、常設委员会或个别报告人预先准备好的。但是必須坚决反对不考虑代表和积极分子們的宝贵意見就通过預先編制的草案这种作法。

村和阿烏爾蘇維埃的決議并不是法律，但它是法律性的文件。这些決議应当确切地符合苏联宪法和苏維埃国家的其他法令，以及党与政府的決議和上级机关的决定。

在決議中应当反映出集体领导原则与执行決議的个人負責原则的统一性。因此在決議中必須明确指出負責执行決議的人。大多数苏維埃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問題在于負責执行決議的人不仅是集体农庄及其他机关和企业的领导者，而首先主要是苏維埃代表。

确定执行決議的期限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样可以提高执行者的責任心，使他能够更認真地办事，正确地计划工作，从而便于监督执行的情况。

决不能同意个别苏維埃規定根本不现实的执行期限，因为它們的出发点是：期限規定得愈紧迫，則決議执行得愈有勁。其实，这样反而会在規定期限內破坏決議的执行，减弱決議的威信。因此，为了更快地执行这个或那个決議，决不能只靠規定不现实的执行期限，而必須要善于在群众中进行組織工作。

以上所說的一切，决定了常会有关畜牧业問題所通过的決議的质量。

可是，決議是否有价值不在于決議本身，而在于集体牧民、机器站机械师及其他农业工作者对決議的实现。

苏維埃的決議在絕大多數情况下都要自愿地去执行。但是为此就必须要把決議貫徹到群众中去。大家知道，一切苏維埃法律、地方苏維埃（包括村和阿烏爾蘇維埃）的法令和決議，只有当它們武装了群众的时候才能完全显示出它們的动員和組織作用。

在向从事畜牧业工作的人解釋村或阿烏爾蘇維埃关于畜牧业問題的決議时（依決議的性質而定），积极分子和农村知識分子要同代表一起参加。为此可利用全体庄員大会，工作队會議，养畜場和牧場的牧民集会。但是，这几种會議不可能成为向居民貫徹苏維埃決議的基本形式和方法，因为居民未必都对會議有所認識，所以苏維埃的決議只通过會議的形式不可能有效地貫徹到群众中去。为了把決議貫徹到选民和全体农民中，最重要的是代表与农民的經常联系。村和阿烏爾蘇維埃的代表完全有可能經常到自己的选民中去。此外，每个代表还可以把本身的工作与就地組織劳动生产的大規模群众工作結合起来。这样一来，代表們就可以把苏維埃的決議貫徹到每一个居民中去，并把決議与居民的具体工作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在常会上提出重要的集体农庄畜牧业的問題和正确地組織常会活动，对于保证村和阿烏爾蘇維埃对集体农庄畜牧业的有效领导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只是苏維埃組織活动的一种形式。只有当其他一切工作，如代表們的工作、各个常設委员会的工作、执行委员会及其他一切机关的工作都安排得很好时，事情才能完全办好。

（赵俊智譯，原載“村和阿烏爾旁勤者代表苏維埃在发展集体农庄畜牧业中的作用”一書）

印度各个政党及英帝国主义的民族政策

A. M. 基雅柯夫

在本文里，我們准备談一談英国统治阶级和印度国大党、瑪哈薩巴党、自由主义联盟这样一些全印度性的政党的民族政策。关于伊斯兰教联盟和印度共产党的民族綱領将另写专文闡述。

印度的所有民族都参加国大党，因此，国大党不可能不重視各个民族运动的要求，这也是很自然的。早在1903年，国大党就反对分裂孟加拉，并通过決議，要求孟加拉人所居住的地区联合为一个统一的省。

1920年，国大党按照印度的民族区划改組国大党的組織网，这就表明，它原則上贊成以民族为基础，或正如印度一般所說的，以語言为基础重新划分英属印度的行政区划。

这一要求，在1928年各党派联合会議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报告中，即所謂“尼赫魯宪法”中，表现得特別明显。

在这个报告中写道：“每个人都知，现在的省界是很不合理的，这种省界只能加强不列顛在印度的势力。整个說来，这种省界与地理、历史、經濟或語言界限没有多大关系，甚至以純行政管理观点来看，这种省界也是很合适的。”

接着，报告中提出各党派联合会議建議在重新划分印度的行政区划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应当特別注意人民的愿望和該地区的語言。大家都知道，教育以及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或者整个說来，大部分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是取决于語言的，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使各省能获得迅速发展，我們就应当作到：使各省的一切工作都以該省居民的語言来进行，所以，最好根据居民的語言来建省。語言通常是与各种文化、傳統、文学相吻合的，因此，在根据語言建立的省中，所有这些因素将在該省的发展当中彼此互相帮助。”

1931年在喀拉拉批准的“关于基本权利的決議”，实际上是印度国大党的党綱，在这个決議中指出：“保証少数民族及各个語言区文化的发展。”

在国大党的党章中写道：“印度的国語应当是印度斯坦語，而各民族省的語言应当是在該省占统治地位的語言。”

1945年国大党所发表的选举前的宣言中写道：“国大党研究了有关建立保护一切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問題，依据国大党的意見，国家机构应当是联邦制的，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享有自治权，并設有在普选基础上产生的立宪机关。印度联邦应当是印度各个组成部分自愿組成的联盟。”

但是，在这个宣言中并没有談到印度联邦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而在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于1946年12月13日向印度立宪机关提出的決議案中談到：印度联邦是省和土邦联盟。

国大党的領導集团虽然原則上也同意国大党各个地方民族組織关于建立語言省和在国家文牘工作及一切学校中使用地方語言的要求，但是，他們并不認为这些要求象地方組織所說的有那样重要意义。

此外，他們力求制止爭取重新划分行政区划的运动，拖延实现运动的要求。

正如下面所要談的，国大党的許多地方組織的要求与国大党中央机关关于土邦問題的政策有很大分歧，国大党没有在任何一個決議中提出关于取消土邦的要求，而卡吶塔克、馬哈拉斯图拉和凱拉爾各民族省的国大党組織，却把取消土邦的要求提出作为改造印度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曾不止一次地通过決議，号召国大党各省委员会停止爭取建立

“語言省”的宣傳。

例如，在1935年7月25日通过的決議中，国大党关于这一問題通过下列决定：“国大党希望安德拉、卡纳塔克和凯拉尔各地区的人民相信，关于按照居民的語言建省的問題，将作为印度国家机构未来计划的一部分来实现，而且，只国大党自己就能够作到这一点，同时并号召各地区的人民停止这方面的宣傳。”

因此，在国大党的許多省組織当中，是联邦主义倾向占优势，而在国大党的中央机关中，则是中央集权倾向占绝对优势，这些分歧明显地表现在对待印度國語的問題上。

早在1916年，国大党便通过決議，决定用印度斯坦語代替英語，使它成为全印各种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以及全印度各种刊物等所使用的語言。国大党选举就是以印度斯坦語进行的，其理由是：印度斯坦語在北印度以及北印度以外的一部分地区起民族間交际用語的作用，而且或多或少也通行于城市居民中。

早在1918年，甘地在給印度各种报纸的公开信中便写道：“印地語，而且只有梵語化形式或“烏尔都語”形式的印地語，能够成为各省之間的实际用語。除了馬德拉斯省以外，印地語已經成为全印度伊斯兰教徒以及印度教徒之間的实际用語。”

賈瓦哈拉·尼赫魯在談到印度的國語問題時說道：“印度斯坦語是唯一能够成为印度的國語的一種語言。現在說印度斯坦語的有12,000万人，而且还有数千万人，也懂得一些印度斯坦語。甚至那些根本不懂得印度斯坦語的人，要想学会印度斯坦語，是比学任何一种外国語都容易得多。”

上面所引証的尼赫魯和甘地的意見，充分表明国大党领导集团对印度國語問題的看法。但是，并不是国大党的所有地方組織都同意这些看法，孟加拉的許多著名的国大党黨員以及馬哈拉斯图拉、卡纳塔克、凯拉尔、安德拉捷什和塔密尔一納德各省的国大党黨員都不承認印度斯坦語是印度各民族間的实际用語。这些省的許多国大党黨員，特别是孟加拉人和塔密尔人認為，既然孟加拉語和塔密尔語的文学比印度斯坦語的文学更丰富，它們就不应当被排挤到第二位。反对把印度斯坦語作为印度國語的理由是：如果采用印度斯坦語作为國語就会損害各种地方民族語言的发展。

关于印度國語問題的爭論和国大党在这一問題上的分歧，是民族运动中两种倾向，即：联邦制倾向和中央集权制倾向的一种反映。国大党中这两种倾向的斗争，反映出霍拆罗和馬尔瓦尔的资产阶级与印度各落后部落力量薄弱的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前者力图完全控制全印度市場，而后者则不仅想使本民族市場擺脫英国資本，而且想使本民族市場擺脫霍拆罗和馬尔瓦尔資本。

上面所引証的国大党关于民族問題的大部分決議，都是这两种倾向互相妥协达成的。国大党不能不考虑各个地方組織的要求，因此，它支持改变印度行政区划的綱領，并答应为印度各族語言和文化的发展創造条件，但是，国大党并没有在自己的任何一个決議中提到印度各民族直到分立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自决权。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国大党的許多著名活动家都参加了争取“不可分的印度”的运动，其中，瑪哈薩巴党的領導者們起了很大作用，这一运动只是給巴基斯坦运动火上澆油。

当1944年拉賈戈巴拉恰雷在国大党中主張原則上承認印度各个伊斯兰教地区分立权，而甘地采取了他的主張，并根据这一主張与真納进行談判的时候，国大党中央机关的許多著名人士都指責拉賈戈巴拉恰雷和甘地。这一事实明显地表明，霍拆罗—馬尔瓦尔集团在国大党中央机关中占绝对优势。

最近，国大党的各个右派集团和瑪哈薩巴党好了。这一点在伊斯兰教联盟要求列在巴基斯坦范圍內的孟加拉省、旁遮普省、阿薩姆省和信德省表現得特別突出。

但是，如果說国大党只反对扩大运动，而原則上同意建立民族区，那么，瑪哈薩巴党和自由主义联盟的許多盟員則主張保持印度分裂以前的行政区划。

例如，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教授貝尼·普拉沙德在“印度教伊斯兰教問題”这本书中写道：“按照居民的語言改变印度的行政区划的思想，引起了許多以各种方言为基础的的小集团的分立主义倾向，只能冒国家分裂和瓦解的危險去追随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削弱着各个集团相互适应的愿望，然而各个集团是不会輕易被分开的，它們很容易就能够养成和睦相处的习惯。”毫无疑问，貝尼·普拉沙德教授当时是塔塔、比尔拉这样一些全印度資本主义公司的思想家。

印度的民族运动就其性质是反封建和反帝的运动,其目的是排除印度各民族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因此,英国统治集团不欢迎这一运动的要求,力图通过挑拨宗教纠纷和支持各个封建大公的办法来削弱民族运动。

英国统治集团现今对民族运动的看法在库普伦德的著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库普伦德极力想证明民族运动将导致印度的“分裂”。库普伦德一方面承认印度各民族要求建立民族省的“必然性”,但同时又说,这种要求将给印度带来危险而有严重的后果,他说:“虽然民族运动是势所必然的,但是,这一运动只能在很久以后发起。当然,要使每一个行政单位的所有成员都说一种语言是很适宜的,根据这一理由,信德脱离孟买和奥里萨脱离比哈尔都是很正当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而且应当承认,这一理由本身可能成为所有类似事件的充分理由,这就意味着,这样作就犯了很大错误,很可能造成整个世界的变乱;这就意味着把文化与政治混为一谈,把文化自由与自治混为一谈,把民族与国家混为一谈。”

库普伦德一方面保护对英帝国主义有利的印度的旧行政区划,同时企图证明,这种行政区划并不是很坏,而且在保持这种行政区划的情况下也可以顺利实现省自治,他说:“为了使省自治能顺利地应用于各省,就一口断言,现在的省的结构完全是人为的,这也是不正确的,这是超出现实范围的极端派分子的一种论据。并不是所有的省界都与自然区划、语言区划或种族区划有衝突。如果除去宗教差别,总的来说,各省都是相似的,孟加拉的种族、语言和血统是很相似的;联合省、旁遮普省、信德省和西北边省也是如此。虽然最初行政单位是人为的,但是习惯了,也就渐渐具有了某种类似“必然性”的东西。强有力的省政府及其法律、省法院、省立大学、省社会机关、省高级和低级官吏一代又一代的存在,必然起一种联合作用,使该省各族人民感觉到,这就是他们的省,并爱自己的省。虽然语言不同,并发生过分立主义运动,但是,单是长期存在这一点就使马德拉斯和孟买具有了很大的团结性。”

英国统治集团的代言人就是如此地讚揚印度官僚主义形式的、彻头彻尾中世纪的行政区划。

在批准1935年的宪法时,英国统治集团在奥里

萨和信德人民运动的压制下,被迫使奥里萨与比哈尔分立,使信德与孟买分立,这一运动受到国大党的支持,而在信德问题上也受到伊斯兰教联盟的支持。不错,正如库普伦德所说的,不仅仅是这一理由迫使英国统治集团迎合民族运动的要求,英国统治集团指望:使最落后的奥里萨脱离比哈尔,使信德脱离孟买,成立一个政治气氛最“平静的”和民族运动也很弱的省。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很显然,以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一经验最低限度在奥里萨问题上并不灵验,奥里萨成了民族运动的一个基地。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彼齐克·罗乌林逊的提議中甚至已经看不到英国统治集团想改变印度的行政区划的痕迹,相反地,1946年5月16日所提出的印度联邦行政区划草案,其出发点是:不改变省份,而以印度的旧行政区划为基础,建立一个只考虑居民的宗教的特殊政治上层建筑。

英国统治集团反对“按照居民的語言”重新划分印度,即反对建立居民的民族成分相同的省份,这是因为,如此改变印度的行政区划,会使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统治的主要支柱,即印度各土邦和宗教纠纷受到威胁。在英属印度的区域内建立“民族省”,会引起印度各族人民要彻底消灭那些把印度的許多民族分散在許多地区的行政区划,首先是消灭印度的各个封建土邦的愿望,因为,如果不消灭封建土邦,印度的政治制度就不能彻底民主化。此外,如果这样作,就连挑拨宗教纠纷也感到困难了,因为,印度联邦并不是由建筑在居民的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国家构成所组成的,而是由各个民族联合所组成的,这种民族联合是很难使其互相对立起来的。建立联合所有民族关系相同的居民的行政单位,会促进印度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加速消灭封建残余和根除宗教纠纷。同时应当指出,在按照民族原则划省的情况下,各省(除了孟加拉之外)居民的宗教信仰也都是很相同的,因此,印度共产党在其公告中声明,印度的民族国家划界以及不給予省和土邦自决权,而給予印度各民族地区自决权,将比印度划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更有效地和更彻底地解决印度教—伊斯兰教問題。

在帝国主义时代,英国的政策是保护封建制度的残余,并以这些残余为支柱。印度的民族国家划界是个民主的措施,它促进了封建残余的消灭,因而,实际上是个进步的措施。此外,如果不进行民

族国家划界，就不能彻底消灭那些摆在印度各族人民发展道路上并使印度各族人民天夭落后于欧洲、美洲和远东各族人民的障碍。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这篇文章中写道：

“毫无疑问，世界上人口最密的亚洲，大部分都处于‘列强’殖民地的状况，或是在民族关系上极不独立极受压迫国家的状况。可是，这种令人皆知的情形，难道能丝毫动摇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在亚洲只有日本一国，就是说只有在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里，才造成了种种条件来使商品生产能够最完备发展，使资本主义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发展的事实么？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亚洲是否来得及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也象欧洲那样形成各个独立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体系，我们无从知道。

但有一点始终是无可争辩的，就是资本主义把亚洲惊醒起来了的时候，在那里也是到处都引起了民族运动，而这些运动的趋向是要在亚洲创立一些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会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①

这篇文章是列宁于1914年，即资本主义还统治着全世界的时期写的，但是，直到现在，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代，当资本主义已不再是不可分割的统治制度的时候，这些话丝毫也没有丧失其重要性。不消灭一切封建残余，整个印度就不可能获得进一步发展，印度的各族人民就不可能获得发展，只有成立各民族民主共和国的独立联邦，印度才能够消灭本国的落后性，并在世界各国当中占应有的地位。

1947年6月所实行的印巴分治法，英国政府仍善地称其为“将政权交给印度的法律”，其实，丝毫也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印度划分为巴基斯坦和印度联邦只考虑到居民的宗教成分，而没有考虑到居民的民族成分。

印度和巴基斯坦划界时，中央旁遮普被分裂为两部分，这样一来，在印巴分治以前几乎完全都集中在一个省内的旁遮普人，现在被划分在两个自治领中。

在印巴分治以前，90%的孟加拉人都联合在孟加拉省内，只有较少一部分孟加拉民族地区不包括

在这一省内。而目前，孟加拉被划分为两个省：西孟加拉（加入印度联邦，有2,400万人）和东孟加拉（加入巴基斯坦，有3,900万人）。无论是包括印度的大部分领土的印度联邦，或者是巴基斯坦，都不是一个居民的民族成分相同的国家。

塔密尔地区、喀拉拉地区和馬拉雅拉地区以及馬哈拉斯图拉、羅拆罗、奧里薩、拉扎斯特汗、印度斯坦和比哈尔都仍旧完整地留在印度联邦内；完整地加入巴基斯坦的有信德地区和帕坦地区。旁遮普和孟加拉地区则正如上面所談的，被划給两个自治领：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在进行着争夺克什米尔的斗争，而英美帝国主义者不顾克什米尔人的愿望，支持巴基斯坦。安德拉地区被划归印度联邦和海得拉巴土邦。

这样一来，英国政府的这种行为使民族问题的解决发生了新的困难。忽视印度各族人民要在印度联邦内建立自己民族国家这种合法的和进步的愿望，不可能不给印度带来严重的后果。

巴基斯坦的帕坦问题特别复杂尖锐，争取建立独立的帕坦斯坦的运动一直在繼續着，而且受到阿富汗政府的支持。

巴基斯坦政府利用阿富汗各部落——阿富汗德人和瓦基尔人——来干涉克什米尔，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使阿富汗德人和瓦基尔人从属于巴基斯坦，而且也是为了使他们脱离争取建立帕坦斯坦的斗争。

毫无疑问，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存在着重孟加拉的问题，目前，西孟加拉和东孟加拉都已掀起争取统一的运动。

虽然有400万塞克教徒和印度教徒迁出西旁遮普，有400万伊斯兰教徒迁出东旁遮普，但是，旁遮普问题也还不能算是解决了。

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分裂也和克什米尔问题一样，毫无疑问，还将长期被英国和美国利用来加剧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

直到现在，印度联邦还仍旧保持着旧的行政区划，印度的许多民族所居住的地区都被分成许多块。印度政府是大资产阶级，即主要是羅拆罗和馬尔瓦尔资产阶级的政府，因而，它不急于解决民族问题。此外，印度政府害怕群众运动，因而，力图在承认各大土邦的领土不受侵犯和保持他们的权力

①“列宁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25页。

基础上,与土邦的領導者达成協議。印度政府着手廢除奧里薩土邦和联合省,并着手联合德干土邦,加提雅瓦尔土邦,旁遮普,拉支普坦等地区,这些措施与尖锐的冲突没有什么关系。大公們自己感觉到自己地位的不稳固,于是准备在取得一定补偿和保持他們的土地私有的条件下放弃幻想的政权,但是,印度的大资产阶级未必敢于侵犯海得拉巴,买塞尔,特拉凡哥尔,柯欽,巴罗达,瓜洛尔这样一些土邦,然而,如果不消灭这些土邦,就不可能联合馬拉地人、喀拉拉人、铁鲁古人、馬拉雅拉人等所居住的各个民族地区。

最近,具有大国主义情緒的瑪哈薩巴党开始在印度发展起来,該党在1945——1946年,在反英运动高涨的时候几乎化为烏有。虽然这一組織与甘地的被刺杀有关系,但是它仍然繼續起作用。在靠近瑪哈薩巴党的各种报纸和杂志中,以猖獗的带侵略性的語調大事宣傳,要采用印地語作为印度的国語,采用音节字母作为印度国語的字母。至于談到排挤英語在各个社会組織中的使用,并用印度斯坦語来代替英語,这一要求在頗大程度上是进步的。然而,当印地語与烏尔都語和印度許多民族的民族語言对立起来的时候,这一要求則反映出印度大资产阶级的大国主义傾向。

印度的立宪會議反映着瞿拆罗和馬尔瓦尔资产阶级的大国主义傾向,它宣布采用印地語和英語作为印度联邦的国語。在印度的各个新的立法机关中,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代表們才可以用本族語言来发言,因此,印度资产阶级不仅沒有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統治,而且自己也开始执行起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政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本質就是如此。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当它还受着压迫的时候,它就争取民族平等,但是,一旦它掌握了政权,便馬上开始享有一切特权,并損害其他弱小民族的利益。列宁在“論民族自决权”中談到馬克思主义者对待民族运动的态度时写道:“当被压迫民族中的资产阶级对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时,我們始終都要比任何人更坚决地予以贊助,因为我們是最大胆,最坚决反对压迫的。当被压迫民族中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我們便要反

对。我們反对压迫民族底特权和暴力行为,同时絲毫也不袒护被压迫民族方面图謀特权的趋向。”^① 瞿拆罗和馬尔瓦尔的大资产阶级採納了“蒙巴頓計劃”^②,并与英国資本达成有关分割印度市場的協議,同时,力图首先靠排挤民族市場中的弱小民族的资产阶级来扩大自己在这—市場中的势力范围,因此,它阻碍了印巴分治以前国大党当众宣布的一点也不過分的民族綱領的实现。印度资产阶级沒有能力解决民族問題。

只有民主派取得胜利和在印度确立人民民主制度,才能为彻底解决民族問題創造条件。

* * *

由于印度200年来长期处在依賴英国的殖民地地位,印度的資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因此,民族形成的过程也受到了阻碍。19世紀,民族形成的过程便开始了,但是,直到現在还没有完成。

在殖民地印度,資本主义首先在接近印度的三个最重要的港口和經济中心——加尔各答、孟买和馬德拉斯的地区发展起来,因此,在經济上傾向于这些中心的部族,便早于其他部族被捲入資本主义发展的范围,而且开始形成民族。东印度的孟加拉人、烏利耶人和阿薩姆人、西印度的馬拉地人和瞿拆罗人、南印度的塔密尔人、铁鲁古人、喀拉拉人和馬拉雅拉人便是这样的民族。

印度西北部的三个已形成为民族的族,即信德人、阿富汗人和克什米尔人也属于此列。这一种民族总共占印度人口的47.5%以上。

在印度远离海岸的地区,即恒河流域和旁遮普,資本主义发展得晚,因而民族形成的过程更加受到了阻碍,那里的民族还正处在形成阶段。属于这一种的有下列部族:旁遮普人、拉扎斯特汗人、印度斯坦人和比哈尔人,总共占印度人口的48%。

除了这些較发展的民族之外,印度还有很多居住在落后的山区和很少被捲入資本主义发展的势力范围的部族和部落。属于这一种的有俾路支人、布希尔人、桑塔尔人、貢德人、奥拉昂人和其他許多部族,他們总共約占印度人口的5%。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836页。

② 印度的报刊中曾印巴分治法叫“蒙巴頓計劃”。

从20世纪30年代起，印度掀起了各民族争取自决权的运动。这一运动在孟加拉人、馬拉地人、安德拉人、喀拉拉人、馬拉雅拉人、烏利耶人、克什米尔人、信德人和阿富汗人中間最激烈，而在塔密尔人和瞿拆罗人中間則不是那样十分激烈。

这一运动的主要要求是：

1. 改变印度的行政区划，每一个部族都联合在一个行政单位中。
2. 吸收該民族的人参加該行政单位的国家机关工作，并以該民族的民族語言进行文牘工作。
3. 排除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化发展道路上的的一切障碍，学校完全以民族語言进行教学。

归根到底，这些运动旨在反对封建和半封建的土邦这样一些封建割据的残余，削弱宗教联系和种姓联系，而以民族联系来代替它們，旨在反对英国人和英語的統治地位，因此，这些运动是反封建和反帝的运动。正因为如此，印度各民族的运动与全印民族解放运动融合在了一起。

因为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印度各民族地区的社会关系也不同，因此，各民族的民族运动也具有不同的性质。瞿拆罗人、拜火教徒和馬尔瓦尔人的资产阶级已經在全印市場上居統治地位，因此，它与其他各族較輕弱的资产阶级不同，并不关心本民族市場，而力图統治全印市場，所以，它倾向于印度国家机关中央集权。瞿拆罗和馬尔瓦尔的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情緒，說明了国大党领导机关的民族政策，国大党口头上支持印度各民族的“要求，然而一向企图縮小民族运动的范围，因此，国大党领导机关并没有支持印度各民族关于給予他們直到分立和建立独立国家的充分自决权的要求。只有印度共产党制定了彻底民主解决印度的民族問題的綱領。

因为印度的民族运动是反帝和反封建的运动，英帝国主义不能充分利用来分裂全印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千方百计地企图削弱这些运动，阻碍印度各民族的发展，挑撥宗教糾紛，支持种姓制度和保护封建土邦。

印度之分裂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不仅沒有解决印度的民族問題，而且使民族問題的解决产生了

新的困难。只有把印度改变为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并承認各民族的分立权，才能够彻底解决印度的民族問題，这样一来，也将为彻底根除宗教糾紛創造条件。但是，印度的大资产阶级与英帝国主义勾結在一起，并与封建大公安协，因此它不能解决民族問題。“数十年来，资本主义世界想用各民族自由发展和人剝削人的体系結合起来的方法来解决民族問題的企图，毫无結果可言。反之，民族矛盾的挖陷越来越紛乱，而威胁资本主义存在本身。资产阶级已經无力建立各民族的合作了。”^①只有以印度工人阶级为首的印度民主势力取得胜利，民族問題才能够得到解决。

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大资产阶级的民族压迫的斗争，在印巴分治以后更加尖锐化起来，民族內部的問題成了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的一个最重要的問題。

(高文德譯，原載“印度民族問題和英帝国主义”一書)

土尔克明人 (上接65頁)

服装的特点是民族形式和城市式样相結合的服装。在节日里，男子在城市服装外面还穿上一件紅綢罩衫。除民族头飾——羊皮帽、圓帽，还盛行着鴨舌帽和礼帽。脚上穿的是皮靴和皮鞋。老年人还穿民族式样的衬衣、褲子和用牛皮作的鞋。在农业地区妇女穿着束腰緊身的連衣裙（一般是紅色）和窄褲脚的長褲。头上纏着寬的綢圍巾或者毛料圍巾。在很多地区还保留着用銀耳環裝飾的高圓筒状的头飾（从前，各部落都有其独特的头巾）。外衣是長袍或者大衣。妇女服装飾有大量銀制飾品。

土尔克明的民間創作和音乐艺术是丰富多彩的。

在伊朗和阿富汗，土尔克明人是少数民族。由于宗法民族关系的残余而加深了封建剝削。国外土尔克明人（和居住在苏联的教徒一样）信仰逊尼派的伊斯兰教。

(阮西湖譯自“大百科全书”第42卷)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188頁。

資料与 研究

列宁的民族政策

——列宁有关民族问题的介绍提要——

С. В. 喀扎科夫

緒 言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指出：必須克服宣傳工作和共产主义建設实际脫离的現象，根除和馬克思列宁主义創造精神不相容的教条主义和书獃子习气。党在思想工作的一切方面，包括民族問題在內，通过消灭个人崇拜的殘余而武装了起来。

在“列宁的民族政策”提要一书中，首先編选了列宁提出并論証布尔什維克解決民族問題綱領的作品。本书所編选的一些著作，將介紹列宁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活动，闡述列宁与大国沙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与那些煽动民族仇視和进行反犹太人宣傳的俄国黑帮分子以及资产阶级政党所进行以不調和的斗争，同时也將介紹列宁与使民族趋于分崩离析的崩得、取消主义者以及机会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列宁的这些著作，表明了他作为多民族苏維埃社会主义国家的組織者和建設者的偉大作用。

提要还远不是詳尽无遺。但本书所編选的著作和文件考慮到了广大苏維埃知識界的需要，首先它考慮到了广大图书館員的需要，使他們能够利用来向关心共产党民族政策問題的讀者介紹这些著作，可以作为宣傳員和誦讀者的有益教材。

提要共分五章

第一章——“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問題的理論綱領”——編选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苏联共产党的決議，这些著作和決議闡述了如何在理論上研究民族政策問題，反映了布尔什維克党为推翻专制制度和資本主义而在俄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国际主义团結方面所作的实际工作。本章所

編选的著作和文件，多半都是按年代即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的；但是，列宁的作品，無論在本章或在其他各章里，都是編排在前面，在个别一些情况下，并不是按年代次序，而是把列宁的一些主題有联系的著作列在一起发表的。

第二章——“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民族問題的解决”——編入的作品有列宁以及苏联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領導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解决民族問題的綱領和党的文件，以及表述十月革命以后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就和闡述这一政策的實質的宣傳論文。本章材料的排列次序，同样是采用上章的办法。

第三章——“在第六个五年計劃中各加盟共和国經濟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編入的作品有：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反映党对于进一步增长苏联社会主义各民族物質和精神力量的关怀的決議和材料，赫魯曉夫和布尔加宁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決議，是按年代次序排列的，而各民族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是按各加盟共和国名称字母次序排列。

提要的第四章——“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平和各民族人民之間友好的政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在保卫和巩固和平事业中的新貢獻”——这一章里分列舉了列宁的著作，其中有表述苏維埃国家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和不同社会制度各国之間和平共处的論著。并且編选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和決議，这些材料和決議竭力重新強調苏联的对外政策过去和現在

始終堅持列寧的共處政策、和平和各族人民之間友好政策。列寧的著作是按年代次序排列，代表大會代表的發言，則是按他們姓名的字母次序排列的。

第五章——“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人民民主國家各民族相互关系的基礎”——編選了這些國家的憲法和某些其他有關資料。

列寧的著作是取自“全集”第四版。

提要的最後一部分，是著作和文件索引及系統的建議，目的是要給圖書館當前的工作提供參考材料。

材料的編選工作已於1956年7月中旬結束，因

此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代表的一些發言，是根據“真理報”編的。這些發言以及代表大會的其他材料，都曾收集在後來出版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1956年2月14—25日速記報告）匯編”（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56年莫斯科版，第1、第2卷——第1卷共640頁，第2卷共559頁）。最後還要交代一下，“列寧論民族和民族殖民地問題”一書也正在排印中。（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56年莫斯科版，共599頁，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附設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

一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和綱領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55年莫斯科版，共72頁，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附設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51年北京第4版）

這本科學共產主義的綱領性的文件，出版於1848年。在這本書中，反映了馬克思、恩格斯對於民族問題的觀點，闡述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思想。本書還探討了民族形成的歷史條件，揭示了剝削階級作為民族壓迫的組織者和代表者的作用，同時還指出：“民族內部的階級對抗一消滅，民族間的敵視關係也就會跟着消滅。”“宣言”的最後一句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後來成了全世界工人階級戰鬥的革命口號。（參看第55，第76頁——系中譯本頁碼，以下均同此，除俄文本外，不再說明。）

恩格斯：“流亡者文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5卷，第217——223頁；（中譯文“波蘭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殖民地及民族問題的論著”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譯，1956年版，第371——380頁），

該文發表於1874—1875年。恩格斯在這篇文章中不僅提出了解決波蘭問題的革命綱領，而且還闡明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重要原理：“壓迫他族人民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參看第379頁）。

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改造社會民主主義者？”（回答“俄國財富”雜誌反對馬克思主義者的論文）——“列寧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111—313頁（中文版，第1卷，第109—309頁）。

這本著作是1894年列寧為反對自由主義民粹派和捍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而寫的。在這本書中，列寧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民族問題的重要意見。列寧駁斥了民粹派米海諾夫斯基在民族形成問題上的唯心主義觀點，駁斥了他認為民族仇視現象是與階級鬥爭無關的獨立因素的看法。列寧論証了經濟因素（全俄市場和巨大的工業中心的建立）在俄羅斯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同時指出了，工業資產階級的實際利益是造成民族糾紛的基礎。列寧強調指出，由此可見，只有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向壓迫者階級進行了勝利地鬥爭，民族糾紛才能消滅。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綱領草案”——“列寧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2—17頁（中譯文載“列寧文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冊，第120—128頁）。

這個“草案”是在1902年1月末2月初寫成的。列寧在這個綱領草案中，除了其他的民主要求外，還提出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民族綱的基本要求——即承認國內各民族的自決權。（參看123頁）

列寧：“猶太無產階級是否需要‘獨立的政黨’”——“列寧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295—300頁（中譯文載“列寧文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冊，第232頁—238頁）。

這篇論文寫於1903年2月。在這篇文章里，列寧抨擊了崩得的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因為崩得主張孤立和分離各民族，贊成建立聯邦的工人政黨。列寧捍衛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國際主義和集中制原則，強調指出：俄國各民族的工人階級必須

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沙皇、地主和资本家。

列宁：“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列宁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412—420頁（中譯文載“列宁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17—29頁）。

本文寫于1903年7月。在這篇論文中列宁从理論上對於黨在民族問題方面重要的綱領性的要求——民族自決權作了深刻地論證。列宁同时还指出，必須根据具体历史条件来实现这些要求并且使这一要求无条件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公历7月30日〕至8月10日〔公历8月23日〕在布魯塞爾、倫敦举行）——“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汇编”1954年版，第1卷，第37—43頁；（中譯文載“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选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第1册，第1—10頁）。

在綱領中有关民族問題的各条（第3、第7、第8和第9条）中，党提出了在成立民主共和国后应当实现的各項要求：民族和語言完全平等，国内各民族有自決權。

列宁：“关于民族問題的決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會和党的工作人員1913年夏季會議的決議）——“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384—386頁（中譯文載“列宁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63—66頁）。

在列宁起草的这个決議中，指出了俄国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增长，以及这一增长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时还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民族問題的原则指示。列宁認為：在資本主义的可能範圍內，解决民族問題，首先必須取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俄国整个国家制度的民主化。決議駁斥了分化各民族劳动人民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并提出了各民族的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組織內，实行国际主义团結的馬克思主义原则，来与这一口号相对立。決議坚持了被压迫民族的自決、直到分立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同时指出，一个民族的分立是否适宜，“社会民主党在每一个个别場合之下……，都应当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着眼加以解决。”

参看第65頁）

列宁：“关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1—34頁（中譯文載“列宁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83—125頁）。

列宁綱領性的著作“关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1913年10—12月）和“論民族自決權”（参看下一条），論證并发展了解决民族問題的理論、政治和組織原則。

在“关于民族問題批評意見”一文中，列宁回击了取消派、崩得分子、烏克蘭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其他机会主义者，这些人拥护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文化”的口号，企图分裂工人运动的統一，使每一个民族工人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服从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能調和的互相敌对的口号，它們是和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阵营相适应的，并且表现出民族問題上的两种政策（甚至：两种世界觀）。”（参看第92頁）列宁指出在資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在每个民族中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化，也有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分。他写道：“……我們从每个民族文化里只是取出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取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无条件是要和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相对抗。”（参看第89—90頁）

在这本著作中所發揮的关于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发生作用的民族問題上的两个历史趋向的原理，有着重大的論理和政治意义。列宁教导說：第一个趋向反映了民族运动的兴起，表明了各民族反对民族压迫，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第二个趋向是发展經濟和其他方面的联系，打破民族壁障。列宁指出：馬克思主义的民族綱領考虑到这两个趋向，它首先是坚持各民族和各种語言一律平等，并保卫国际主义原则，毫不調和地反对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毒害无产阶级（参看第93頁）。列宁尖锐地批判了完全建立在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口号上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綱領，高举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主張民族接近和各民族的工人团結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組織里。

列宁：“論民族自決權”——“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365—424頁（中譯文載“列宁

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167—237頁；另有莫斯科版中文單行本）。

本書寫於1914年7月至11月間。列寧在這本書中，揭穿了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綱領的機會主義者。列寧斷然地斥責了羅沙·盧森堡及其同道者波蘭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在帝國主義條件下，不可能實現民族自決權的錯誤觀點，批判了他們在具體歷史條件下沒有觀察民族問題的能力，看不到早已結束和沒有結束資產階級民主變革的國家間在問題提法上的不同點。列寧全面論証布爾什維克黨綱民族綱領的基本要求，着重指出民族自決就意味着各民族有分立並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該書簡述了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實踐綱領：民族和語言的完全平等，實行區域自治，保證少數民族的權利。

列寧：“論‘民族文化’自治”——“列寧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455—458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67—72頁）。

列寧：“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民族綱領”——“列寧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488—494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2版，第73—81頁）。

列寧：“關於奧地利與俄國民族綱領的歷史”——“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82—84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131—135頁）。

列寧：“以精巧的民族主義來腐蝕工人”——“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266—268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163—166頁）。

這幾篇論文中的前兩篇，是1913年發表的，後兩篇是1914年發表的。列寧指出了資產階級為了分裂工人階級而竭力加以喧嚷的民族主義的危險性，談到不僅應該堅持民族和語言平等，而且要各個不同民族的工人融合在統一的無產階級組織中，與此相聯繫，列寧再一次地揭穿了崩得分子、取消派和其他機會主義者所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綱領的資產階級反動性質；指出這個綱領實質上就是要求把學校事務（及其他與文化問題相聯繫的職權）從國家手中轉到各個民族手中，而不問這些民族所占的地域大小。列寧在上述著作中指出了崩得和取消

派援引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好象已採納了“民族文化自治”綱領的說法，來巩固自己立場的企圖已經破產。列寧寫道：“……奧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布隆大會（1899年）上曾拒絕了他所提議的，‘民族文化自治’綱領。他們僅僅以國內一切民族分界的領域之聯合方式採取了妥協。在這一妥協中，既沒有治外法權，也沒有民族分校。”（參看第71頁）列寧又指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從未通，‘民族文化自治’的綱領——只在奧地利一個國家內曾提出過這個綱領。”（參看第165頁）

列寧：“民族平等法案”——“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153—154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141—143頁）。

這是準備提交第四屆國家杜馬的法案（1914年3月），要求廢除對一切民族——猶太人、波蘭人及其他民族的限制，但是這個法案，也反對統治階級所煽起的反猶太人主義。列寧強調指出，應當使俄國工人階級反對民族壓迫的呼声响徹云霄。

列寧：“關於民族政策問題”——“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197—204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145—154頁）。

列寧：“民族平等”，——“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215—216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155—157頁）。

這兩篇著作寫於1914年4月。第一篇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代表在國家杜馬中宣讀的講演稿。列寧痛斥了黑幫份子和資產階級政黨，因為他們堅持大俄羅斯的特權，壓制烏克蘭民族的民族文化，大力進行反猶太人宣傳。列寧簡要地闡述了布爾什維克黨關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堅持各民族完全的平等和俄國各民族工人的階級團結。

列寧：“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1卷，第84—88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241—247頁）。

該文發表於1914年12月，即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期間。列寧揭穿了企圖用“保卫祖國”的口號，為掠奪性戰爭作辯護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家和交戰國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列寧把俄羅斯無產

階級及其先鋒隊——布尔什維克黨革命的民族自覺心與各式各樣的沙文主義對立起來。列寧寫道：覺悟的俄羅斯工人階級對民族自覺心的感情，不可能格格不入的。因為俄羅斯人民的優秀代表，英雄的俄羅斯無產階級，對於革命的解放運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的，無產階級愛國主義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列寧一方面強調無產階級的民族利益與社會主義的利益的一致性；一方面指出，保卫祖國的唯一方法，是用革命手段消滅我們俄國最狡猾的敵人——沙皇、地主和資本家，為建設社會主義、解放沙皇制度壓迫下的各民族，並實現各民族完全平等而斗争。

列寧：“革命的無產階級和民族自決權”——“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1卷，第371—377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275—282頁）。

該文寫於1915年10月。在這篇論文里，列寧批判了帕拉別魯姆（卡爾·拉狄克）的錯誤觀點，他斷言：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當資本主義已超出民族範圍的時候，爭取實現民族自決權的斗争是一種“幻想”。列寧指出，資本的增長超出民族範圍，意味着民族壓迫在新的歷史基礎上的擴大和加速，而由此可得出結論說，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革命斗争，必須同民族問題上的革命綱領，同無條件地承認被壓迫民族的分立權聯繫起來。然而，列寧強調指出，“我們要求自決的自由，也就是說，要求獨立，要求被壓迫民族有分立的自由，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夢想經濟上的分裂，夢想建立小國家；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們希望建立大國，希望各民族在真正民主與真正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實行親善乃至融合，而沒有分立的自由，這種真正民主和真正國際主義的基礎是不可想象的。”（參看第281—282頁）

列寧：“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提綱）”——“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2卷，第132—145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283—304頁）。

列寧：“民族自決問題討論的總結”——“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2卷，第306—344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309—358頁）。

在這兩篇著作（1916年）中，闡述了革命的馬

克思主義政黨對待民族問題的態度，特別是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以及革命勝利以後對待民族自決權問題的態度。列寧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問題已經變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變成共同推翻帝國主義有緊密聯繫的世界性的民族殖民地問題。列寧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進行了爭論，他們認為，民族自決權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是不能實現的，而在社會主義社會是不適用的，從而在民族解放戰爭的問題上採取了不正確的立場。列寧同時也與考茨基分子、社會沙文主義者及其他機會主義分子進行了爭論。列寧證明說，布尔什維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提出的自決直到分立的口號，在社會主義革命條件下，也完全保持了它的作用和意義。列寧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各民族的接近甚至融合。但是，人類“……只有經過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完全解放（就是被壓迫民族分立的自由）的過渡時代，才能達到這一點。”（參看第287—288頁）

列寧確定了在實行民族自決方面的三種國家類型，明確地指出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行動方針：無產階級“各強大”民族的無產階級應當主張被“本”民族壓迫下的各民族有分立自由，而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應當堅持並實行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和壓迫者民族的工人之間的完全統一。按列寧的話來說，只有實行這種政策，才能為各民族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結成自由的聯盟準備基礎。

列寧：“猶尤尼烏斯的小冊子”——“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2卷，第291—305頁（中譯文摘錄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361—374頁）。

列寧：“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滑稽解釋和‘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3卷，第16—64頁（中譯文摘錄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375—377頁）。

這兩篇都是1916年寫成的。在第一篇論文中，列寧指出卢森堡（尤尼烏斯）關於在帝國主義時代不能進行民族解放戰爭的意見，以及他對保卫祖國問題所作結論的謬誤性。第二篇文章批評了П·烏也夫斯基（Ю·皮達可夫）在民族自決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問題上的反馬克思主義立場。列寧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對於戰爭和保卫祖國的態度，指出過去發

生过的真正民族解放战争，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也完全有可能发生。

列宁把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从而论证了：必须把先进国家的工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被剥夺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必须承认各民族有分立的自由。同时列宁又强调指出，被压迫民族分立自由的口号，并不等于“推荐”分立，而是为了促进和加速各民族之民主的接近与融合。列宁认为先进国家的工人同殖民地民族的接近，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不这样，社会主义在欧洲是不会巩固的。”（参看“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3卷，第55页）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四月”）全俄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说（1917年5月7—12日）”——“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4卷，第260—268页（中译文载“列宁论民族问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1955年版，第381—386页）。

列宁：“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4卷，第269—270页（中译文载“论民族问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1955年版，第387—388页）。

同时并载于“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4年俄文版，第1卷，第345—346页。

列宁在这个演说和他起草的决议案中，简述

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础。除了其他一些条例外，代表大会还宣布了俄国境内的一切民族都有自由分立并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因为只有承认这个权利，才能充分保证各民族工人的彻底团结，并促进各民族在真正民主基础上接近。列宁批评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不正确的立场以及皮达可夫在这问题上的民族主义观点。列宁的演说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党为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时期，进一步巩固了俄国各民族的国际团结。

列宁：“**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6卷，第123—150页。

这篇论文写于1917年10月。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谈到党的民族纲领（参看“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6卷，第148—149页）时，建议把多次被人用来作藉口的“民族自决权”说法代之以更精确的“自由分立权”的概念。列宁再三着重指出：党所希望的不是分裂，而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自愿地联合在一个尽可能大的国家里。但是，为此，就必须承认每一个民族有分立的自由。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卷，第289—358页。

这本书出版于1913年，在这本书里，阐明了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历史条件，给民族下了定义，同时并叙述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和纲领。在本书中，对“民族文化自治”这个机会主义纲领的批判，占很大篇幅。

二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蘇聯民族問題的解決

“**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苏联的形成，（1917—1924年）政策文件法令汇编”，B·格尼基诺依主编，苏联科学院194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9—20页（中译文载同书，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译，1954年版，第31—34页）。

宣言是1917年11月2日（15日）通过的。它宣布并保证了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平等和自主，宣布了各民族有自决直到分立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宣布了废除民族的特权和限制以及俄罗斯各民族和部族的自由发展。

列宁：“**关于党纲的报告**”（3月19日）（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18—

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4—163页（中译文载“列宁论民族问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1955年版，第419—430页）。

在这个讲演中（参看419—422页），论证了党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各项原则。

“**俄国共产党（布）纲领**”（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18—23日）——“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4年俄文版，第1卷，第409—430页（中译文载同书“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第1册，第92—119页）。

在纲领的“在民族关系方面”一节里，（参看第102页），说明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础。纲领宣

布：廢除民族特權和限制，殖民地及無權民族有分立并建立國家的權利，必須要特別謹慎地對待各被壓迫民族或無權民族勞動人民的民族情感的殘余。

列寧：“論對猶太人殘暴的迫害〔演說，錄音原片記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9卷，第227—228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431—432頁）。

這篇講演是1919年3月作的。在這篇講演中列寧揭穿了反猶太主義的來源——資本家力圖煽起對猶太人的仇視，藉以轉移勞動人民對真正的敵人——資本家的視綫。列寧号召各民族的工作人員要以兄弟般的信任結成戰鬥的聯盟，共同為推翻資本家而鬥爭。

列寧：“給土耳其斯坦共產黨員同志們”——“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0卷，第117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435頁）。

列寧：“在東方各民族人民共產主義組織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19年11月22日）——“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0卷，第130—141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437—450頁）。

列寧：“俄共（布）中央關於烏克蘭蘇維埃政權的決議草案”——“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0卷，第267—273頁。

列寧：“關於戰勝邓尼金事致烏克蘭工人和农民的信”——“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0卷，第267—273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451—459頁）。

這幾篇文章都在1919年寫的。在這几篇文章里，列寧闡釋了蘇維埃政權民族政策的實質，并号召从前被壓迫民族緊密地團結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周圍來粉碎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暴亂。列寧對於在从敵人手中解放出來的土地上建立的各个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关系，給与很大的注意。列寧寫道：“我們主張建立各民族自願的聯盟，這樣的聯盟不會允許一个民族對另一个民族施加任何強力，這樣的聯盟是建立在充分信任，对兄弟般統一的明确認識和完全自願的基础上的。”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0卷，第269頁）列寧要求，對於民族不信任心理的殘余，應該非常謹慎，耐心，採取让步態度，要无情地根絕那怕是很

微小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表現。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1卷，第1—97頁（中譯文載“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689—778頁）。

這篇著作（1920年），論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战略与策略問題。在這篇文章中，列寧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論點：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即使无产階級革命在全世界範圍內取得勝利后，也還存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因此，列寧主張要使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正確的适用于民族差別和民族國家的差別。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而作）”——“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1卷，第122—128頁：（中譯文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469—477頁）。

列寧：“在民族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上的報告”（1920年7月9日—8月7日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15—220頁（中譯文摘錄載“列寧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1955年版，第483—489頁）。

這篇著作分析了帝國主義時代民族革命運動的實質，確定了共產黨在民族殖民地問題上的策略。列寧提出并論証了一個最重要的原理：“……在最先進國家的无产階級幫助之下，落后國家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過渡到蘇維埃制度，并經過一定的发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參看第487—488頁）列寧闡明了蘇維埃聯邦这样一种使各个蘇維埃共和國在自願的和國際主義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國家形式的意義。列寧指出了聯邦制在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實踐中，顯示了它的適宜性；同時号召蘇維埃俄羅斯的各族人民要更加緊密地結成聯邦，不这样就不可能捍卫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存在，就不能發展各國的生產力，保証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福利。

列寧：“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共產黨人”杂志，1956年第9期，第22—26頁（中譯文載“民族問題譯丛”，1957年第3期，第1—5頁）。

這封“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的信，是1922年12月30—31日，即在通過各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約和宣言的苏联第一次苏維埃代表大会进行工作期間，列寧的口授記錄。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列寧是多民族蘇維埃社会主义國家的真正的鼓舞者和締造者，反映了列寧對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鞏固我國各民族友誼的關懷。列寧堅決地斥責了在民族問題上的大國主义傾向，認為這是當時情況下的主要危險，指出要提防大國沙文主义者对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成統一的聯盟國家思想的歪曲，提防对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和各蘇維埃共和國平等原則的破壞，要警惕極端集中和在這個問題上的官僚主义。在這封信里強調指出，必須要為蘇聯各族人民从形式上的平等達到事實上的平等而斗争，指出了蘇維埃聯盟國家的建設不仅对我國，而且对東方亿万人民的巨大意义。

不論在這封信中，或是以前，即1922年12月27日的信里（參看“關於未發表過的列寧文件說明——‘共產黨人’”杂志，1956年第9期，第26頁，中譯文載“批判斯大林文集”〔第2輯〕人民出版社版，第329—331頁），列寧尖銳地批判了斯大林在解決民族政策問題上急躁和命令主义的态度的錯誤，批判了他對待大國沙文主义現象的調和主义的態度；因為他提出的“自治化”草案，不是主張使各个平等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平等聯合，而是要他們作為一个自治單位加入俄羅斯蘇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國。

斯大林：“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务”（1921年3月10日在俄國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報告和結語）——“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33—49頁（中譯文載“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149—162頁）。

“關於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务”（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舉行的俄國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蘇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匯編”，1954年俄文版，第1卷，第553—563頁；（中譯文載同上書“選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第1冊，第164—175頁）

這個報告和決議中指出，在蘇維埃制度條件下，我國各民族已獲得了法律上完全平等。代表大會認為擺在黨面前的任务，是消滅當時表現在各被壓迫民族經濟和文化落后方面的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代表大會指出，必須幫助各民族共和國的勞

動人民發展和鞏固他們的蘇維埃國家，發展和鞏固自己的經濟和文化，保證加速培養當地干部。代表大會严厉斥責了成為當時主要危害的大國沙文主义傾向，同時也斥責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傾向。

斯大林：“論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1922年12月26日在全俄第十次蘇維埃代表大会上的報告）”——“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145—155頁（中譯文載“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174—184頁）。

“關於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聯盟成立宣言”——“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393—395頁（中譯文載“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187—189頁）。

——“關於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聯盟成立条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396—401頁（中譯文載“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189—196頁）。

在1922年12月30日蘇联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会所通過的宣言和条約里，體現了蘇維埃各民族社会主义國家藉以建立起來的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體現了列寧的各民族平等和兄弟般合作的思想。

“奧尔忠尼啓則論文和演說集（1910—1926年）”（兩卷集）——蘇联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56年版，第1卷連同插圖共516頁。

本書所收集的奧尔忠尼啓則許多論文和演說，都闡述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這本著作中明確指出，只有在蘇維埃政權條件下，在一向成為各民族仇視最厉害場所的高加索，才確立了各民族間持久的和平，奧尔忠尼啓則非常注意對勞動人民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問題，強調指出了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聯盟成立的历史意义。收輯在本書中的“致第一次全高加索共产主义青年代表大会的賀詞”（“論文和演說集”，第207頁）和“紀念光榮的巴統人民委員”論文（同上，第242—244頁）以及其他許多演說，都充滿了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精神。

斯大林：“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要素（1923年4月23日和25日在俄國共产党〔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報告和結語）”——“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236—275頁（中譯文載“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209—237頁及“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編譯，1954年版，第111—123頁）。

“关于民族問題 (1923年4月17—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 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汇编”, 1954年俄文版, 第1卷, 第709—718頁 (中譯文載同上书“选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第1册, 第188—198頁)。

这个決議是根据当时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問題”一文中所作的指示写成的(參看本期本刊第42—43頁)。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指出了苏維埃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就, 同时号召党要坚决消除过去在民族关系方面的有害的遺產, 代表大会提出了繼續消灭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 即消灭过去被迫压迫民族經濟及文化落后状态的任務, 坚决地剷除成为当时主要危險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殘余以及地方民族主义的殘余。代表大会斥責了民族主义的殘余; 着重指出有一部分中央和地方的苏維埃工作人員, 不把各共和国联盟看作是負有保証各民族共和国自由发展使命的各个平等国家单位的联盟, 而看成是取消这些共和国的一个步驟, 这一事实是难以令人容忍的。代表大会認為, 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某些国家机关力图使各个自治共和国的独立人民委員都服从自己, 从而取消这些部, 也是旧东西的殘余。在決議中指出, 在有几个民族組成的共和国中, 特別危險的就是地方沙文主义, (格鲁吉亚人的沙文主义反对阿尔明尼亚人、沃舍梯人、阿扎尔人和阿布哈茲人、阿捷尔拜疆人的沙文主义反对阿尔明尼亚人、烏茲別克人的沙文主义反对土耳其明和柯尔克茲人)。代表大会斥責了对于共产主义事业既有害又危險的两种傾向, 号召全党迅速消灭过去遺留下來的殘余, 責成各民族的共产党員要同地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

“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決議 (1930年6月26日至7月13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 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汇编”, 1954年俄文版, 第3卷, 第10—22頁 (中譯文載同上书, 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4分册第122—136頁)。

在这个決議里, 斥責了企图在国际主义旗幟下修正列宁的民族政策基础的大国主义傾向, 也指出了剷弱苏联各族人民統一和深受帝国主义者欣賞的地方民族主义傾向的危險性。代表大会号召全党要

加强这两种傾向的斗争, 同时要加強注意切實贯彻列宁的民族政策, 根除民族不平等的因素, 广泛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文化。

“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附苏联最高苏維埃第四届第四次常会通过的修改及补充——“公报”, 1956年版, 共40頁 (中譯文載“苏联宪法草案报告”莫斯科中文版, 第47—79頁)。

“苏联用法律形式固定了苏联各民族的兄弟联盟, 規定了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 以及記載了社会主义的其他成就。

加里宁: “统一的战斗家庭 (1943年8月4日在同非俄罗斯民族战士中工作的前綫宣傳員座談会上的發言)”——加里宁: “論共产主义教育 (1925—1945年論文和演說集)”, 1951年莫斯科版, 第164—168頁 (中譯文載同上书, 青年出版社1950年版, 第175—180頁)。

加里宁指出了保証我国各民族完全平等的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成果, 駁斥了那种認為好象一称为国际主义者, 就不能再是俄罗斯人, 或是烏茲別克人, 或是哈薩克人的錯誤的意見。加里宁說: “要成为国际主义, 也就是要尊重每一个民族。……如果你能尊重所有一切民族, 那你才是国际主义者; 如果你——譬如說——是个俄罗斯人, 但你認為只有一切俄罗斯的东西才是好的, 那你就是个俄罗斯主义者, 不是国际主义者, 那你就只是个思想狹隘的人。” (參看第165頁)

“苏联共产党党章”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 ——1952年“真理报”出版, 共24頁 (中譯文載同书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共47頁)。

苏联共产党章程提出了“……用国际主义及与各国劳动人民建立兄弟般联系的精神来教育社会成員……”的任务, 作为现阶段主要任务之一。

3·列文娜, A·諾馬罗娃: “列宁在建立苏維埃共和国联盟中的偉大作用”——“真理报”, 1956年7月11日。

本文作者引用了一些保存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的档案文件, 叙述了列宁在制定各苏維埃共和国联合的重要原则中領導作用, 以及他作为苏維埃多民族国家真正締造者的实践活动。在論文中強調指出, 在今天以前, 在我們的一些著作中, 包括党史簡明教程在內, 都貶低了列宁在苏联形成中的 (下轉第19頁)

中亚古代游牧民族史的爭論問題

C·H·伯恩施坦

中亚游牧民的历史对于中亚现代社会主义民族祖先历史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中亚和哈萨克草原的古代居民——塞人——斯基泰人，匈奴人，哈查雷人，彼契涅吉人和波洛弗人，更不用提蒙古人，他們对中亚和古代罗斯的历史有着极大的影响。

1951年在伏龙芝和1954年在塔什干召开的科学會議明确了这些民族历史若干重要的問題，証明了托尔斯托夫的報告“游牧社会封建主义的起源”。一文的基本論点是正确的，他这一报告是1934年在列宁格勒召开的科学會議上宣讀的。

中亚各族历史的重建在研究工作面前提出了理論方面的重要問題：中亚地区第一次的社会分工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种分工对中亚各族的生活引起了怎样的变化？

游牧畜牧业是向游牧业过渡的不可避免的阶段。它开始了牧民和农民分离的阶段，它是第一次社会分工的开始，这一分工在中亚地区出現的日期是在塞人时代。

在中亚实际情况的条件下，第一次的社会分工不应该理解为牧民部落和其余的野蛮人群的分離，而应该理解为牧民和农民的分離，它一方面表现于塞人部落联盟的不再存在，一方面表现于中亚最早国家的形成。这一过程开始于塞人——斯基泰人的时代，而完全告終于匈奴統治中亚的时代。

牧民和农民的分離在中亚的情况下是和社會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同时的。事实上这就是第二次社会分工的开始：手工业和农业的分離。因而，在中亚地区，第一次社会分工和第二次社会分工是同时产生的。

这一理論問題对于中亚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从古就居住于該地的游牧民族的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最近的发现証明了安德罗諾沃人早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末就在中亚放牧了。这些发现是托尔斯托夫在花刺子模（塔在巴吉雅布文化），加莫布尔格和

戈尔布諾娃在費尔干納（瓦吉尔文化），馬松在穆尔加布河三角洲，吉利莫夫在塞拉夫森河下游，伯恩施坦在天山山脊（阿尔普流域）海拔达3,200公尺高地发现的。安德罗諾沃人不仅是草原和河湾的居民，而且也是不能耕种的山地上的居民。

安德罗諾沃人文化遗迹的广泛分布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測，即安德罗諾沃人就是“严寒北方的牧民”根据吠陀和阿韦斯大（avesta）的地理記載，他們就是雅利安人，即公元前二千年代侵略印度的雅利安人，大家都承認这一事实，包括錫克哈和班涅尔德希在内。

在塞人統治时期，即当馬开始被广泛使用的时候，雅利安人入侵的过程特别快。証明这一点的是塞人文化的傳播极为广泛。这种文化傳播的最东北境是帕茲雷克坟墓的文化，在西方几乎达到德聶伯河，在南方則止于鄂尔多斯与帕米尔，在西南方則傳播到小亚細亚与南高加索南部。安納烏时代的“蛮人入侵”可能就是安德罗諾沃人和塞人入侵的結果。

塞人之出現于帕米尔和他們在帕米尔西南的文化遺跡是不是反映了有关牧民移动的傳說观念？即这些牧民是来自遙远的、严寒的中亚即“終年积雪的山国”，那里是“中亚最大的河流——阿尔德韦苏拉河和兰卡河即阿姆河和錫尔河发源之地”？这种推測同时証明是有利于下面的主張的，即安德里諾諾沃人和塞人是来自北方和侵占了伊兰、阿富汗和北印度的雅利安人。

这样，可以看出印度歐罗巴部落——雅利安人侵入中亚的两个阶段：一、安德罗諾沃人的阶段——有考古学資料証明；二、塞人的阶段——由于广泛的使用馬，这一入侵过程繼續向前和极为活动。

最后，应提一提雅利安人侵入中亚的第三阶段，这是公元前140年月氏——吐火罗征服希腊一大夏的时期（主要是文献資料），这时候，显然来自錫尔河地区的北方部落，“通过子午綫”向南进军

的时候最后一次受到了打击。雅利安人侵略得以成功是受到了中亚奴隶占有制各国（大夏、花刺子模等国）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所决定的。

由于提到雅利安人入侵中亚的问题，就必须研究一下东伊朗部落起源的问题。很有可能，他们的祖先就是安德罗诺沃人和塞人。下列事实是利于证明这一点的。第一、安德罗诺沃部落是中亚操伊兰语的部落即塞人的祖先和北高加索与黑海沿岸一部分操伊兰语的部落的祖先。证明这一点的是阿巴耶夫、米列尔、克拉科夫的著作以及下列各人所进行的研究：在亚列克谢耶夫斯克古城研究的克里夫佐娃—克拉科娃，在小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研究的斐尔尼科夫，在中哈萨克斯坦研究的马尔古兰宁。第二、安德罗诺沃人和塞人的侵略和移动使人只得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安德罗诺沃人和塞人就是和东伊兰、阿富汗和北印度地方部落相混合的一些部落。第三、既然现代的科学是否认东伊兰人起源的“两个中心”论，那就应该承认安德罗诺沃人和塞人的地区就是伊兰部落起源的中心。

对于中亚各族历史的命运起着很大影响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公元前后开始侵入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的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或译亚细亚中部）部落——匈奴，他们的语言是突厥语，人种类型是蒙古人。由于和来自中央亚细亚的居民通婚，中亚各部落便变成操突厥语的和蒙古人种的部落了。这是“民族大迁徙”的开始。

半伊兰半突厥的部落嚧噠是在四五世纪间形成的。证明这一点的是谢米列契和费尔干纳的肯科尔型的遗迹（古尔米罗夫、詹盖尔、巴特肯—布茹莫等）和在花刺子模的库亚—雅兹和坎加提尔（公元4—5世纪）以及支耶提—阿萨的遗迹。我们以为嚧噠人“王国”的遗迹就是“Мырхон”，它们位于恰特卡尔山脉的斜坡。中国史籍“梁书”曾给这一类型的嚧噠人遗迹以评述。

在联系中亚细亚和中央亚细亚各部落与东欧各部落方面占重要位置的是萨尔马特人，他们沿着锡尔河广泛分布于伏尔加河沿岸到塔什干绿洲之间。萨尔马特人的文化和费尔干纳（恰达克）、塔什干绿洲（考纳奇）等的遗迹有相同之处。

中央亚细亚各部落的侵略对于中亚细亚各族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央亚细亚

各族的入侵加速了奴隶占有制的危机（这一制度的崩溃和公元4—5世纪匈奴一蹶不振的猛烈攻击有关）。

游牧民久已成为中亚定居农业中心的蛮人外国。从青铜时代始（公元2,000年）到月氏时代止（公元2世纪），我们注意到许多小块地方，在这里游牧民是绿洲定居农业居民经常的邻居。确证这一点的是在楚斯特（伏朗茨、斯普里谢夫斯基）、瓦鲁哈（利特文斯基）、布尔古柳克和撒马尔罕（捷列诸日金）、卡菲尔尼干（季亚戈诺夫）、费尔干纳（伯恩施坦）布哈拉绿洲（库尤—马扎尔和利万达克），（希什金和奥别耳钦科）。等地的发掘。因而不研究绿洲农业居民的历史就不能研究游牧民的历史（和相反的情况）。所以柯尔克兹的祖先应该看作和费尔干纳有关，哈萨克的祖先看作和锡尔河与花刺子模的农业绿洲有关，土尔克明人（达伊人、帕尔内人）的祖先应该看作和帕提亚有关，乌兹别克人的祖先应该看作和粟特有关。

应该着重指出，游牧民只是中亚奴隶占有制类型社会经济关系上的父系氏族制度的体现者。

在定居农业地带范围外的游牧民（查雅克沙尔特的塞人、天山和帕米尔的塞人）是和两种类型的定居中心相联系的：第一种类型是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定居中心（在锡尔河地区，特别是在中央哈萨克斯坦）；第二种类型是象楚河和培拉斯河流域定居的中心，这样的中心是粟特移民的移民区以及由于花刺子模扩张结果而形成的移民区。这些定居中心的作用在6—8世纪期间内特别加强了，这首先见之于谢米列契。同时游牧民重新出现于定居地带，由于农业地区的突厥化而加强，例如在费尔干纳出土的鲁尼文字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游牧民中间阶级分化的增长，使得他们最贫穷的一部分人过渡到定居生活，同时又在他们中间导致了宗法—封建关系的发展。

游牧民定居过程的开始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卢戈沃耶、克特门米—秋别）和公元1世纪（班固）与5世纪（范曄）的文献资料是属于公元前后（月氏，康居），即当中亚开始遭到来自东方的袭击的时候。

由于上述一切过程，在中亚地区开始形成了操突厥语的诸民族，他们是中亚现代操突厥语的居民



蘇聯各民族介紹

蘇 联 各 民 族

H·H·切博克沙罗夫教授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里居住有60多个民族。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这些民族处在社会經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有許多民族，特别是在西伯利亚，革命前尚生活在原始公社关系占优势的条件之下。在另一些民族中間，則已經形成了封建关系。例如在中亚細亚和高加索就是如此。此外，在俄国歐洲部分的各族中間，特別是在工业地区的俄罗斯人中間，在烏克蘭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地方，資本主义得到最迅速的发展。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將沙皇俄国的各族人民从阶級压迫和民族压迫之下解放了出来，并給他們开辟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現在，苏联的各族人民正在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的领导下建設着共产主义社会。

苏联的人口总数到1956年春已超过了兩亿。他們是由两个友好的阶級——工人和农民——以及与他們密切联系着的劳动知識分子所組成的。

沙俄时代，職工人数在全体人口中間所占的比例是17%。可是，在苏維埃时代，这个比例已差不多达到了60%。而且，在西伯利亚，中亚細亚，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以及苏联其他地区的許多民族中間，只是在苏維埃时代才开始形成自己的工人阶級和知識分子的。

苏联最大的民族是俄罗斯人（人口在1亿以上）。偉大的俄罗斯人民將国内的其他各族人民团結成了一个統一的友好大家庭，并在經济和文化的發展上給他們以有效的影响。与俄罗斯人在起源、語

言和文化上都非常相近的，有另外两个东斯拉夫民族——烏克蘭人（3,700万人）和白俄罗斯人（約900万人）。

俄罗斯人散居在整个苏联。不过，他們的基本群众集中居住在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內。烏克蘭人主要居住在烏克蘭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人主要居住在白俄罗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这三个东斯拉夫民族的基本經济，自远古以来就是农业，首先是田間农作业。資本主义时代，在俄罗斯和烏克蘭，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俄罗斯人和烏克蘭人的工人阶級队伍。在苏維埃时代，由于全国工业化的实现，俄罗斯，烏克蘭，以及白俄罗斯工人的数目都增加了許多倍。文化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文盲已完全扫除。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自1914年到1955年，大学生的人数差不多增加了13倍。在烏克蘭增加了10倍。在白俄罗斯，1914年时根本就没有大学生，到1955年时就已经有五万多人了。

在苏联，其他較大的成立了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还有烏茲別克人（約500万），哈薩克人（約300多万），立陶宛人（約250万），阿尔明尼亚人（約240万），阿捷尔拜疆人（約230万），格鲁吉亚人（約220万），拉脫維亚人（約200万），摩尔达维亚人（約180万）塔吉克人（約130万），爱沙尼亚人（約100多万），柯尔克兹人（約90万），土尔克明人（約80多万）。

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柯尔克茲人和土尔克明人居住在中亞細亞，他們都講突厥語。在中亞，還有塔吉克人，他們的語言屬於印歐語系的伊朗語族。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農業，基本上是廣泛運用灌溉系統的農田作業。在蘇維埃時代，這些共和國成為了蘇聯的主要產棉基地。在土尔克明人、哈薩克人和柯尔克茲人中間，在十月革命以前，主要經濟是游牧業。到蘇維埃時代，這些民族完全過渡到了定居生活，不過，養畜業在他們的經濟中仍然起着很大作用。中亞細亞的羊馬馳名于全蘇聯。中亞各共和國在工業方面也達到了很大的成就。與1913年比較，1955年的工業產量，在烏茲別克共和國增加了14倍，在哈薩克共和國增加了33倍，在塔吉克共和國增加了24倍，在土尔克明共和國增加了17倍，在柯尔克茲共和國增加了38倍。中亞各民族人民在俄文字母的基础上創制了自己的新文字。所有這些民族的科學、文學和藝術都達到了高度的繁榮。

在南高加索居住有：阿捷爾拜疆人、格魯吉亞人和阿爾明尼亞人。阿捷爾拜疆人講突厥語（與土尔克明人相近）。格魯吉亞人的語言則屬於伊比利亞—高加索語系（根據 A. C. 契科巴瓦院士的分類）。阿爾明尼亞人的語言乃是印歐語系的一種特殊語言。

現在，在南高加索各個蘇維埃共和國的經濟中，起主要作用的已是工業。1913—1955年期間，工業產量，在阿捷爾拜疆增加了12倍，在格魯吉亞增加了27倍，在阿爾明尼亞增加了41倍。阿捷爾拜疆的首都——巴庫，乃是蘇聯石油工業的中心。在南高加索各個共和國的農業中，以葡萄業、茶業、各種水菓業占有主要地位。在格魯吉亞黑海沿岸地區，以茶葉和各種柑類特別馳名。格魯吉亞和阿爾明尼亞的科學和文學，自古就運用自己的字母。阿捷爾拜疆則用的是以俄文字母為基礎的新文字。

摩爾達維亞人居住在蘇聯歐洲部分的西南地區，在德涅斯特河和普魯特河流域。他們在文化、經濟和生活特點上有許多地方都跟烏克蘭人相近，不過，他們的語言卻屬於印歐語系的羅曼語支。這種語言是在古拉丁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摩爾達維亞合併于蘇聯（1940年）以後，他們的經濟和文化便開始沿着社會主義道路空前的速度向前發展。例如，摩爾達維亞的工業產量，自1940年到

1955年，差不多增加了5倍。

屬於同一語系波羅的語支的，有東波羅的海沿岸兩個血親相近的民族——立陶宛人和拉脫維亞人。拉脫維亞人以北，在波羅的海里加灣和芬蘭灣岸邊，居住着愛沙尼亞人。他們在經濟和文化上與拉脫維亞人有許多共同的地方。但是，他們的語言卻屬於芬蘭烏戈爾語系。

在波羅的海沿岸各個蘇維埃共和國里，工業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無論是重工業和輕工業都以很快的速度發展着。其中以拉脫維亞的工業最為發達。在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農業中，田間作業是與高產的畜牧業（主要是養豬、養牛）結合在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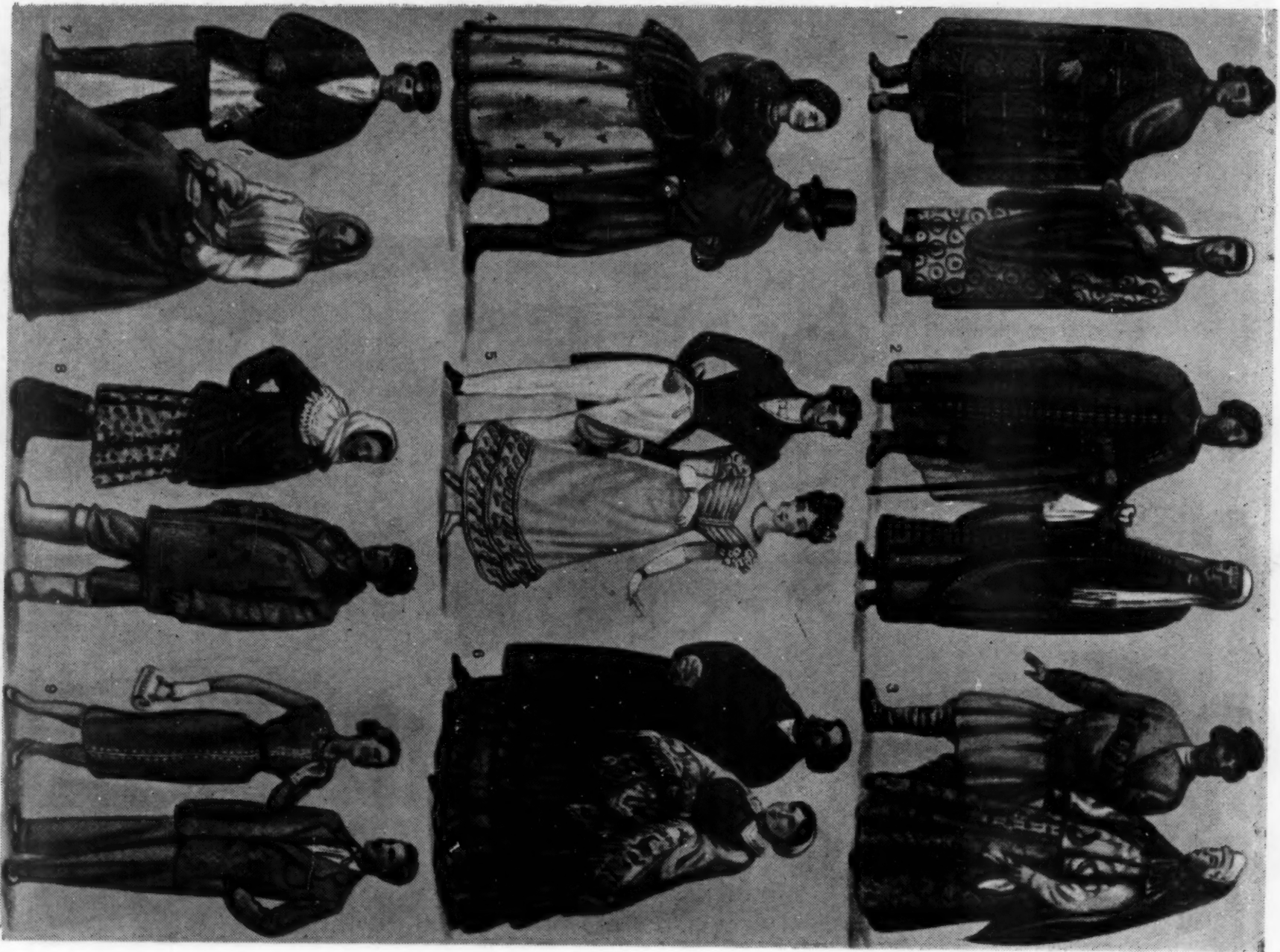
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居民的民族成分是非常複雜的。在共和國歐洲部分的北方和西伯利亞西部，居住着幾個屬於芬蘭烏戈爾語系的民族：卡里里人、洛巴爾人、維普斯人、莫爾多瓦人、馬里人、烏德摩爾梯人、科米人、漢提人和曼西人。

與這些民族相鄰的，是住在伏爾加河和卡馬河流域的突厥民族——楚瓦什人、塔塔爾人和巴什基里亞人。

在北高加索，居住着幾個操伊比利亞—高加索語系的人數眾多的民族——阿第蓋人、卡巴爾達人、英古什人、切琴人、阿瓦爾人、列茲根人、以及達格斯坦其他民族。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碰到操印歐語和突厥語的民族。講印歐語的有沃舍梯人，講突厥語的有卡拉琴人、巴卡爾人、庫梅克人和諾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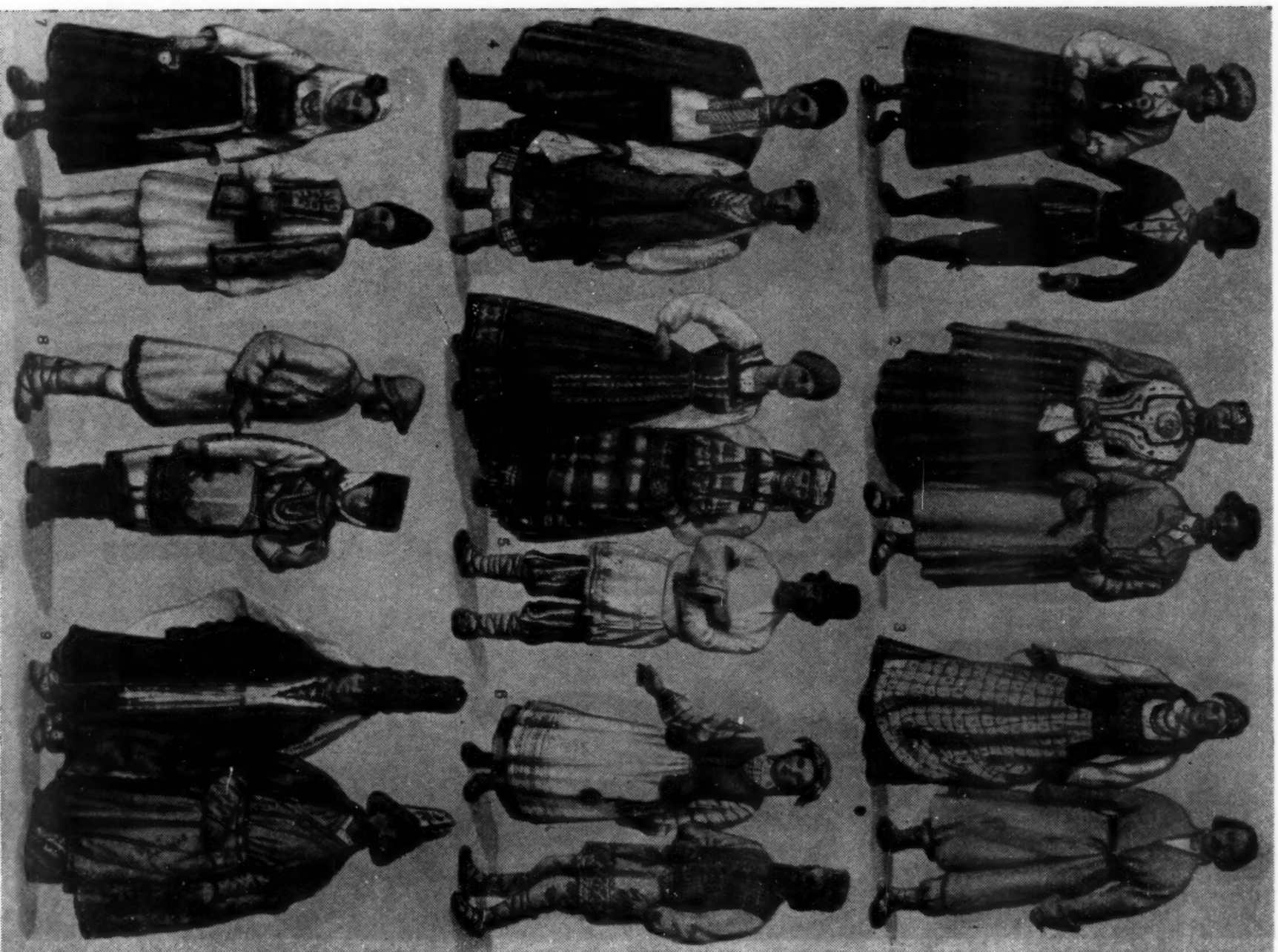
上面列舉的俄羅斯聯邦的各個民族，在十月革命以前，儘管在經濟發展上各不相同，但同樣都遭受着殘酷的民族壓迫。其中有些民族（洛巴爾人、漢提人、曼西人、以及一部分巴什基里亞人），過去都過着半游牧生活。只是到了蘇維埃政權時代，這些民族才消除了過去的落后狀況，並和蘇聯其他各民族人民一道，在經濟和文化的各個領域里都達到了很大的成就。現在，所有這些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文字（以俄文字母為基礎），有了自己的文化，有了自己的文學和藝術。

在西伯利亞和遠東，有許多民族在過去都是非常落后的。在烏拉爾與太平洋之間，在西西伯利亞的極北方，居住着薩摩耶各族：涅涅茨人、謝爾庫普人和恩加納桑人。他們的主要職業是養鹿業。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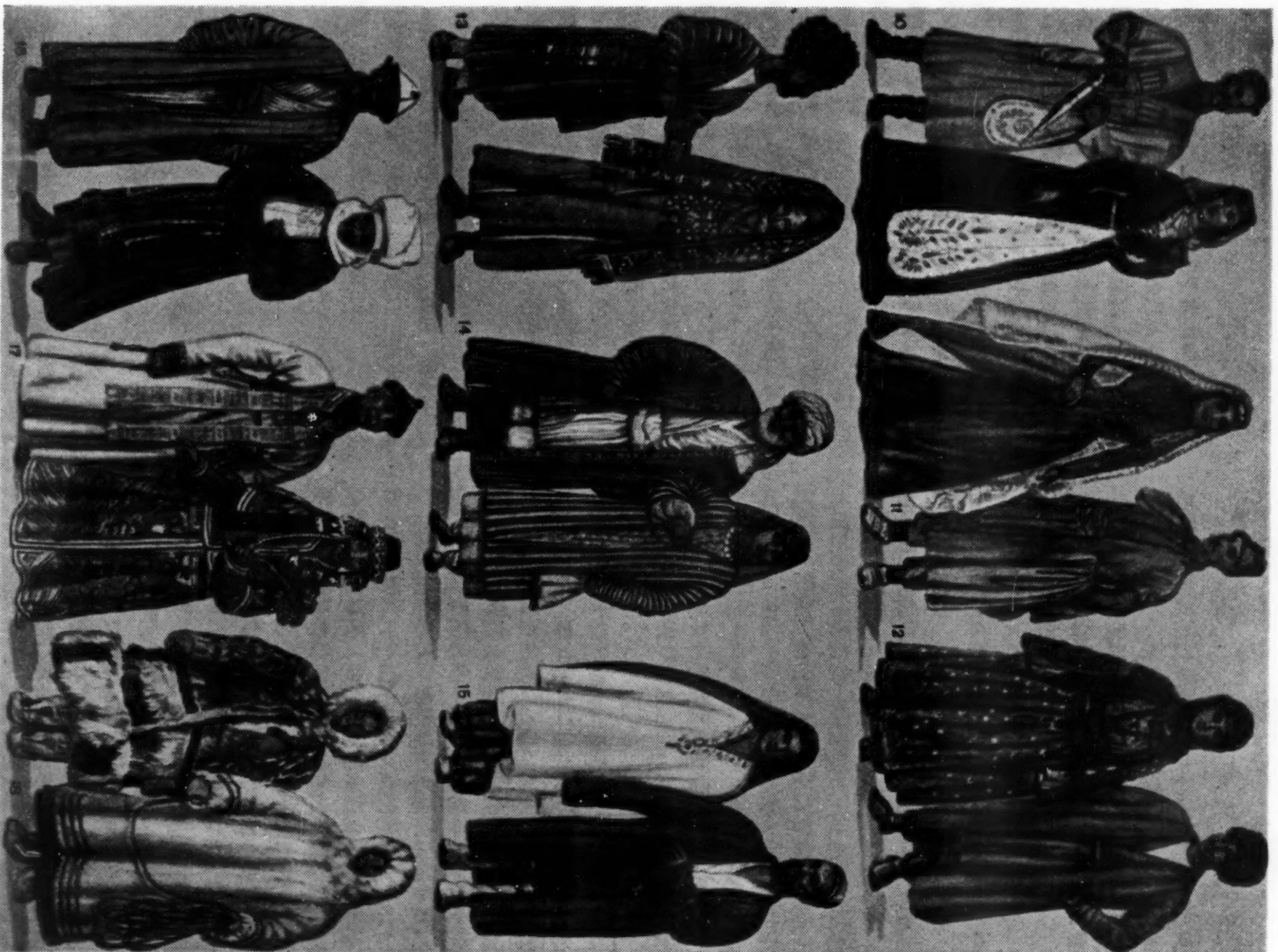
俄罗斯民族

1. 11—12世纪的王公贵族	2. 15世纪诺夫戈罗德富人	3. 18世纪俄罗斯中部的农民
4. 19世纪70年代尼日戈罗德省的农民	5. 19世纪前半期的贵族	6. 19世纪前半期的商人
7. 19世纪90年代的城市工人	8. 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民	9. 现代俄罗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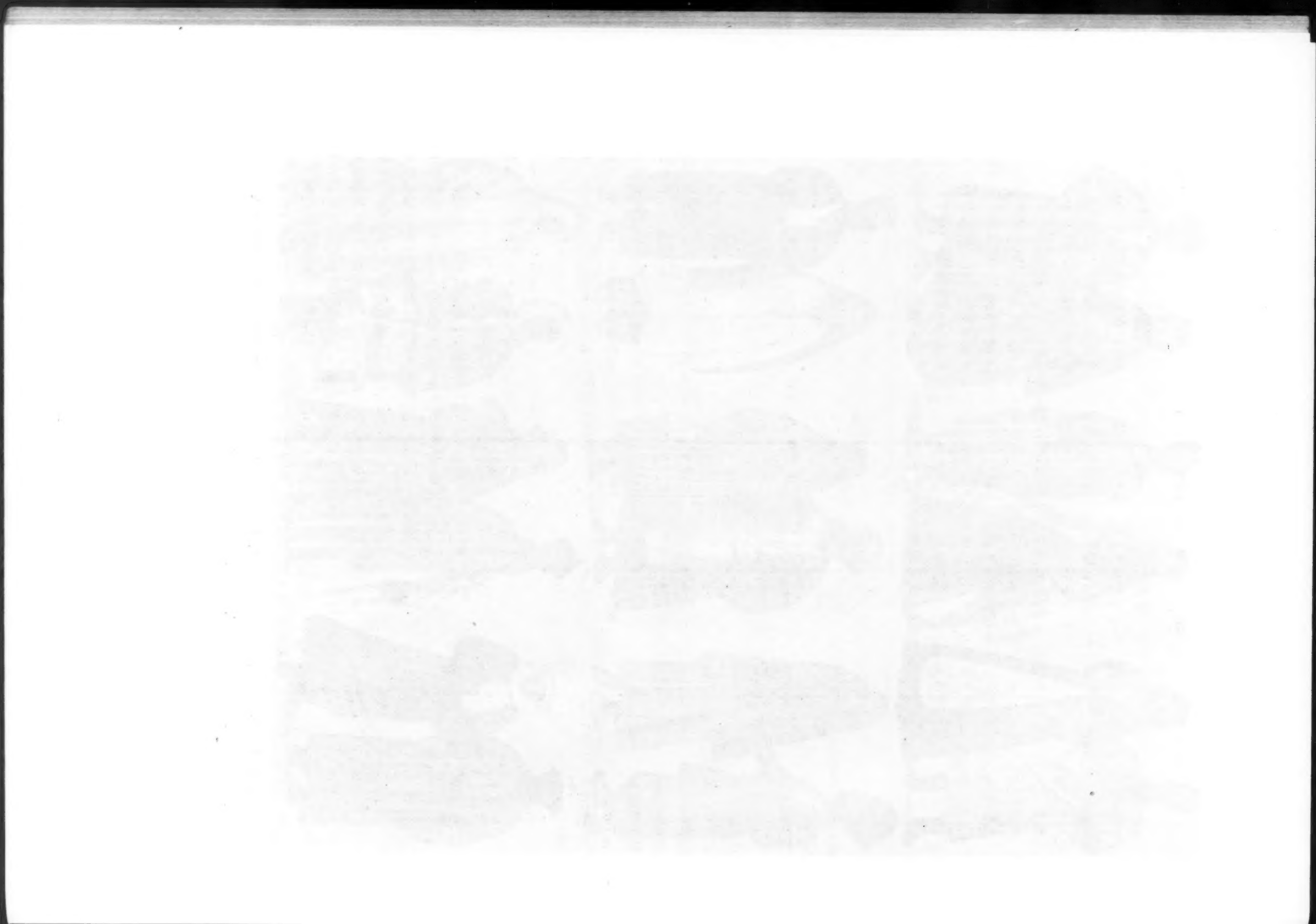
苏联各民族

1. 爱沙尼亚人
2. 拉脱维亚人
3. 立陶宛人
4. 乌克兰人
5. 俄罗斯人
6. 白俄罗斯人
7. 摩尔达维亚人
8. 马里人
9. 哈薩克人



苏联各民族

- 10. 格鲁吉亚人
- 11. 阿尔明尼亚人
- 12. 阿捷尔拜疆人
- 13. 土尔克明人
- 14. 乌兹别克人
- 15. 塔吉克人
- 16. 柯尔克兹人
- 17. 布里亚特人
- 18. 涅涅茨人



西伯利亞西南，我們可以見到幾個操突厥語的民族，其中最大的是阿爾泰人、哈卡斯人和圖瓦人。

此外，講突厥語的，還有雅庫特人。這是西伯利亞最大的一個民族。在他們的經濟中以畜牧業占有很大地位。特別是養馬業非常發達。雅庫特的馬可以忍受西伯利亞的嚴寒。畜牧業在另一個較大的民族布里亞特人中間，也非常發達。布里亞特人和雅庫特人一樣，在俄羅斯聯邦境內建立有自己的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布里亞特人講蒙古語。他們有豐富多彩的民間創作，有別具一格的艺术，有自己獨創的文學。

在東西伯利亞的廣大地域上，居住有屬於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支的民族。這些民族中間，人數最多的是埃文克人。他們是出色的獵人，在密林之中獵取貴重的毛皮獸。

除了通古斯語以及与之相近的滿洲語的民族而外，在東西伯利亞還居住有其他一些民族，如蘇聯極東北地區的楚克奇人和科里亞克人。他們在楚克奇海和白令海的岸邊，過着海上打獵的生活，獵取海象和其他海獸。在大陸內地，在苔原地帶，他們從事于養鹿業。

由於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的英明的民族政策，這些在過去非常落后的極北方民族，在經濟和文化的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越過了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李一夫譯)

* * *

俄羅斯人

俄羅斯人——是蘇聯境內最大的一個社會主義民族。據1939年人口調查，蘇聯的俄羅斯人共有1億零39萬1,500人。住在國外的俄羅斯人，人數比較不多：在美國有150萬人，在西歐約有50萬人。這主要是19世紀和20世紀初從俄國遷出的僑民的后代。俄羅斯人聚居的地域，占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大部，在歐洲從波羅的海伸展到烏拉爾，從北冰洋直抵高加索山麓；在亞洲，俄羅斯人居住于西伯利亞的廣大地域之上，直到薩哈林

島和千島群島（俄羅斯人現在約占西伯利亞居民的90%）。另外，有很大一部分俄羅斯人，也住在其他蘇維埃加盟共和國境內，特別是在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和拉脫維亞東部地區，以及卡列里芬蘭共和國和哈薩克斯坦。

“俄羅斯人”一詞，是基輔羅斯時代（9—12世紀）古羅斯人的自稱。除這個名稱而外，從17世紀起又開始用“大俄羅斯人”一詞。俄羅斯語以及与之相近的烏克蘭語和白俄羅斯語，同屬於印歐語系斯拉夫語族的東斯拉夫語支。這一語言又分為彼此相近的兩個方言群（方言區）：北部大俄羅斯方言群（а音化）和南部大俄羅斯方言群（о音化）。同時，也存在着一些過渡型的中部大俄羅斯方言，這些方言占據一條狹長的地帶，從普斯科夫湖經過加里寧城、莫斯科和奔薩一直延伸到伏爾加河中流。在南北大俄羅斯人之間，可以看到某些文化和生活上的差別。

在南北大俄羅斯人的成分中，還可以分出一些歷史上形成的地方性的民族群體。例如，白海和巴倫支海沿岸的波莫爾人，就是這樣的群體，他們是移居到這里來的諾夫戈羅德人的后代。在文化特點方面，北方俄羅斯人的一些群體都保存着敘事史詩這樣的民間創作形式。蘇聯歐洲部分的東部各省，有許多俄羅斯人——伯紹拉河下游的普斯托爾人和烏斯特齊爾馬人（在普斯托爾斯克區和烏斯特齊爾馬區），以及烏拉爾舊工場村落的居民等等，也都具有明顯的文化生活特點。從16—17世紀到19世紀60年代這一期間在西伯利亞定居下來的長住居民，也構成俄羅斯人的一個特殊的民族群體。直到蘇維埃政權建立之時還保存着顯著的經濟閉塞和生活特點的，還有所謂的克爾查克人——他們是17—18世紀逃進克爾熱涅茨和維特盧加森林的旧教徒的后代，後來他們逐漸分布于俄羅斯北部各地。在南方大俄羅斯人中間，不久以前還可以分出波列赫人、麥紹拉人和“官衣”；波列赫人是卡盧加—布良斯克—奧爾洛夫波列謝地區的居民，麥紹拉人是梁贊省麥紹拉森林邊區的居民，“官衣”則是一些小官吏的后代，這些小官吏是16—17世紀莫斯科公國當局為了保卫它的草原邊界而派遣到這里來的。哥薩克也是一個獨特的地方性的群體。哥薩克這個等級，是於15—17世紀在頓河流域和北高加索，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形成起來的。

俄罗斯人的起源与古代斯拉夫居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斯拉夫居民在公元前一千年代的中叶,占据着德聶伯河中游和上游,以及維斯拉河和奥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古代斯拉夫部落分布在东欧和中欧的过程中,分成了三支:东支、西支和南支。东斯拉夫人在公元一千年代的后半期居住于喀尔巴阡山、黑海、頓河和伏尔加河流域西部,拉多加湖沿岸、西德維納河和涅曼河上游等地域之上。其中住在德聶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間的一部分人,在4—6世紀被称之为安達人。东斯拉夫人是俄罗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直接祖先,他們的經濟基础,在当时是耕耘农业;但是,畜牧业以及許多家庭生产和手工业部門(熔鉄、金属加工、制陶、紡織等等),在經濟上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19—20世紀俄罗斯学者的研究作品,以及现代苏联历史学家(Б. Д. 格列科夫, В. А. 雷巴科夫, П. Н. 特列齐雅科夫等人)的著作都表明:古代俄罗斯人(或称洛斯拉人),乃是东斯拉夫諸部落的一支。这一支部落,起初大概是居住在罗斯河流域,后来成为了罗斯部落联盟的核心;这一部落联盟在6—8世紀就已占据着德聶伯河流域中部的广大地域,在这里,后来便出现一些大城市:基輔、俄罗斯彼列雅斯拉夫里、庫尔斯克、斯塔罗杜布、契尔尼戈夫。在资产阶段科学中,流行着一些关于俄罗斯人来自斯堪的納維亞以及他們和瓦里亚格人相等的“理論”,这些“理論”都是不正确的。在古斯拉夫土地上产生的罗斯部落联盟,它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逐渐影响到近亲的东斯拉夫部落以及相邻的各个东欧部落集团。各个东斯拉夫部落,随着阶段社会的发展,而結合成了古罗斯部族。大大地促进了东斯拉夫人这种民族結合的,是他們許多世紀与东欧草原上的彼契涅格人、波洛夫人等等游牧民所进行的共同斗争。9世紀时,在古罗斯部族的基础上形成了早期封建国家——基輔罗斯,它在經濟和文化上乃是中世紀歐洲的进步国家之一。

在9—12世紀期間,古罗斯部族的地域繼續扩大了,不断向北方和东方开拓新的土地,不断同化逐渐接受了自己語言和文化的非斯拉夫部落(主要是芬兰各部落)。到13世紀初,东斯拉夫居民已經在东欧居于优势地位。早在12—13世紀基輔罗斯时代就已发生的封建割据,到1237—40年蒙古薩剌侵

襲之后,由于立陶宛和波兰封建主强占了古罗斯部族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域,而特别加强了起来;这就造成了古罗斯各个地区的隔离,特别是促使了东北罗斯的分立,东北罗斯的中心起初是克利亚茲馬河上的烏拉基米尔城,而后便是莫斯科。在古罗斯部族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了三个晚期封建时代的亲属部族——俄罗斯部族、烏克蘭部族和白俄罗斯部族。而俄罗斯部族(或称大俄罗斯部族),則是在14—15世紀形成的,这是莫斯科兴起以及罗斯东北和北方各地居民逐渐团結到莫斯科周圍的时代。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和社会經濟迅速发展的同时,在16世紀后半期又有伏尔加河中游和下游、卡馬河流域和烏拉尔地区的許多新的广大地域并入,而后又有西西伯利亚許多地区并入。这就大大地促进了俄罗斯人民族地域的不断扩大以及他們对俄罗斯境内其他各族經濟文化影响的加强。同时,俄罗斯人自己在經濟和文化上也从俄罗斯国家其他各族人民那里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在17世紀,随着全国各地經濟联系的增长,随着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場集中为一个全俄市場,于是便为大俄罗斯部族形成成为俄罗斯资产阶級民族創造了历史前提。俄罗斯人的民族結合过程,是在封建社会內資本主义因素最初极其緩慢发展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一过程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中叶。与民族結合过程的同时,俄罗斯人繼續分布于各地,17—19世紀期間在西伯利亚开拓了广大的地域,从烏拉尔直抵太平洋岸边,在高加索(主要是北高加索)、哈薩克斯坦和中亚細亞也开拓了广大的疆域。同时,随着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俄国資本主义特別迅速的发展,而形成了两个新的社会阶級——资产阶級和无产阶級,开始了农民的社会分化,加强了农村与城市的联系。南北大俄罗斯人过去在封建时代所具有的民族区分也开始消失了,而且有些区分則是更早的时期从南方(主要是維亞特)东斯拉夫部落和北方(克里維奇—諾夫戈罗德)东斯拉夫部落那里保留下来的。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俄罗斯工人阶級人数的不断增长,而在国内許多旧的和新的工业中心:在烏拉尔,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在中世紀的城市和工人村,逐渐形成了俄罗斯工人的文化和生活特点。这一时期,在俄罗斯文化中非常明显地表現出了列宁所指明的每个民族两种文化——地主资产阶級的文化 and 民主的、真正人民的文化——之間

的根本区别。先进的民主的俄罗斯文化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而获得了真正的世界意义。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罗斯人的民族发展中揭开了一个新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俄罗斯资产阶级民族被改造成了一种新型的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结束了资本主义时期两种文化并存的情况，而形成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俄罗斯文化。在苏维埃政权时代，随着北方和东方许多新的工业中心的建设，随着北极地带的开拓，随着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许多沙漠和半沙漠地区的开发，随着铁路的建设和运河的开凿，这些地区的俄罗斯居民于是也大大地增多起来。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语言在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全世界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不断地增长起来。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俄罗斯人的社会阶级，也跟苏联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只剩下了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俄罗斯工人阶级，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集体农民也根本不同于革命以前的农民，完全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人数众多的与工人阶级和农民紧密联系着的劳动知识分子，乃是苏维埃社会的一支强大的文化力量。随着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部门的人数比过去大大地增多了。除了旧有的和改建的工业中心（乌拉尔，顿巴斯，伊万诺沃，莫斯科，列宁格勒等等）以外，又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了许多巨大的工业区（基洛夫斯克，马格尼托戈尔斯克，乌赫塔，沃尔库塔，库兹巴斯，阿穆尔共青城等等）。过去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非黑土地带发展起来的小手工业生产，也逐渐改变成了巨大的社会主义生产。在基姆雷（靴鞋生产区），在戈尔斯克（儿童玩具制造区），格热里（瓷器和搪瓷器生产区），也都建立了巨大的工业企业；土拉省，高尔基省的巴甫洛夫区以及其他等地，都成了手工金属加工工业的中心。

工人阶级的绝对人数，以及他们在国内居民中的比重，都在不断增长。不过，占居民多数的还是农民，他们的主要经济是农业；俄罗斯人从事农业开始于远古，考古材料以及古代文献都证实了这一点。从16世纪以来，主要的是实行三区轮种制，同

时，在边区直到19世纪还保存着比较原始的耕作方法：在北方保存着刀耕火种，在东南方和西伯利亚则保存着休耕制。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多区轮种制得到了发展。主要的耕作工具是：双尖木犁和铁犁；使用木耙，木耙上常常装有铁齿；收割庄稼的工具，在北方使用镰刀，在南方多半使用长柄弯刀（带有耙齿）。在北方和中央各省设有谷物干燥室，在西北方则设有谷仓。打谷用镰枷，簸扬用木筛，磨粉用风磨和水磨。在资本主义时代，一部分地主和富农有了新技术的装备；而广大的中农和贫农没有机器，有时连耕畜也没有。除了五谷（到处都有裸麦，燕麦；北方种大麦，南方种小麦，黍子）之外，还种植亚麻（多半在非黑土地带）、大麻（在中央各省黑土地带），以及蔬菜瓜果之类（从18世纪开始栽种马铃薯）。早在很久以前，畜牧业就成了俄罗斯人的重要经济部门。创造了乳畜和牛马的优良品种。俄罗斯人的农业，对四个许多民族农业的发展给予了良好的影响。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分散的小农户联合成了巨大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生产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它结合了农业经济的各个部门，它建立在先进的机器技术装备之上。苏维埃国家通过机器拖拉机站，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其他最新的机器装备了农业。采取了先进的农业技术，过去的三区轮种制又为多区轮种制所代替。发展起来了高额收入的技术作物和其他作物，扩大了蔬菜业和菓木业，在南方还发展了风类种植业。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建立起来了巨大的养牛场、养羊场（主要是在南方各省）、养猪场和养鸡场。养马业在南方特别发达。蜜蜂差不多到处都有发展，尤其是在北高加索，阿尔泰，乌拉尔一带。狩猎业和捕鱼业，大多数地区都只是一种辅助经济部门。狩猎业主要只是在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和西伯利亚一带具有重大意义，捕鱼业只是在湖河附近具有重大意义。在苏维埃时代，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部门——毛皮兽驯养业。创立了捕鱼工业和猎兽工业。机动船队的建立和深海捕鱼的推行，对于集体渔场的经济具有重大的意义。木材业在北方和西伯利亚很发达。伐木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已大大地改善了。工人和农民之间在文化和生活上的某些差别，在社会主义时代还继续存在，在农村比之城市更多地保存着文化的某些传统特点。

在工業部門工作的俄羅斯人，都集中住在各個城市以及靠近工廠和礦山的工人村。

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里，在莫斯科以及其他古老的俄羅斯城市，實行了社會主義改建工作，於是，過去中心區和工人區之間明顯的區別也就消失了。陸續出現了許多新的社會主義城市（例如：烏拉爾的別列茲尼基，莫斯科省的斯大林戈爾斯克，列寧格勒省的博克西托戈爾斯克……等等），城裏有着寬廣而筆直的街道，到處都是樹蔭；設有許多文化宮、文化休息公園、舒適的住宅和公共建築物。新建的工人村也與舊有的大大不同。新村是按一定設計來建造的：在新村的中央通常都有蘇維埃、學校、圖書館、俱樂部、商店等等的公共建築物。家庭與農業有着緊密聯系的工人，常常都住在鄉下（例如：莫斯科近郊礦區的採礦工人、某些地區的紡織工人等等）。

農村的村莊，部分地保存着歷史的痕跡。一些古老的村莊類型（人家很少的小村落），在北方森林地帶和西伯利亞的某些地方還可以見到。20世紀初，存在有以下幾種村莊形式：有教堂的村莊，無教堂的村莊，獨戶田莊、小型村莊、哥薩克的大村鎮。現在，各種類型村莊之間的顯著區別已在消失。在北方主要是數十戶人家的小村，多半都分布在沿河、沿海的地方；在中部地區主要是中型村莊，多半分布在分水嶺的地方；在南方各省主要是大型村莊（達1,000多戶人家），分布在盆地和山谷一帶。18—19世紀，在各種村莊里已逐漸形成了街道。集體農莊的新村顯然不同於過去的鄉村；各種經濟建築物（養畜場、倉庫、有時還有發電站等），以及集體農莊的社會文化中心，在新村里占據着重要的地位；在這裏設有管理處、俱樂部、圖書館、廣播站等等。

現代的城市住宅（職工住宅），都是多層的石基建築物。在工人區，多半都是兩層的多間樓房，或者是一層的帶有幾個房間的小屋，屋前有小花園，有時還有小塊園地、庭院和經濟建築物（例如，在烏拉爾）。

俄羅斯集體農民的住宅，保持着民間建築的很多特點。大多是木架結構的住宅，不過也有磚房。南方在建築物上廣泛地運用了石頭、粘土、土磚等材料。在北方各省以及中部多數省份，大多建造一種帶地下室的高木屋，屋後或屋側有帶頂的小

院。在南方，木屋不帶地下室，院子也不帶頂。院子裏建有畜圈和其他經濟建築物。糧倉和儲藏室往往都建在外面，浴室建築在水池附近或園地上。房內取暖用俄羅斯式的爐子，有時用荷蘭式的爐子；常常另有做飯用的爐灶。傳統的三間式的設計——住屋、門廳、儲藏室——差不多已經沒有了。住人的木屋，常常是由五壁構成，屋後接蓋走廊和儲藏室。房屋裏面通常分做幾個房間：廚房、上房、臥房和其他等等。無綫電和電氣已牢固地成為農村生活的一部分。

19世紀中葉，農村婦女的典型服裝，是長袖的麻布衬衣，帶有坎肩，衬衣外面套着帶褶的裙子（在南方）或無袖長衫（主要是在北方）。頭上戴的是一種有綠色條紋及寶石的頭飾（有時呈角狀）。有些地方則戴頭巾。男子的服裝：是麻布的斜領衬衣、窄腿長褲、腰帶、毡帽或毛帽。上衣（男的和女的）：都是用家織毛呢做的厚呢外衣、長襟外衣、羊皮的短外套和皮袄。穿的鞋子要看經濟條件：有穿皮鞋、皮靴的，也有穿樹皮鞋的。過去在服裝上反映着年齡的、家庭的、以及階級的明顯區分。階級的區分特別表現在衣料的質量上、飾物的數量和價值上。在城市里，於19世紀中葉，衣服已開始用工廠出的布匹來縫制了。從19世紀後半期，一些城市服裝的新式樣得到了日益廣泛的傳播，對農民的服裝有很大影響。工人的服裝：是印花布的斜領衬衣、夾克、長褲、皮靴、無緣帽、腰部帶褶的外衣。工人中心的婦女服裝：是裙子、短外衣，有時還有圍裙，這些都是用印花布或其他工廠布匹縫制的。

現在，工人穿的，全都是城市服裝了。在集體農民中間，還比較多地保存着服裝的地方特點和民族特點。

在俄羅斯人的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之中，直到19世紀還保存着父權制生活的特點。有些地方，在19世紀後半期，在農民中間還可以看到有大家庭存在，雖然這一時期大家庭分化為小家庭的过程已進行得很快了。農村公社，在19世紀中葉，仍然是農民社會生活的基础。資本主義在农村的發展，引起了公社的完全解体。在非土地的生产中（手工业、零工），劳动組合仍然是傳統的劳动組織形式；但是，在農民改革時代，劳动組合內也滲入了資本主義关系。雖然農民中有很大的階級分化，但在十月

革命前夕，农民的基本群众仍是中农。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阶级不平等和剥削已经消失。现代家庭根本不同于旧式家庭。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她们能够平等地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因而也就决定了她们在家庭中作为平等一员的地位。

俄罗斯民族文化，获得了世界意义。俄罗斯文学、音乐、绘画和戏剧，影响到了俄国各族和国外各族人民的文学和艺术。俄罗斯学者对于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苏维埃时代，国内进行了真正的文化革命。实现了人人识字，广泛地分布了中等和高等学校以及医疗机关。在城市里和乡村里，电影、无线电、戏剧，业余艺术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报纸、杂志和图书极为普遍。

俄罗斯人的民间口头创作非常丰富；它给予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给予俄国古典作家：果戈理、莱蒙托夫、普希金、谢德林等人的创作以巨大影响。俄罗斯人民创造了史诗：歌颂基辅罗斯和诺夫戈罗德罗斯时代英雄的壮士歌、叙事诗、神话、童话故事，以及为众多的谚语和成语。工人和农民的歌曲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有日常的、轮唱的，伴舞的，抒情的，革命的等等歌曲。有一种独特的短歌（对句歌曲），产生于19世纪的农村。俄罗斯人的民间音乐，在音调、旋律和节奏上都是十分细腻的；混声合唱很是发达。俄罗斯人的民间音乐创作，在俄国伟大作曲家：波罗金、格林卡、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最为流行的乐器，有手风琴，以及三絃琴、小提琴和吹奏乐器（芦笛、风笛、角笛、喇叭）。一些古老的絃乐器（竖琴、老三絃琴），没有保存下来。“俄罗斯舞”、“民间舞”等等，则是有代表性的舞蹈。民间的造型艺术达到了很高水平。俄罗斯人的“巧手”，很早以前就善于用雕刻和绘画来装饰日常用具、劳动工具和建筑物，在陶器和织物上创造了各种图案花样。古老的艺术手工业，在苏维埃时代得到了新的发展。例如，木头彫象（莫斯科省）、骨刻（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托博尔斯克省、莫斯科省）、木板画（高尔基省）、铁皮画（莫斯科近郊）、漆器（霍卢依、姆斯捷拉、帕列赫、费多斯基诺）、陶瓷艺术品，以及精细艺术——镶嵌细工、金银首饰等等（沃洛格达州、科斯特罗马省），搪瓷艺术品，石雕工艺（烏拉尔）……等等。艺术

織品：刺綉、花边、补花、毛毯等等的制造，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俄罗斯的傳統裝飾，包括有多种多样的几何形图案，以及树木花草、鳥兽和人物的形象。现代的应用艺术，一方面发展了民间工艺的优良傳統，一方面充实了社会主义内容，它表现出了苏维埃时代許多新的巨大的主题：俄罗斯人民革命斗争的英雄，各族人民的友谊，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等等。

过去，俄罗斯人的正統宗教，是公元10世紀从拜占廷傳过来的希腊正教。一部分居民，特别是在北方，是旧教徒（他們是在17世紀与正統教会脱离关系的）；在南方各省，有些教派（福音教、新教，莫罗坎教等等）比較盛行。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教会已与国家分立，学校已与教会分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在俄罗斯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已随着文化的发展而逐漸縮小。

在俄罗斯人民生活中，已牢固地增加了許多新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11月7日十月革命节”、“三八国际妇女节”，以及新年等等。在集体农庄中，除此之外，还有丰收节，人們庆祝丰收以示一年劳动的結束。

（一夫譯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7卷）

* * *

白俄罗斯人

白俄罗斯人——是与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同属于斯拉夫族东支或俄罗斯族分支的一个民族，是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居民。在苏联，白俄罗斯人总共有870万人（1989年年底的統計）。构成白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有东斯拉夫族（古俄罗斯族）的各个部落：如德列哥維奇人（住在普里皮亚特河和西德維納河之間），克里維奇人西南支，其中包括波洛昌人和斯摩棱斯克的克里維奇人（分居在西德維河中上游和德聶伯尔河上游），拉吉米奇人（索日河流域）和一部分邻近的德列夫利安人、塞維里安人和沃雷尼安人。所有这些部落和其他东斯拉夫部落一起在9—13世紀并入了基輔罗斯公国。在他們混合的过程中，部分地被东斯拉夫人同化了的列托—立陶宛的民族成分特別如亚特

維吉人加入了俄羅斯部族。白俄羅斯民族形成的過程是在加強與上述部落的經濟與文化聯繫的基礎上發生的，那些部落的土地即羅斯西部地區，在13—14世紀曾經被立陶宛大公強占，後來又被貴族波蘭侵吞。從白俄羅斯居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環境中產生的這個過程在16世紀大體上已經完成。就在這個時候白俄羅斯的語言形成了。在封建制度解體和資本主義關係形成的年代里，從18世紀末便與俄羅斯合併了的白俄羅斯人形成為民族。當時沙皇制度對於白俄羅斯人的政策是：否認白俄羅斯人作為一個單獨部族的存在；禁止白俄羅斯人用本民族的語言進行教學和出版書籍。只有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才把白俄羅斯人從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現在白俄羅斯人已經成為自由的社會主義民族，它是在蘇聯消滅了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勝利後形成的。在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代里，白俄羅斯建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白俄羅斯的工人階級和民族知識分子隊伍顯著壯大起來。

聯合到集體農莊內的農民的主要工作是農業和畜牧業。園藝業和蔬菜種植業也很發達。養蜂和捕魚是他們副業生產。從手工業生產中發展出來了木工業、陶器業和織布業。

很早以前，村莊便是農村居民集居地的主要形式，現在站著村莊的一面或兩面通常都建起了房屋，形成了街道。民屋是白俄羅斯農民住宅的主要式樣，這是一種用松木柱架成的木製建築物。最普通的民房是一幢三間，其中有帶取暖設備的臥室，不帶取暖設備的門廳和儲藏室。顯著民族特點多表現在房屋的內部結構和陳設上，占了進門處全部暗角落的俄羅斯式的爐子，起着主要的作用。屋內其他一切傢具都要依爐子的地位來安置。農民庭院的普通形式是圓形的（四周建有經濟用房）和長條形的（一行或兩行）。集體農莊制度的建立，蘇維埃農民的富裕生活和文化需要的提高完全改變了白俄羅斯農村的面貌。新的，集體農莊的鄉村現在有了更合理的計劃，其中有中央廣場和特別劃出的集體農莊生產的場地。建造了新的、公共的和文化生活的建築物：有集體農莊的管理處、學校、俱樂部等等。民房建築得很寬敞，其中有兩、三個房間。一批一批的集體農莊新村在曾被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夷為平地的原村鎮的旧址上興建了起來。到1948年，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千多個集

體農莊都已經電氣化。

早在基輔羅斯公國時代，白俄羅斯境內就出現許多城市。其中最大的城市有：明斯克、維帖布斯克、戈麥爾、莫吉廖夫、博布魯依斯克、格罗德諾、奧爾沙、博里索夫、布列斯特、波洛茨克、平斯克等。在革命前的白俄羅斯，最普通的居民聚居地叫做鎮店，即手工業和商業的集中地。很多鎮店後來都變成了城市或城市居民點，成為白俄羅斯各地區的行政、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大部分白俄羅斯農民，穿的几乎都是家織粗布衣服。現在，在各個地方，民族服裝絕大部分已由機制布作的城市服裝所代替。白俄羅斯民族服裝的主要特點，在農婦的服裝中保留了下來。農婦服裝主要有：墊肩的短衫，上面有很多綉上的或織上的圖案花飾；各種各樣家織條布或方格布的裙子，裙子外面還系上一個帶圖案花飾的圍裙和一條彩色腰帶；此外還有各種式樣的花背心。男人的古式服裝是：褲子上面穿一件帶翻領的白色襯衫，襯衫的襟下，胸前和領上都有各種圖案花飾。白俄羅斯人的外衣，都是白呢子作的，男女都是同一樣式。過去婦女的頭飾是這樣：少女主要是在額前系一條花帶，出嫁的女子則戴一頂“暫時縫合”的帽子（用很長的白布條纏在帽子四周）。從20世紀開始，這種頭飾便由普通的頭巾所代替。

白俄羅斯人的民間創作豐富多彩，充滿了歌曲、音樂、口頭創作和史詩，這些東西主要取材於故事、神話、傳說和諺語。在蘇維埃政權年代，民間創造特別繁榮起來。在民間創作里貫穿了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反映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生活以及蘇維埃軍隊和游擊隊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勝利和英雄氣概。民間造型藝術，如藝術紡織、綉、木刻、鑲嵌細工、麥桿編織、制陶廣泛地發展起來。民間圖案主要採用綫條幾何形。

（趙俊智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4卷）

* * *

哈薩克人

哈薩克人（自稱卡薩克，卡查赫）——是社會

主義民族，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基本居民。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他們被稱為

“卡薩克人”、“卡薩克”汗國，再晚一歲，又被稱為“柯爾克茲—哈依薩克”、“柯爾克茲—哈薩克”和“柯爾克茲”，他們錯誤地把自己稱為柯爾克茲人（“基爾吉茲”）。操屬於西北突厥語族的哈薩克語。哈薩克人口總數約計三百五十萬，在蘇聯境內有310萬（1939年統計）。哈薩克人主要居住在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有的住在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卡拉卡爾帕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有少數人住在柯爾克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土爾克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西伯利亞西部伏爾加河中下游一帶。在蘇聯境外，哈薩克人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哈薩克部族主要是由許多操突厥語和蒙古語的部落組成，這些部落早在15—16世紀就已基本上聯合起來。從18世紀中叶到19世紀下半期，哈薩克自願地合併于俄羅斯。雖然，沙皇制度仍企圖用一切辦法來保持哈薩克的宗法—封建關係的統治地位以及經濟和文化上的落後狀態；但是，這一合併，畢竟在哈薩克的經濟和文化生活中起了巨大的良好作用。它促進了封建閉塞狀態的消失，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促進了向定居和農業的過渡，加強了俄羅斯先進文化的影響，並鞏固了哈薩克民族和俄羅斯民族之間的友誼。

具備了資產階級民族一切特征的哈薩克民族形成的過程，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的。只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哈薩克人才結成為社會主義民族。由於實現了共產黨的民族政策，蘇維埃哈薩克斯坦從俄羅斯的一個落後邊區，變成為強大的工業和農業共和國。哈薩克斯坦的經濟基礎是發達的工業和巨大的機械化的社會主義農業（谷物、小麥、棉花、甜菜、蔬菜）和畜牧業（綿羊、山羊、牛、駱駝）。鄉村、阿烏爾和城市的面貌變樣了，一批一批設備完善的集體農莊新村，在農業地區建立起來，出現了新的社會主義城市。在國民經濟中和居民生活中電力和無線電被廣泛地利用著。目前，在大量展開建築新型住宅（直角木架上塗以粘土或釘以木板、雙斜面形屋頂）的條件下，在游動的牧畜區和田野工作隊里，仍然使用可隨着居住地轉移的帳棚。室內陳設富有民族特色：有滿足

圖案花飾的毛毯，四面懸掛着壁毯等。

哈薩克人的民族服裝，同城市樣式的服裝結合穿用。上了歲數的女人，穿長而寬的襯衫、肥棉褲和毛織或棉布作的長袍，冬天穿音皮大衣或長襟皮袄。頭上帶着狐皮暖帽、大耳帽；夏天戴土耳其圓帽。大多數男人穿着城市式樣的服裝：如馬褲和軍便服以及毛布、呢料和棉絨服裝等。在婦女中間，特別是老年人，穿民族服裝的比較多，她們穿硬領的白色長布拉吉和寬棉褲。頭上圍着頭巾或是面部開口的白色帽子。年青婦女，穿着城市式樣的布拉吉、錦絲絨坎肩、城市型毛布服裝。

在剝削階級最後消滅以前，哈薩克人的社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還保留了宗法—封建關係、民族制殘余，其中包括充族外婚制。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為產生新的由工人集體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組成的蘇維埃哈薩克斯坦社會創立了條件。城市和鄉村生活之間的差別正在消失。在家庭關係上——家長制的習俗已經絕迹（如聘禮、搶婚、童養媳）。

過去，婦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已經廢除，新的蘇維埃的家庭，是建立在男女在經濟和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的。婦女被吸引参加了生产劳动，成为国家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在他們中間出現了許多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在哈薩克人中，宗教（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伊斯蘭教以前的宗教儀式（靈魂崇拜和薩滿教的殘余）的影響，也在消失。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前，哈薩克人中識字的只有2%，現在，文盲已被消滅了。在幾千所學校里，兒童都用本族語言學習。在蘇維埃政權年代里，中建立的高等學校里，培養着各個生產部門和科技技術部門的專業幹部。蘇維埃哈薩克斯坦新型的知識分子成長起來了。建立了以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為領導的科學研究機關網。在豐富多采的民間創作、音樂和實用美術中，明顯地表明了哈薩克民族的創作才幹。民族文學、職業性戲劇藝術、音樂和電影事業，也正在日益千里的發展著。

（弓也長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19卷）

* * *

格魯吉亞人

格魯吉亞人(自稱卡特維利人,伊維里人),是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主要居民,是一個在蘇維埃條件下形成為社會主義民族的,具有悠久文化的民族。格魯吉亞人屬於赫特—伊比利亞民族群體,特別是屬於這個群體的伊比利亞高加索分支。他們操格魯吉亞語言。從人類學方面看來,格魯吉亞人屬於地中海和前亞細亞的歐羅巴人種。在格魯吉亞共和國內,格魯吉亞人共有2,248,566人(1939年統計)。在阿捷爾拜疆共和國西部的三個區內,以及在土耳其和伊朗境內,也還有少數的格魯吉亞人。土耳其的格魯吉亞人(50多萬),居住在格魯吉亞的固有的土地上,這些地方原是16—17世紀土耳其從落後的格魯吉亞奪去的。這些地方在庫拉河,阿拉克斯河,叶甫拉特河上游和丘魯哈河,克澤爾伊爾馬克河流域。土耳其西部地區也住有格魯吉亞人,他們是在19世紀被土耳其政府遷到這裡的。當地的格魯吉亞居民(塔奧依人,麥斯赫人,克拉札人,沙弗采特人,拉茲人或羌納人),雖然在暴力政治統治下被迫接受了伊斯蘭教,但他們仍然保留了格魯吉亞的文化、語言和習慣。在伊朗的格魯吉亞人,居住在吉梁,馬薩德朗和伊朗阿捷爾拜疆等地的村莊中,以及住在伊朗南部的伊斯法罕城。這部分人是17世紀初被波斯阿巴斯王從格魯吉亞東部強迫遷到這裡的格魯吉亞人的後裔。在宗教方面,他們屬於伊斯蘭教十葉派,但是他們保留了格魯吉亞的語言、文字和其他文化因素。

在公元4世紀上半期,基督教在格魯吉亞是作為國教來信奉的。在過去,大多數格魯吉亞人信奉正教,只有少數人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此外,還有不大一部分格魯吉亞人信奉天主教。現在,蘇聯格魯吉亞人的宗教信仰正在逐漸消失。

早在公元前1000年,格魯吉亞部落就開拓了南高加索和前亞細亞一部分的土地。格魯吉亞部族形成的過程,也是格魯吉亞國家形成的過程。當時,各個格魯吉亞人部落聯合成了幾個大的民族聯合,其中有一個部落作為這些民族聯合的領導。在公元前1000年初期和中期,在這裡就產生了奴隸制的和晚期封建制的國家,這些國家由於缺乏內部經濟聯

系而沒有巩固下去(見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历史概述)。格魯吉亞語言之形成為全民族語言和共同文獻語言(公元6—12世紀),促進了格魯吉亞民族統一的覺悟的增長。在公元6世紀最後形成的格魯吉亞封建國家,到11—13世紀成長為一個成熟的封建帝國。在社會結構和家庭關係方面,封建制度占統治地位。可是在各個山區,公社制度却長久地保留下來。

格魯吉亞資產階級民族形成的過程,是在19世紀下半期完成的,當時在俄國資本主義影響下而引起的資本關係的發展,把格魯吉亞聯結成了一個統一的經濟整體,消滅了封建制度的殘余。格魯吉亞民族是由數個有親屬關係的部落組成的。其中主要有:卡特人,拉茲人,斯瓦納人。一直保留到今天的某些地域上的民族差別的痕跡(普沙瓦人,赫夫蘇爾人,穆其烏爾人,摩赫夫人,伊羅列琴人,古里人),正在逐漸消失。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在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形成並發展起來了格魯吉亞社會主義民族,這樣的民族是由幾個相互友好的階層,即工人、集體農民和由他們中間產生的知識分子階層組成的。

由於格魯吉亞各地的自然條件和历史條件的豐富多采,所以格魯吉亞人的經濟活動是多種多樣的。從最古的時候起,他們就懂得了熟練的農業(格魯吉亞被認為是最古老的小麥發源地之一),葡萄種植業和冶金業。這些古老的經濟部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獲得了特別順利地發展,使得格魯吉亞變成了一個具有高度發達的農業和葡萄種植業以及貴重亞熱帶技術作物業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在各個山區,格魯吉亞人自古流傳下來的牧場畜牧業占優勢(參看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民經濟部分)。很早以前,格魯吉亞人的手工業,如銅、鐵和貴金屬的加工、武器和飾品制作、制陶、麻絲制品都已有很大的發展。在格魯吉亞的有高度藝術價值的民族造型藝術中,古老的民族傳統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隨著蘇維埃政權的確立,在格魯吉亞形成了新的物質文化的因素,出現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方式。

在不同的格魯吉亞的族體中,有各種不同形式的民族房屋,服裝和勞動工具。在格魯吉亞西部,過去人們住的主要是方形的木房,有時四周支有木

灶、灶灶設在屋中央，有阳台，屋頂是两面坡或四面坡的。格鲁吉亚东部的房屋，是石制的，方形，灶灶在中央，屋頂是多层的圓形的，上面开有小天窗。在格鲁吉亚的山区（赫夫茨列梯亚，土瑟梯亚，戈尔納拉查，斯瓦涅梯亚），直到20世紀初还有城堡式的房屋，这是一些巨大的3—5层的石头建筑物，其中既包括住人的房間又有牲畜用的房間，此外还有多层建筑的防禦塔。这些建筑物的傳統样式以及它們的布置，說明了格鲁吉亚建筑艺术发展的悠久和高度水平。在苏維埃政权年代里得到了广泛发展的文化和住宅建設，已根本改变了格鲁吉亚房屋和村庄的样式。城市住宅建設的特点是：广泛采用格鲁吉亚的建筑形式，采用格鲁吉亚的彩飾和有高度艺术造詣的石刻和木刻，这种彫刻在格鲁吉亚具有古老的傳統。在农村地区的住宅建筑方面，保留了住宅傳統形式的主要因素，創造性地使这种住宅适合于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要求（特别是在設計和内部裝飾方面）。

格鲁吉亚的民族服装已完全为城市式样的服装所代替。現在，只有在节日和文艺演出会上才看到民族服装。在过去，格鲁吉亚全民族的妇女服装“卡巴”，就是一个布拉吉，套上开口的小上衣，佩上胸巾，两隻开口的衣袖几乎和腰带一样长。腰带、胸巾和內衣的衣袖，与布拉吉用的布不同，上面綉有很多花。上层人物的外部服装，“卡奇比”，长达膝盖，这种服装通常是綢緞作的，四周包上皮边，样式合身，前面开口。妇女的头飾有：扁平的帶有綉的小帽和头巾，漂白的綾紗从头上垂到两肩。在过去，格鲁吉亚中部的男人，多穿黑色的斜領衬衫，寬大的呢制灯籠褲，短上衣（到腰間长，有两隻长袖和一个活領），长衫（敞襟的长衫，两个长袖子，胸前有錢袋）。腰带上挂一短劍，是男人服装上不可缺少的东西。男人戴的帽子有：黑毡帽或毛皮帽以及格鲁吉亚特有的风帽。除了这些全民族样式的服装外，在革命前的格鲁吉亚还有手工业者、商人和矿工穿的衣服，以及各个地区所特有的各种不同样式的服装。

由于对生活进行了改造，由于劳动人民物質福利的不断增长，格鲁吉亚的城乡間已經没有了重大的区别，有些农村地区，已全部装上电灯，并可收听广播。有很多集体农庄員，都有了自备的輕便小汽車。新的生产关系，改变了格鲁吉亚世代代保

留下来的风俗和习惯。在过去，格鲁吉亚多是一些宗法大家庭，其中有一个年老的男人作为家长。在革命前，格鲁吉亚的妇女是没有公民权的。現代的格鲁吉亚妇女，不仅实现了斯大林宪法賦予她們的权利，而且还同男子一样地积极地参加了社会生活。

在苏維埃政权年代，格鲁吉亚变成了人人識字的共和国。从1933年起，格鲁吉亚就实现了七年制的普及义务教育，从1946年起，实行了十一年制中等学校教育。現在，格鲁吉亚有了很多很多的文化教育机关，如俱乐部、文化宫、閱覽室、图书馆等。在科学和艺术各个領域內，出现了格鲁吉亚的知識分子。在民間創作方面，最引人爱好的、傳播最广的，有頌揚偉大領袖列宁和斯大林的詩歌和长詩。在民間創作方面，在民間造型艺术方面，在許多业余团体的創作方面，都发挥了优秀的格鲁吉亚民族艺术的傳統（見格鲁吉亚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民教育，文化教育机关，出版事业和广播事业，造型艺术和建筑术，音乐）。

民族科学的研究工作，都集中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科学院，国立梯比利斯斯大林大学，以C. H. 詹納什院士命名的格鲁吉亚国立博物館，以及各地的科学研究所和各个地方博物館中。

（赵俊智譯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3卷）

* * *

阿捷尔拜疆人

阿捷尔拜疆人是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族，分布于南高加索的东部。語言是阿捷尔拜疆語。阿捷尔拜疆人的由来是南高加索东部的一些古代人們群体（阿尔巴尼亚人，米地亚人，卡斯比亚人等等）以及在公元前七世紀到公元十五世紀期間滲入到这里的斯基泰—苏馬連成分，保加利亚—匈奴成分，哈扎尔成分、伊朗成分和突厥—蒙古成分。阿捷尔拜疆人是阿捷尔拜疆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及包括在其中的納希契凡自治共和国的基本居民。也有相当多的人住在格鲁吉亚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尔明尼亚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达格斯坦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族的其它很大一部分住在伊朗

的阿捷尔拜疆。苏联境内的阿捷尔拜疆人計2,274,805人(1939年統計)。

住在阿捷尔拜疆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阿捷尔拜疆人,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从事工业——开采石油、紡織工业和食品工业。联合在集体农庄里的农村居民从事于种田、植棉、园艺、种植葡萄、养蚕、飼养家畜。低洼地带的畜牧业的特点是按季节地把畜群赶到山区牧场去放牧。在种田方面采用人工灌溉。在手工业生产中最著名的是織毯,此外还有:打金器,制銅器,制陶器,木工和石工,毛、絲、棉的紡織,制毛棉,制革,編蓆子,女紅。住宅和經濟性建筑物,根据各地区的生活特点和自然条件而很不相同:在农村地区某些地方保留了的毡帳幕,木料圆屋顶的房子,山地的小土房,粘土磚的建筑物等等,都为城市式的建筑所排挤。民族服装日渐不再穿用,大部分保留在妇女中間。在其多种地方变形中,主要成分有衬衣:(长及大腿)、同样短的“阿尔哈鲁克”(一种胸前开口的短外衣)、寬大的灯笼褲,裙子、头巾或小帽,便鞋。旧式的男装有:衬衫,“阿尔哈鲁克”(一种扣領短外衣)、腰带,“楚哈”(腰部有褶的长外衣)、灯笼褲、短毛袜、皮鞋、毛皮帽。阿捷尔拜疆人是一个已經形成的民族,他們保留着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统一和完整。但这统一的範圍内,在各別地区和他们各个群体中(例如在所謂帕达尔人、穆加尔人、阿依罗姆人等等中間),可以看到許多地方性的生活特点和差别。在阿拉伯侵略者强迫阿捷尔拜疆人接受伊斯兰教以前,他們是拜火教徒。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在阿捷尔拜疆只有僧侶阶层和资产階級才能使用到文字(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现在,在阿捷尔拜疆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确立起来的文字乃是劳动人民的普遍财富。阿捷尔拜疆的民間造型艺术有丰富的花草图案和几何图案(在紡織品上、金属上、木头上、石头上等等)。巴庫的国立阿捷尔拜疆历史博物館收藏有阿捷尔拜疆人物質文化各个部門的最宝贵的民族学資料。各种形式的民俗学,以及民間音乐舞蹈,极为丰富。

阿捷尔拜疆人的民族文化,为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所丰富起来了,正在走向更大的高漲。

(为譯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卷)

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自称:立土維亚依人)是一个社会主义民族,立陶宛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居民。同拉脫維亚人一起属于波罗的海各民族体,这个族体无論在語言上和文化上都与斯拉夫各族体相近。讲立陶宛語。在苏联的立陶宛人,人数在240万以上(1940年)。在苏联境外的立陶宛人,有相当数量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

立陶宛部族形成于13世紀的上半紀,即当立陶宛封建国家形成的时期。奥克什泰特人和日曼特人的部落联盟构成了立陶宛部族的基础。在13世紀期間及14世紀初,有雅特維亚格人、苏达夫人、巴尔特人等亲属部落的相当大一部分以及塞尔人、柴姆加尔人(齐米戈尔人)、庫尔沙人等部落的小部分,加入到了立陶宛部族的組成中。西部立陶宛諸部落(斯卡里夫人、納德拉夫人)有一部分在13世紀末被条頓勳章騎士所奴役,在政治上同立陶宛人的基本群众隔絕了。自16世紀起,即在立陶宛大公国同波兰王国成立国家联盟之后,处于波兰势力控制下的立陶宛封建主們实行了把立陶宛人波兰化的政策。但是人民群众捍卫了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文化。他們与毗邻的斯拉夫各族的联系,首先是与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联系,对立陶宛人的文化发展起了良好影响;在許多世紀內,共同的历史命运把立陶宛人同他們結合在一起了。在19世紀后半紀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立陶宛部族轉变为资产阶级民族的过程在立陶宛完成了。

资产阶级統治的崩潰,立陶宛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加入为苏联的成員(1940年),剝削者階級的消灭,社会主义在立陶宛的彻底胜利,导致了立陶宛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这个民族的先鋒队是工人階級。在苏維埃政权的年代里,立陶宛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国家。立陶宛的知識界壮大起来了。

农耕业(谷物业)和动物飼养业(提供乳类和肉乳类的,以及养猪业)是加入了集体农庄的农民們主要从事的職業。养蜂业、捕鱼业都发达。有街道

摩尔达维亚人

的村庄(主要保留于立陶宛东部)和独户田庄是立陶宛农村的基本类型。自19世纪开始的分独户田庄居住,在立陶宛资产阶级专政时期(1919—1940年)特别广泛。40年代末,由于向集体农庄经济过渡,开始建立了新的集体农庄村落,它以公共建筑物为中心并特别分出经济性建筑物。农舍建筑物改变着,旧式的立陶宛粮仓不见了。立陶宛农民的住宅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东部类型是有俄罗斯式炉灶的原本小屋,其内部布置与白俄罗斯农舍相似;西部类型是中间砌有石灶的多间建筑。立陶宛人的富有特点的建筑是储藏室,其一部分用于贮藏谷物及其它物品,而另一部分在夏天作为卧室。在20世纪以前,农村建筑物大部分是木料的,用稻草盖屋顶。自20世纪起,木板屋顶、瓦屋顶和铁皮屋顶开始普遍起来。

在19世纪末叶以前,立陶宛农民还穿家织的毛呢服装和亚麻服装。妇女的民族服装各个地区很不相同,形样剪裁、衣料色泽、图案花紋等等都不相同。束腰长袖的衬衣,有时胸前系带的华丽背心,条纹的或方格的裙子,绣花呢围裙,以及打结的布腰带,是妇女服装的基本形式。已婚的妇女在19世纪末叶还戴白色的亚麻布帽子。姑娘们的帽子是后面有飘带的花冠。妇女的民族服装,现只作为节日的服装穿戴。男子的民族服装有亚麻布的衬衫、毛呢短外衣、条纹的或方格的裤子、腰带。男子和妇女都穿土织的呢上衣和毛皮大衣作为外衣。农民的鞋子是粗皮靴以及树皮鞋,在立陶宛西部是穿木头鞋。现在,所有的立陶宛人无论在城市和乡下都穿城市式样的衣服。在立陶宛乡间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家庭纺织业:织着桌布、手巾、床单,上面装饰着几何形的和植物的图案。陶器手工业,装饰傢俱,某些木料建筑(如储藏室)的木雕,都发达。

立陶宛人民的民间创作,具有丰富口头的和歌曲音乐的遗产,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按照新的方向发展着。在苏维埃的立陶宛拥有出色的艺术家、作曲家。有组织的业余艺术团集成了民间创作发展的主要形式。

(为翻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5卷)

摩尔达维亚人(自称摩尔多文)——是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居民。居住在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摩尔达维亚人共有180万人(1941年)摩尔达维亚人还居住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依兹迈尔省、切尔诺维茨省、外喀尔巴阡省、基洛夫格勒省、敖德萨省以及苏联境外的罗马尼亚。摩尔达维亚语属于罗曼语族东部语支。斯拉夫各民族的語言——俄罗斯語言和乌克兰語言对摩尔达维亚語言的发展起了强烈的影响。摩尔达维亚人的整个历史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都有联系。

摩尔达维亚祖先起源于达基的古代土著居民——弗拉基部落。弗拉基部落在罗马统治扩张时期被罗马化了(公元初期)。根据史料断定,罗马化的居民是于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来到现在的摩尔达维亚地区的。这部份居民就居住在斯拉夫部落的附近。斯拉夫部落在摩尔达维亚部族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该部族是在14世纪即封建关系发达时期形成的。当时,摩尔达维亚人就获得了现代的这个族名,而代替了东部罗马化居民过去的总称——沃洛希。就在这个时期形成了摩尔达维亚語言。摩尔达维亚部族是在和邻近的东斯拉夫居民的經濟和文化密切往来的条件下形成的。

在16—18世纪,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就被摩尔达维亚人所居住,而主要是逃亡的农奴。在18世纪末,这些地区并入俄国版图。1812年,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之间的地区也归俄国管辖。在封建农奴关系瓦解和资本主义关系加强的时期(19世纪)也发生了摩尔达维亚资产阶级民族形成的过程。1918年,罗马尼亚使用强力从苏维埃俄国割去了很大一部份摩尔达维亚的地区。1924年,在摩尔达维亚人居住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成立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属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一员。1940年,由于苏罗衝突的和平解决,被割据的摩尔达维亚部份(别萨拉比亚)已归还苏联。以别萨拉比亚和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成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集体农庄的摩尔达维亚农民主要从事多部門的

农业经济。他们耕种小麦、玉米和经济作物（烟草、甜菜、向日葵、大豆）。葡萄园、果园广泛发达。畜牧业也很兴盛。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建立了先进技术装备的工业，主要是食品工业（罐头、葡萄酒、糖、黄油、香烟等）和金属加工业。从而形成了摩尔达维亚的工人阶级。

摩尔达维亚村庄面积一般是很大的（有时由几百幢房屋组成）。房屋一般是用土砖、粘土、石块（石灰石）建筑的。古时是用篱笆作房屋的骨架，然后涂上粘土。房屋还经常带有直角的围牆。四面坡屋顶或者起脊屋顶陡峭地垂出牆外。屋顶用芦苇、板条、瓦盖上，很少用铁片盖。木制零件和石制零件都有几何图案和植物图案的雕刻花纹装饰。摩尔达维亚住宅一般分三间：臥房、門厅、正房。夏季，有时用另外的炉子在院子里做饭。摩尔达维亚室内陈设的民族特点是用颜色鲜艳的家织毛毡装饰牆壁、板凳，而大部份毛毡有几何图案，甚至还有花和动物图案，間或也有人物图案。

在战后五年计划的年代里，摩尔达维亚集体农庄乡村的面貌迅速地改变着。旧的集体农庄乡村的改建计划正在实行；新的集体农庄的乡村正在建設中，其特点是分出集体农庄的生产場所，广场在乡村的中心，以及宽广笔直的道路。公共建筑物、集体农庄的管理机构、学校、俱乐部等都在中心地区。正在建筑设备更完善的房屋（有3—4个房間）。乡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城市的设备。

人們几乎都不穿旧式的民族服装了，特别是男子。他們已穿上新式的城市服装。古代摩尔达维亚男子上衣是长达膝盖并带有緣飾的白衬衣、白麻布褲子和各种不同颜色的腰带。夏季，男子在衬衣上面套上深色的呢絨背心。夏季带毡帽或者草帽；冬季带尖頂的羊皮帽。粗制靴和皮靴子是他們过去穿的鞋子。冬季穿长衫式样的、带領的羊皮袄。腰間纏着寬腰带。里面还穿羊皮的短上衣。此外，还穿堅領或翻領的外衣（用家織呢絨做成）。妇女穿束腰紧身衬衣。在衬衣的胸部和袖子绣有十字架。衬衣札在裙子（用五块楔形布做成）或带兜鍪边圍裙下面。头上圍着头巾，脚上穿着皮靴、便鞋或皮鞋。冬季，妇女穿着短羊皮袄（腰部有围）或者穿带棉織腰带的呢絨长袍。民族服装（尤其是冬季服装）的某些部份迄今还在生活上使用。

过去，在摩尔达维亚人之間流傳的宗教是东正

教。摩尔达维亚丰富多彩的民間創作反映了摩尔达维亚人民的历史，而且几乎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摩尔达维亚的民間音乐创作是很有內容的：有民間歌曲和舞蹈，特别是輪舞和輪唱。1930年在蒂拉斯波耳成立的合唱团——“陀依那”已具有很高的声望。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摩尔达维亚文化的提高是不可估量的。几乎完全扫除了文盲；成年中識字不多的現象也几乎完全消失。民族知識分子干部已成长起来。在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里有苏联科学院的分院、有大学和其它高等学校，以及許多中等专科学校。有用本民族語言演出的剧院和音乐院。民間业余文娛活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阮西湖譯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8卷）

* * *

拉脫維亞人

拉脫維亞人是個社会主义民族，是拉脫維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的主要居民，总共約有180万人，在拉脫維亞共和國內約有150多万人，有10多万人居住在其他各加盟共和國，其余的居住在國外。拉脫維亞語属于印歐語系波罗的語族。

現代拉脫維亞人的祖先与古代立陶宛人和普鲁士人构成波罗的族体，接近斯拉夫人。东波罗的海各部落是拉脫維亞人的民族基础；后来，烏戈尔—芬兰語族的利維人各部落也是拉脫維亞人的一个族源。紀元一千年初，在現在拉脫維亞的領土上形成了数个民族构成：在波罗的海沿岸有：庫尔希人（北部靠近利維人，南部靠近立陶宛人）；拉特格里人（居住在道加瓦河〔西德維納河〕北岸，东部与斯拉夫人接近，北部和西北部与利維人接近）；捷姆格里人（居住在利耶卢皮河流域）；謝尔人（居住在拉脫維亞东南部道加瓦河北岸）。9世紀，拉脫維亞人与邻近各部落，特别是斯拉夫部落关系的发展，促进了拉脫維亞各部落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关系的形成。拉脫維亞部族开始产生了（其中也包括利維人、斯拉夫人和爱沙尼亚人成分），拉脫維亞語也开始形成了。12世紀末——13世紀初德寇的侵入，阻碍了拉脫維亞部族形成的过程，因

此,直到15—16世紀,拉脫維亞部族才形成了。

由于这个緣故,在拉脫維亞的各个地区(拉特格里、庫尔泽姆、維則姆),在語言、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長時間保留着一些地方特点,直到18世紀,由于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合并于俄国的結果,才为拉脫維亞資產階級民族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条件,19世紀后半叶,拉脫維亞資產階級民族才彻底形成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对拉脫維亞人的文化起了进步的影响。拉脫維亞人形成民族的过程,并没有把拉特格里里的所有拉脫維亞人完全 席捲进去,因此,他們在很長時間里是个单独的族体。在資本主义的拉脫維亞(1920—1940年),拉特格里里是在維則姆和庫尔泽姆的拉脫維亞資產階級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整个拉脫維亞則处在外国資產階級的半殖民地的地位。直到1940年,当苏維埃政权在拉脫維亞确立以后,拉脫維亞人民才摆脱了階級剝削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拉脫維亞人已經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

拉脫維亞共和国的大部分居民都从事工业和运输业,集体农庄农民的主要职业就是农业和畜牧业。园艺业、蔬菜业、捕鱼业以及木工、陶器、纺织、金属和制皮等手工业生产都获得了发展。

在苏維埃政权确立以前,拉脫維亞的村庄是多种多样的。在庫尔泽姆和維則姆主要是小村落,而在拉特格里里主要是村庄。拉脫維亞农民的住房都是木架房子,有2—3間互相离开的屋子,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房子都是用石头盖的。随着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小村落已經消失了,在社会主义计划的基礎上,在各集体农庄里进行了建設,建筑了许多生产用的大場房和文化生活設備,并建筑了许多寬敞的住房,房子的門窗都裝飾着傳統的雕刻花紋。

早在10世紀以前,拉脫維亞的第一批城市就是很有名的。在苏維埃政权确立以前,拉脫維亞有許多手工业—商业性的市鎮,即所謂的大鎮店。現在,大多數鎮店都变成了拉脫維亞共和国各地区行政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发展成为城市类型的市鎮。

在20世紀初以前,拉脫維亞的农民都穿家織布衣服,而在苏維埃拉脫維亞,居民都穿机織布作的城市式的衣服,但是,农村妇女的衣着则都是自制的家織布帽子、絲織女短衣、帶花紋的手套和袜子、家織布头巾。妇女节日穿的民族服装有:束腰

长衫(有时长衫的領子、肩和胸前帶刺綉)、条紋或方格布裙子(有时是連衣裙)、帶图案的腰帶和白羊毛制的斗篷(常常帶彩色刺綉)、銀手鐲和胸別針。姑娘們戴裝飾有玻璃珠的布制花冠,已婚妇女則戴帽子和亚麻織的头巾。男人的古式衣着有:亚麻短衬衣(有时帶小花紋)、亚麻或毛制的、白色或暗色的、帶条紋或方格的褲子、长襟外衣(有时胸前帶刺綉)、长腰带、帶緣帽子(有时也戴不帶緣的帽子)和皮鞋。

在苏維埃政权确立以前,拉脫維亞的主要宗教是路德教,在拉特格里里和庫尔泽姆的一部分地区信仰天主教,在維則姆和城市里,除了路德教之外,还信仰正教。

拉脫維亞人的民間口头創作是极为丰富的,拥有大批歌曲和音乐著作、神話、傳說和謠語。拉脫維亞人的古代民歌多半是不押韻的四行詩。在叙述性的口头文学中,有許多主題是与俄罗斯和立陶宛的口头文学相同的。工人的革命的詩歌体裁的口头文学是很丰富的。在造型艺术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艺术性的彩色刺綉、編織、紡織以及一部分木刻。拉脫維亞人民的現代詩歌口头創造,貫徹着苏維埃爱国主义的感情,反映着社会主义新生活、苏維埃国家劳动者的英雄主义和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忱。

(高文德譯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4卷)

* * *

柯尔克兹人

柯尔克兹人(自称基尔吉兹 [Киргиз])——是柯尔克兹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居民(占61.7%)。过去誤称他們为卡拉—柯尔克兹,奇石柯尔克兹或布鲁特(Бурт)。操突厥語系的柯尔克兹語。人种属于南西伯利亚的蒙古种类型。柯尔克兹人总共有100万,在苏联有884,000人(1939年)。

在苏联境内,柯尔克兹人也住在烏兹别克共和国(納曼干、安集延和費尔干納各省)、塔吉克共和国(加尔姆省和戈尔諾巴达赫什自治省——东帕米尔)以及哈薩克共和国;在国外,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也有一些柯尔克兹人。柯尔克兹人是中亚古代民族之一（参看“柯尔克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概論）柯尔克兹諸部落之形成，主要是以南西伯利亚以及部分地以中央亚細亚各部落为基础的。柯尔克兹部族是在天山地区（部分地是在新疆）形成的，因为突厥語和蒙古語諸部落从远古就迁移到天山去了。到18世紀，柯尔克兹部族形成了。从19世紀中叶起，柯尔克兹人开始自愿加入俄罗斯，到60—70年代，柯尔克兹居住的大部分地区都加入了俄罗斯，于是，柯尔克兹便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柯尔克兹人之加入俄罗斯具有着进步的意义。俄罗斯人民的先进文化及其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了柯尔克兹人的生活与文化。

柯尔克兹人的基本社会制度迄至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还是封建宗法关系。在显著的阶级分化的同时，柯尔克兹人还保留着氏族部落划分和父系氏族生活方式。大部分柯尔克兹人从事牧場畜牧业，过着半游牧（也有一部分过着游牧）生活。封建貴族与富农上层分子（馬納甫和巴依）相互勾結，对柯尔克兹劳动群众进行剝削。

沙皇的殖民政策，封建宗法制残余以及資本主义关系的不够发展，阻碍了柯尔克兹资产阶级的民族的形成。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当柯尔克兹人在俄罗斯人和苏联其他各族人民兄弟般帮助下建立了本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柯尔克兹社会主义民族形成了。柯尔克兹人的經濟、文化和生活，由于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經改变了。农业的集体化以及与集体化相关联的游牧民过渡到定居，使柯尔克兹人的經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除了高度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畜牧业外，高度农业技术装备的（适合于耕种新作物：甜菜、棉花等）精耕农业是柯尔克兹經濟的基础。柯尔克兹經濟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的发展（該共和国70%的产品都是工业生产的一—1950年）以及文化水平普遍地提高，出现了本民族工人阶级和苏維埃劳动知識分子。在一切工业部門里都有柯尔克兹工人。城市、设备完善的集体农庄和新式的綠化村鎮房屋是主要的居住地。电灯和收音机在居民的生活中是很普遍的。旧式的可携带的住所——天幕——現在用作山区游牧牧場的夏季住屋。

柯尔克兹人的民族服装主要保留在山区，而在青年和中年人中間，城市服装也很流行。男民族服

装有：长衫（棉布做的一种輕便的大衣），絲絨衣和无面羊皮大衣。柯尔克兹人戴的帽子有：皮帽、白毡帽和韃靼土耳其式园帽。女人穿肥而长顏色鮮艳的棉布外衣、灯籠袖、大背心、絲絨及长毛絨外衣和短上衣、无后跟和有坚固后跟的柔軟皮靴。

苏联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把柯尔克兹人民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內容的文化引向了繁荣。几乎扫除了文盲，建立了中等和高等学校网（其中包括大学）、俱乐部、医院和图书馆。柯尔克兹学者們在苏联科学院柯尔克兹分院的各个研究机构和其他科学机关中工作着。妇女的解放以及吸引他們参加到生产、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来都是苏維埃政权巨大的成績，所有这一切促进了父权傳統和封建巴依对待妇女的关系的消除，促进了苏維埃新家庭的建立。在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文艺作品，兴建了民族歌剧和話剧院，出现了現代音乐艺术和造型艺术。柯尔克兹族的民間创作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口头抒情詩、英雄詩、歌曲和乐器得到广泛傳播。賽馬是柯尔克兹人最喜爱的娱乐之一。丰富多采的装璜实用美术有刺綉、毡制品（毡的和棉織的）、銀飾和图案花席等等。

中国人民民主力量胜利后，新疆的柯尔克兹人也开始了新生活的建設。

（曉山譯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1卷）

塔吉克人

塔吉克人（自称托吉克）是一个民族，塔吉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居民。他們居住在烏茲別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尔汗达里亚、卡什卡达里亚、費尔干、安集延、納曼干、撒馬尔罕和布哈拉各省），有少数人居住在哈薩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哈薩克省），操伊朗語族的語言。塔吉克人在苏联境內有12,292,000人；在国外，他們居住在阿富汗和伊朗。

很多中亚古代部落参加到塔吉克部族的形成中来，主要的有大夏人，索格吉人以及游牧的薩克人或斯基太人。塔吉克部族形成的过程早在5—6世紀就开始了，繼續到阿拉伯侵入中亚的时期，結束于

10世纪薩馬尼王国时代(参看塔吉克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概論)。但是后来,由于封建关系的統治,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家,这就阻碍了民族发展,也没能形成塔吉克资产阶级民族。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各个塔吉克民族群体的民族結合,使它形成社会主义民族。

多半使用人工灌溉的农业和园艺业是塔吉克人固有的职业,家畜饲养业带有副业性质(主要有牝绵羊和牝山羊,运输牲畜有驴和馬,耕田牲畜有公牛)。农业技术直到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停留在原始状态。铁铧、木犁、坎土曼等是主要的农业工具。由于19世紀60年代塔吉克斯坦北部省份归并于俄罗斯,居住在那里的塔吉克人乃捲入资本主义的漩渦中;許多塔吉克人,特别是平原地区的塔吉克人开始在工厂里工作。在20世紀初,布哈拉公国中的塔吉克斯坦南部各省,还受着封建制度的統治。王公除以上地分发给大小封建主以外,也把农户按采邑賞賜之权分发了。封建割据,内乱,商业資本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錯綜,那些早就以中介人身份参加可汗和其他封建領主貿易的商人的重要作用以及落后的技术,阻碍了这里資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在家庭关系中曾存在父权制。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很低。塔吉克人的宗教是逊尼派伊斯兰教(所謂帕米尔各族——則是依思瑪派),但是,伊斯兰教同各种万物有灵論以及妖术观念的强烈殘余交織起来了。

塔吉克人在蘇維埃制度的条件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非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塔吉克人的經济基础是基于高度农业技术和机械化的农业(植棉业)以及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在蘇維埃政权年代里,共和国內大型城市成长起来了;农村式村落改造成为在中心建有樓房以及社会和文化机关的村鎮。集体农庄庄員建造了多房間的房屋;在旧式房屋中安装了灶灶,玻璃窗,鋪上了地板,裝設了电灯、收音机,設置了城市家具。在山区的村落中,除了建造新型房屋以外,还保留着旧式平房和建筑物:用石头或粗磚和着粘土造的无窗房屋,上为平頂,中央有出烟孔道。

在生活中除了一般的城市服装外,还保留着民族服装的因素。男人穿白色肥大衬衫和肥褲,长袍,戴薩坦土耳其式圓帽;女人穿长衫(通常是艳丽的),灯籠褲,大衣式长袍,戴薩坦土耳其式圓

帽,头巾。

塔吉克人被吸收参加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和社會各方面的改造,这就急剧地改变了他們的家庭生活习惯。妇女得到了解放,在生产上,在社会生活和家庭中取得了同男子平等地位。

塔吉克民間創作有着古代傳統,特别是木刻和石刻。民間匠人制造彩繪陶器,創造有美术装璜的刺繡。革命前塔吉克人的民間口头創作表达了社会对巴依奴役和封建压迫以及王公官吏們的抗議。塔吉克人的口头文学中普遍是抒情詩,尖刻的短篇小說,逸事和故事。塔吉克人的口头文学富有新的蘇維埃的題材。塔吉克的文学、艺术、戏剧获得卓越的发展。塔吉克知識分子干部也成长起来了。塔吉克科学院成立了(参看“塔吉克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教育、科学和科学机关,文学、造型艺术和建筑学、音乐、戏剧和电影)。

在阿富汗的塔吉克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从18世紀后半期起,阿富汗封建主侵占了塔吉克人的好地;大部分塔吉克人处于佃农的地位。

(曉山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41卷)

* * *

阿尔明尼亞人

阿尔明尼亚人——是阿尔明尼亚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居民。自称哈依“хай”。他們說的是阿尔明尼亚語。阿尔明尼亚民族是公元前7—2世紀在阿尔明尼亚高原形成的,这时,烏拉图国家正处于瓦解过程,两个新的部落联盟正处于形成过程(即阿尔明尼亚高原西南部的阿尔明部落联盟和西北部的哈依阿斯部落联盟)。阿尔明尼亚民族形成过程中也有小亚細亚人和斯基泰人的成份参杂进来。后来,阿尔明部落联盟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整个阿尔明尼亚高原。在阿尔明尼亚人中間以阿尔明尼亚人种类型占主要地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阿尔明尼亚人居住在整個历史阿尔明尼亚的广闊地区。其中住在土耳其境内的一部分(凡省,埃尔茲魯姆省,比特利斯省,哈尔别尔德省及其他省),人口非常稠密。土

耳其从19世紀后半叶开始对阿尔明尼亚人实行的迫害政策，造成了1915—1922年間駭人聞听的大屠杀，并把剩下的阿尔明尼亚居民驅逐到荒瘠的美索不达米亚沙漠。阿尔明尼亚人被土耳其屠杀后还活着的一部分人被移居到西歐、近东和美洲各国去了，那些地方原先就有阿尔明尼亚的侨民。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逃亡的阿尔明尼亚人（約有20万人）加入了苏联国籍，得到了阿尔明尼亚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保获。

阿尔明尼亚人总共約有360万人，其中約有240万人住在苏联：在阿尔明尼亚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39年）有1,067,000人（还应加上1948年阿尔明尼亚侨民流入的10万人）；在格鲁吉亚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382,000人，在阿捷尔拜疆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355,000人，苏联以外的阿尔明尼亚人住在伊朗（約有130,000人）、土耳其（125,000人）、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約有30,000人）、叙利亚和黎巴嫩（150,000人）以及近东其他地区（40,000人）。也住在人民民主国家（約80,000人）、法国（約120,000人）和美国（約80,000人）。苏联以外的阿尔明尼亚人总共約有120万。

按照文化和語言來說，阿尔明尼亚人可以分成四个基本类型：1.阿拉拉特流域的阿尔明尼亚人，他們的語言是阿尔明尼亚人現代标准語的基础，2.东部的阿尔明尼亚人（贊格祖尔、卡拉巴赫高地、洛里、哈薩克），3.西部的阿尔明尼亚人（大阿尔明尼亚、小阿尔明尼亚），4.南部的和西南部的阿尔明尼亚人（华斯普拉坎、塔朗、薩松、泽通、基利基亚）。

在苏維埃政权的年代里，阿尔明尼亚文化的繁荣吸引了住在苏联境外的成千上万的阿尔明尼亚人渴望来到阿尔明尼亚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永久居住。在阿尔明尼亚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内正进行着阿尔明尼亚人民的遣送“回国”的过程。

在苏联，阿尔明尼亚人的主要职业是农业，在高山地区是畜牧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从事工业。

农业集体化、先进的农业技术改变了阿尔明尼亚乡村的面貌，过去，在这里直到20世紀20年代还保存原始的劳动工具：如木犁、石制軸心的打谷板、笨重的犁。集体农庄的农民順利地发展了技术

作物，如棉花、烟草，并从事于葡萄种植业和园艺业。根据集体的原则（劳动組合）复兴了民族手工业：有織毯业、毛織物和絲織物的生产、皮制品的生产及首飾业。

过去流行一种方形房屋，分布极其稠密，只是在圓屋顶中央有一个透光和出烟的窗孔，现在，这种房屋在苏維埃阿尔明尼亚境内已看不見了。在苏維埃阿尔明尼亚乡村规划中，按华丽的阿尔明尼亚式样建成了学校、农村苏維埃、俱乐部、电影院、戏院，这些建筑物占着显著的地位。产生了新的建筑部門即艺术装璜。

东阿尔明尼亚过去男人的衣服一般是穿短上衣、毛制的上衣、灯籠褲和戴皮帽子，西阿尔明尼亚一般穿敞胸背心、胸前及袖子有着刺綉的衬衫和短上衣。妇女的衣服是穿胸前飾以刺綉的衬衫、灯籠褲及短上衣。妇女的头飾是由几层棉織物或絲織物做成的塔形头巾。现在大部分阿尔明尼亚人穿的是城市服裝。

在苏維埃阿尔明尼亚父权氏族关系的残余已彻底消灭了：如包括父系几代亲属（60至80人）的大家族以及大家族联合——农村公社（到現在在土耳其和伊朗各省的阿尔明尼亚人中間还有保存）。阿尔明尼亚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廢除了妇女在家庭中和在社会上的原有的不平等現象，消灭了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之間的差別。农民的文盲現象已被扫除。学校、图书馆和俱乐部在农村开办了起来。

过去，一般的宗教是神人合一論的基督教信仰，亦衰亡了。

除了很发达的文学外，阿尔明尼亚人还有丰富多彩的民間創作，关于“大卫·薩松斯克”的史詩（10—11世紀編成）就有許多种，此外，还有叙述阿尔明尼亚人和土耳其統治者斗争的故事以及其他等等。在苏維埃阿尔明尼亚，人們正編着关于列宁、斯大林及其战友的英雄史詩。

（佳子譯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卷）

* * *

土尔克明人

土尔克明人（自称也是土尔克明人）——是土

尔克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居民。在烏茲別克、塔吉克和哈薩克加盟共和国里，卡拉卡尔帕克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以及北高加索也有土尔克明人居住。居住在苏联的土尔克明人总共有 81

2,400人(根据1939年人口調查的最后总統計)。除苏联以外，土尔克明人主要居住在河 富汗 (約 38 万人) 和伊朗。土尔克明人讲土尔克明語言，属于突厥語族的西南語支。土尔克明語有許多方言。在1928年(采用拉丁字母)以前，土尔克明标准語使用阿拉伯字母。1940年，采用以俄罗斯字母为基础的字母。在人种特征上，土尔克明人属于长头形的歐羅巴人种地中海支。大部份北部土尔克明人是蒙古混种。土尔克明人的起源是异常複杂的。早在紀元前2000—1000年代之交就已伊朗化的古代本地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是土尔克明人起源的基础。从4世紀开始就有讲突厥語的匈奴人(嚙噠等)与土尔克明人混合；从6世紀起，突厥部落，而主要是鄂古茲部落也掺入土尔克明人的起源。土尔克明部族形成的主要阶段是在塞尔柱人征服中亚細亚(11世紀)的时期。这次征服使鄂古茲部落和里海沿岸草原上的原先讲伊朗話的居民的混合过程得到了最大的发展。由于蒙古的征服，許多突厥蒙古人加入土尔克明部落，从而影响了土尔克明的人种类型。

政治上的分离、經濟的落后和俄罗斯沙皇制度的殖民政策阻碍了土尔克明民族统一的形成。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土尔克明形成了社会主义民族。在这以前，土尔克明分为許多部落，而每个部落之内又有複杂的氏族之分。过去最大的部落是：捷凱、約亩德、埃尔薩里、薩罗尔(薩里尔)、薩里基、果克林等等。

在并入俄国以前，土尔克明人中間已有階級分化：封建氏族上层。氏族成員以及侵犯邻国搶来的奴隶都处在从属于封建氏族上层的地位。

19世紀80年代土尔克明的并入俄国引起殖民制度度的建立。同时，土尔克明的并入俄国也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因为土尔克明人摆脱了被落后封建国家奴役的危险，加速了土尔克明資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土尔克明人主要从事灌溉农业(草棉、小麦、瓜果)和畜牧业(主要是养羊业，养馬业和駱駝业)。手工业沒有获得很大发展。然而土尔克明的地毯是远

近闻名的，因为土尔克明的地毯在艺术上質量很高。

在經濟特征方面，土尔克明人分为游牧者和农夫。

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夜，土尔克明社会結構的特点是帶資本主义成份的宗法封建社会，在南部沃壤地区資本主义的成份相当大。在这方面部落联系和氏族联系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使氏族領袖一封建主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剝削同族人。当时，清理灌溉系统的工作则是普通农夫的繁重徭役。

土尔克明的社会行为标准和家庭婚姻关系过去是受习惯法調节的。过去，新郎在結婚前一定要送聘礼給岳父母。在家庭里，妇女是被輕視的。

在苏維埃政权的年代里，土尔克明人的生活起了巨大的轉变。还在个别地方存在的氏族部落区分残余也正在消失中。习惯法规范也失掉了它的作用。土尔克明妇女無論是在家庭里，或者是在社会上都是完全平等的成員。

土尔克明現代經濟和革命前的經濟有根本的区别。土尔克明共和国已成为工业—农业国。出现了新的工业部門——采油工业、化学工业等等。农业經濟已变成集体的、高度机械化的經濟。主要作物是：草棉、穀物、苜蓿；瓜田、果园和葡萄园很发展。畜牧业主要是卡拉庫里种的綿羊。在偉大十月革命前夜已經蕭条的地毯业也已恢复并繁荣起来。除編織有傳統的几何图案的地毯外，还編織有主题的和有人物肖像的地毯。

最古老的住宅形式是帳幕。过去，在农业地区，貧农住的是平頂的粘土建筑物；在里海附近的土尔克明人中間流传建筑在木桩上的木板房屋；土尔克明北部和东部地区的特点是各个农户分散居住。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住宅是用粘土或土磚盖成的平屋頂或者“人”字屋頂的房屋(有两个至三个房間)。有木制的地板和寬敞的窗戶。房屋的一边有阳台，是夏季休息和睡覺的地方。住所的前面常常竖起帳幕，作为夏季的住所。劳动工具放在后院。在城市里(許多城市是在苏維埃年代成长起来的)有設備完善的住所。

(下轉35頁)

庆祝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苏联社会主义民族的产生与发展	苏联 卡尔金著	罗致平译	0.18元
论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	苏联 M.L.吉姆著	严信民译	0.07元
论苏联北方各民族人民越过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問題	苏联 雅庫波夫斯卡娅等著	蔡国华译	0.08元
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	苏联 奎米揚著	吳玉等译	0.12元
斯大林語言学著作中所闡明的語言与方言学說	苏联 阿瓦涅佐夫著	李佩娟译	0.06元
苏联民族語文問題	苏联 姆·恩·嘉治耶夫等著	彭楚南等译	0.11元
关于創立民族文字和建立标准語的問題(內部发行)	苏联 謝尔久琴柯教授著	刘涌泉等译	0.50元
論苏联民族文学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	苏联 罗米則著	李相崇译	0.06元

•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譯 •

阿捷尔拜疆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高兴亚译	0.19元	馬里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基里欽科等著	刘 忱译	0.08元
莫尔達維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排印中)		納希切宛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張生林译	0.06元	
阿尔明尼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0.27元		阿布哈兹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蘇 賢译	0.07元	
吉尔吉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卢宁著 本社译	0.14元	莫尔多瓦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刘 忱译	0.07元	
哈薩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排印中)		北沃舍梯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在排印中)		
達格斯坦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勃罗德等著	張小波译	0.10元	阿尔泰边区	陈有信译	0.04元
卡拉卡尔帕克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查品科等著	陈有信译	0.07元	郭尔諾巴達克山自治省	魯 崗译	0.04元
卡巴尔達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蘇 联 吉里洛娃等著	楊任之译	0.08元	郭尔諾阿尔泰自治省	沈 漢译	0.04元
布里亞特蒙古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佐諸夫等著	余元重等译	0.12元	阿第里自治省	顧明宜译	0.06元
科米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希什金等著	韓慈康译	0.08元	苏联共产党的民族綱領、民族自决权		0.05元
阿札里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霍非譯	0.07元	民族問題、部族、民族、少数民族	严信民译	0.06元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民族問題譯叢

〔月刊〕
1957年11月号
(总第21期)
11月4日出版

編 者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 定 价 •
出 版 者	民 族 出 版 社	全 年 (12期) 2.40元
總 發 行 处	北京西 郊 電話: (2) 2037	半 年 (6期) 1.20元
訂 購 处	北京国子監特54号	三 个 月 (3期) 0.60元
代 訂 代 銷	郵 电 部 北 京 郵 局	國內平寄郵費免收
	全 国 各 地 郵 局	訂 費 一 律 預 收
	全 国 各 地 新 華 書 店	零 售 每 冊 0.20元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印數: 1-4,600